



伊凡·瓦西里維契·巴布石金

目 次

伊凡·瓦西里維契·巴布石金(簡历)	1
列宁: 德伊·瓦·巴布石金	7
巴布石金的回忆	12
I	12
II	76
附录 巴布石金1901年發表在“火星报”上的通訊	147

伊凡·瓦西里維契·巴布石金(簡历)

伊凡·瓦西里維契·巴布石金，在为建立布尔什維克党、推翻专制政权、爭取無产階級革命在我国获得胜利的光荣战士中間占着显著的地位。列宁称巴布石金是民族英雄，因为他把自己毫無保留地献給了解放工人階級的斗争。列宁在叙述巴布石金的革命活动时写道：“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俄罗斯人民将永远当奴才，永远当农奴。現在俄罗斯人民正在和这样的人一起，为彻底摆脱一切剝削而战斗着。”（“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16卷第334頁）

巴布石金于1873年1月15日生在沃洛果得省萊靜克村一个貧农的家庭里。他早年丧父，还在童年时期就尝尽了貧穷和飢餓的滋味。巴布石金还是个十岁孩子的时候就被送到杂货店去当学徒。他在那里認識了老板的無情压迫和殘酷剝削。

十四岁的少年巴布石金就进入了喀琅斯塔得的魚雷工場做工。他在那里有生第一次知道了工人爭取美好生活的斗争。当了四年徒工以后，巴布石金进了彼得堡的塞棉尼可夫工厂（現名：列宁工厂）。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工人运动在俄国已日見增漲。在这些年代里，初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組相繼建立，它們的成員中間也包括先进工人。巴布石金一知道有工人的政治小

組，便渴望着積極參加革命鬥爭。他很幸運，參加了列寧所領導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同列寧的會面確定了巴布石金爾後的一生和他的活動。列寧極其推崇巴布石金的毅力、他的傑出的才能、尤其是他對革命事業的無比的忘我的忠誠。在列寧的直接影響下，巴布石金成了職業革命家，把他的全部精力貢獻給了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

1895年，巴布石金積極地參加了列寧建立的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的工作。在列寧和“鬥爭協會”的其他成員被捕以後，仍然自由的巴布石金便全力從事“鬥爭協會”的活動，不讓它停頓。這時，他寫了並且出版了通俗的宣傳小冊子“什麼是社會主義者和政治犯？”。他在小冊子內向工人說明，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追求什麼和得到什麼。他繼續在涅瓦關外的塞棉尼可夫、亞歷山大、斯契克良等工廠的工人中間從事革命活動，建立政治小組，創辦圖書館。

1896年初，巴布石金因“鬥爭協會”案件被捕了。他在拘留所的一間單人牢房裡消磨了十三個月的光陰。沙皇的暴官惡吏沒有能夠摧毀這個列寧式的革命家從事正義事業的鬥爭意志。巴布石金利用這種和革命實踐活動隔絕的不得已的時光，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1897年2月，巴布石金從監獄裡釋放出來，被送到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德涅伯彼特羅夫斯克）。巴布石金在這裡進了一家工廠，很快就和當地的革命組織接上關係，並且懷着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熱情參加了這個組織的工作。

經過巴布石金和其他革命者的努力，1897年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建立了“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巴布石金成了這個協會的積極的活動者之一。1898年初，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的“鬥爭協會”出版了八份告城市工人的傳單。每一

份傳單都揭露了当时籠罩着整个俄国的专橫和强暴，給工人指明了解放的道路，号召他們積極地参加革命的斗争。巴布石金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筹建了一所地下印刷厂，利用它来出版秘密的革命書籍。

巴布石金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的三年工作，結了果实：該城的革命工人，都团結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委员会的周圍。

尽管地下工作做得十分細致，但是警察当局还是弄清了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党委会各个成員的革命活动的情况。1900年开始大批逮捕社会民主党人，巴布石金虽得幸免，但他只好离开叶加特林諾斯拉夫。

这时候，列宁已經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回来，着手筹建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的全俄报纸——“火星报”。“火星报”必須把彼此分散的馬克思主义的組織联接起来，同时准备在俄国建立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政党。列宁認為最好在国外国外出版报纸，使它免于遭到可能的摧殘。这份报纸还必须和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組織保持密切联系。列宁的計劃得到了俄国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的热烈支持。

巴布石金積極参加建立列宁主持的“火星报”的工作。1900年夏天，他在瑪·伊·烏里揚諾娃的幫助下，和列宁取得了联系，成了“火星报”的最早的代理人之一，并且是它的活躍的通訊員。

在創立馬克思主义政党的艰苦斗争中，列宁把特殊的期望寄托在巴布石金的身上，而后者也沒有辜負他的这种期望。巴布石金成了当时为“火星报”和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小組建立联系而尽力的活动家之一。巴布石金将舒雅、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奧列霍沃-祖耶沃等城市工人写

的几百篇通訊轉交給列宁主持的“火星报”。列宁曾經說道：“只要巴布石金沒有被捕，‘火星报’就不会缺少純粹由工人写的通訊。”

为了逃避沙皇警察的迫害，巴布石金不得不經常搬家。他在斯摩棱斯克、波洛茨克、波克洛甫、莫斯科、奧列霍沃-祖耶沃、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等地进行了革命工作。巴布石金在他到过的各个地方，努力扩大和加强“火星报”和工人群众的联系。这时，巴布石金遵照列宁的囑咐，写了一本通俗小册子“为捍衛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工人而斗争”。这本小册子是秘密發行的，广泛地傳布在各个工業城市的工人中間。

遵照列宁的囑咐，巴布石金还同巴烏曼一起，从事繁重的組織工作，力求把莫斯科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团結在“火星报”的周圍。

1901年底，巴布石金又被捕了，但是1902年夏天，他終於越獄潜逃国外，逃到“火星报”編輯部所在地的倫敦。巴布石金在倫敦和列宁会面了。列宁委托他参加草拟火星派組織建立馬克思主义政党的今后工作的計劃。列宁談到他和巴布石金的会面时說道：“我們在那里談了很多，共同討論了很多問題。”

巴布石金一心想离开倫敦，回到俄国去，打算積極参加实现列宁建立革命馬克思主义政党的計劃的工作。列宁好不容易才說服巴布石金，叫他留在国外几个月，写作有关他的生平和革命活动的回忆。列宁認為，写出这样一本宣傳小册子，对青年工人來說，具有莫大的益处。青年工人可以按照这个小册子来學習；每一个有覺悟的工人究竟应当怎样生活，怎样行动。巴布石金所写的这些回忆文章，包括他这个

職業革命家从1893年到1900年的生活和活动。他的这些回忆文章，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才第一次公布于世。

写完了回忆录，巴布石金才按照列宁的吩咐，回到了当时革命馬克思主义者正和“經濟派”展开尖銳斗争的彼得堡。巴布石金在彼得堡立刻投入当地火星派組織的工作，站在坚决的列宁主义的立場上来对待革命活动的一切問題。列宁極其贊揚巴布石金的工作。1903年1月16日，列宁写道：“我們热烈欢迎諾維茨克(巴布石金的笔名。——俄文版編者)的果敢行为，我們要求他再接再厉地保持这种战斗精神，不能有絲毫的动摇。”(“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34卷第112頁)

列宁把莫大的希望寄托在巴布石金的身上。列宁在寄往彼得堡的一封信中写道：“你們那兒只要有波格丹(巴布石金的另一个笔名。——俄文版編者)在，就不能抱怨沒有人。”(“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34卷第111頁)然而，巴布石金在彼得堡的組織內沒有工作多久，又被捕了。过了一个漫长的、拘禁的夜以后，他被押往遙远的亞庫梯流放地去了。

巴布石金待在極北的維尔赫林斯克流放地，和党的生活隔絕了，同亲友们离开了。尽管有各种困苦和不幸，但是他决不沮丧，而且深信他将畢生为之斗争的事業一定会胜利。

巴布石金在流放地把犯人組成小組，自己也學習了很多东西，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

1905年革命的日子来到了。俄罗斯的工人階級挺身而出反对沙皇的专制制度。巴布石金領導了伊尔庫茨克的革命运动。作为伊尔庫茨克党委会的一个成員，他对孟什維

克进行了不可調和的斗争，号召发动群众，对沙皇制度作武装斗争。

十二月武装起义在莫斯科失败以后，革命开始逐渐转向低潮。工人阶级一面恶战，一面退却。赤塔的工人顽强地战斗着。布尔什维克在赤塔建立和领导的工人、兵士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作为一个革命政权机关而行动着。伊尔库茨克方面感到武器不足。巴布石金竭力给赤塔人组织武装支援。1905年12月底，他和一伙同志离开伊尔库茨克前往赤塔去取军火。在归途中，他和他的五个同志被沙皇政府派往西伯利亚去镇压革命运动的讨伐队截获了。1906年1月31日，巴布石金等六人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在梅索瓦依火车站被他们残酷地枪杀在草草刨好的一个大坟坑边上。他们，这些英雄们死了，他们拒绝答复沙皇的刽子手的逼问，这些刽子手一直没有弄清这些被害者的姓名。

伊凡·瓦西里维契·巴布石金的英雄形象，一个为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的忘我的战士的英雄形象，是苏联人民——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鼓舞榜样。



列宁：悼伊·瓦·巴布石金

我們活着的这个可詛咒的社会發生了这样一件事：党的一个偉大的工作者、党的驕傲、一个忘我地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工人事業的同志，竟失踪了。他的至亲妻子和母亲，他的最亲近的同志們，多少年来都不知道他發生了什么事情：他会不会是在哪兒服苦役？会不会在某个监牢里被人害掉？或者在对敌斗争中英勇地牺牲了。这就是过去猜测被萊林迦勃封姆槍杀的巴布石金的情况。我們获悉他的死訊，只是最近的事。

巴布石金的名字，不光社会民主党人熟悉它，爱戴它。凡是認識他的人，都敬爱他，因为他剛强、寡言、革命心坚定、并且热誠地忠忱于革命事業。1895年，他这个彼得堡工人和另外一批有覺悟思想的同志，热烈地对涅瓦关外的塞棉尼可夫、亚历山大、斯契克良等工厂的工人进行工作。他建立政治學習小組，創辦圖書館，自己也总是很用功地學習。

他一心一意地只是想着，怎样开展工作。他積極地参加編写1894年秋在聖彼得堡出版的第一份鼓动傳单——告塞棉尼可夫工厂工人的傳单，并且亲自散發这些傳单。当聖彼得堡成立“工人階級解放斗争协会”的时候，巴布石金就成了它的最活躍的成員之一，一直工作到他被捕为止。

他在彼得堡工作时的一些老同志——他們都是“火星报”的創始人——和他一起討論了关于在国外創辦一份政治报纸的創議，他热烈地拥护这件事。这份政治报纸的任务，主要是联合和加强社会民主党。只要巴布石金沒有被捕，“火星报”就不会缺少純粹由工人写的通訊。大家可以翻閱一下最初的20期“火星报”，那上面的全部通訊，都是来自舒雅、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奧列霍沃-祖耶沃等俄国中心城市。这些通訊几乎全都經過努力替“火星报”和工人之間建立最密切联系的巴布石金的手。巴布石金是“火星报”的最热心的通訊員，也是它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巴布石金从中央地区輾轉来到南方的叶加特林諾斯拉夫。他在那里被捕了，囚在亚历山大地方的監獄里。他和另外一些同志翻越監牢的铁柵栏窗戶，逃离亚历山大。他什么外国話都不懂，却能来到当时“火星报”編輯部所在地的倫敦。我們在那里談了很多，共同討論了很多問題。但是，巴布石金沒有赶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坐牢和流放迫使他长时期离开队伍。高漲的革命浪潮推动了新的工作者、党的新的活动家，而这时，巴布石金却住在遥远的北方，住在維尔赫林斯克，同党的生活隔絕了。但是，他不是白白把時間浪費掉的，他學習，准备进行斗争，在流放地教导工人和同志，力圖使他們成为有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布尔什維克。1905年頒布了大赦令，巴布石金回到了俄国。这时候，西伯利亚方面斗争十分激烈，那里正需要像巴布石金这样的人。他参加了伊尔庫茨克的党委会，埋头工作。他这时候必須在各种會議上演說，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宣傳鼓动，組織起义。当巴布石金和另外五个同志（我們沒有能知道他們的名字）把大批武器装在一挂車皮上，运往赤塔的时候，

火車被萊林迦勃封姆的討伐隊追上了。於是，這六個人沒有經過任何審訊，就立刻被槍殺在草草刨好的一個大坎坑邊上。他們，這些英雄們死了。親眼看見這個屠殺場面的兵士和在這列火車上服務過的鐵路員工，說出了他們死時的情況。巴布石金在沙皇爪牙的殘酷迫害下犧牲了。然而，他死的時候卻知道，他所畢生從事的事業沒有死，將會有成千、成萬、成百萬的人繼續這個事業，而且知道其他的工人同志也將為這個事業舍身成仁，這個事業一天不勝利，他們的鬥爭就一天不罷休……

* * *

有這樣一些人，他們杜撰了一個寓言，並且正在散播着。這個寓言說：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是“知識分子”的政黨；工人和它是風馬牛不相干的；俄國的工人是沒有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這種情況是革命前的特點，而且在革命時期尤其如此。自由主義者散布這種謠言，是出於他們對1905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所領導的群眾性的革命鬥爭的憎恨，而社會主義者中間有些人卻無知而又輕率地重複這種謠言。巴布石金的自傳，這個火星派工人的十個年頭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作，有力地駁斥了自由主義者的謠言。先進的工人在革命前的十年時間內建成了工人的社會民主黨。巴布石金就是這些先進工人中的一個。沒有無產階級群眾中的這些先進者的忘我英勇的頑強勞動，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不要說十年，就是十個月都存在不住。鑒於這些先進者的活動和他們的支持，到了1905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才成長為這樣一個黨；它在偉大的十月和十二月的日子裡，和無產階級水乳交融地聯繫在一起；不僅在第二屆杜馬，就是在第三屆黑幫分子所控制的杜馬裡，它也保持了這

种联系。

自由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力图将不久前死去的第一届杜馬的主席摩洛姆扎夫变为民族英雄。我們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錯過这个表明人們輕視和憎恨沙皇政府的时机。沙皇政府連像摩洛姆扎夫这种温和而不得罪人的官僚，都要加以迫害。摩洛姆扎夫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官僚。他甚至不是民主主义者。他害怕群众的革命斗争。他不想倚靠这个斗争来获得俄国的自由，而是想倚靠沙皇专制政权的良心并同俄国人民的这个凶恶無情的敌人妥协来得到它。把这样的人看作俄国革命的民族英雄，未免太可笑了。

可是，这样的民族英雄是有的。这就是像巴布石金这样的人。这就是并非一年、两年，而是十年如一日地在革命中把自己完全献给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人。这些人决不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枉然無益的个人的恐怖行为上，而是在無产阶级群众中頑强地而又勇往直前地工作，尽力提高他們的認識、他們的組織、他們的革命的独立性。当危机来临、革命爆發的时候，当千百万人行动起来的时候，这些人就起来领导武装的群众斗争，去反对沙皇专制政权。一切都要从沙皇专制政权手里夺回来，都要通过巴布石金这样的人所领导的特殊的群众斗争夺回来。

俄罗斯人民沒有这样的人，便会永远当奴隶，永远当农奴。俄罗斯人民正在和这样的人一起，为徹底摆脱一切剝削而战斗着。

1905年的十二月起义，已經过去五周年了。我們將要庆祝这个念紀日，追悼那些在对敌斗争中牺牲的先进工人。我們要求工人同志們召开會議，把回忆当时的斗争的記錄以及有关巴布石金和其他在1905年起义中牺牲的社会民

主义工人的补充材料，寄給我們。我們打算出版一本有关这些工人的生平的宣传小册子。这本宣传小册子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种动摇分子和畏缩分子，将是一个很好的回答。这种宣传小册子对青年工人来说，也是一本良好的读物。他们可以按照它来学习；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究竟应当怎样生活，怎样行动。



巴布石金的回忆

I

我写这本回忆录是这样引起的：我有过一个亲密的朋友，也就是说，有过一个像俄罗斯俗語所說的那樣、亲密得知心知意的朋友，甚至比这还要亲，两个人簡直合一顆心——至少我个人感到这个友誼是这样的。这个朋友把他回忆自己从一个最平凡的、“只能充个数的”、缺乏严格观点和信念的青年变成一个滿怀着能够破除一切旧偏見的深刻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經過，都詳詳細細地告訴了我。他心里充滿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后，就立刻感到自己有一种能够实现他的信念、影响他周圍的同志、熟人和亲朋的力量。接着，他便談到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什么情况、什么地点、什么条件下發生的；什么地方有过什么样的人；他們怎样工作，他們怎样喚起沉睡未醒的思想意識；而这些思想意識的运动又是如何逐漸發展、逐漸扩大、逐漸深刻，乃至最后变成工人的日益增长的自觉心。他和我談的时候，总是說：

“我現在說的，只是我个人对我自己过去到过的那些地方的观察。这些观察不是包罗万象的，也不是完全的，因为我根本就沒有到过很多地方，也沒有在很多地方住过。”因此，我再重复說一遍，这就是說，我是在轉述我的朋友的话

忆，而且像俗語所說的那樣，還是從頭說起的。

我出身是個農民，十四歲以前，一直住在四面都是樹林子的一個村莊里，離開大城市老遠老遠的；到十五歲，我才生平第一次看見一座真正地道的城市，接着看到了第二座，第三座，最後見到了首都，另外就是我曾定居過的那座城市，儘管如此，但是我的老家莊子裡的生活，庄稼人過的日子，我是完全不了解的，忘記了，顯然是終生不會過問的了。命運從來也沒有讓我有時間回到鄉下去，去耕種那塊在法律上我是主人的份地。但是城市裡的生活、首都的生活，工廠的生活，工長和工人的生活，就不同了，這是我的生活。這種生活，是我所了解的，熟悉的和親切的。一個工人的家庭，這就是我的家庭，我是能夠十分了解和感知的。這種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不會引起我的奇怪，都不會引起我的不快，也不會使我感到驚訝。“一切本來就是這樣的，應該是這樣的，而且將來也還是這樣的！”當我還沒有過到真正的人的生活，而是混日子的時候；當我還沒有思考日常生活問題，而是單憑微薄的工資過活，腦子裡還稍微有些宗教偏見，但已迷迷糊糊地想發財過好日子時候，我就是這樣想的。

有這麼一座小城，它占地兩平方公里，四面環水，一面岸上築着許多兵營，另一面岸上是官家的造船廠和擁有許多各種各樣的工廠的港塢。這座城市中間的一條人工開鑿的運河，親切地擁抱着許多官家的倉庫，無論你走到哪兒，到處都是官家的、軍事的、部队的東西。這座城市，就是喀琅斯塔得。正是在這裡，在這個喀琅斯塔得，我十五歲那年，第一次進入喀琅斯塔得港的魚雷工廠做工了。在三年中間，我一直每天掙二十戈比，或者說，每月掙四盧布四

十戈比到五卢布。我得靠这点錢来养活我自己，因为我从哪
里也不能得到帮助。

我在这个工場里一共做了将近六年的工，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张秘密传单或是一本秘密小册子。真的，显然工場里其余的工人，也都沒有见到过任何类似的东西。但是議論倒是什么样的都有，尤其常常發生在某一間屋子里。

大伙什么話都談，居然还談到“政治犯”。我很难表达这些談話有趣到什么程度，也很难理解这些談話的意思，尽管別人講得十分亲切，毫不害怕什么特务、奸細和一般的告密勾当。这里沒有反对現行制度的犯罪言行，有的只不过是一些模糊的回忆和一些道听途說的消息。这些消息常常被人歪曲地理解，被人傳說得仿佛是一些有点异乎寻常的、需要严守秘密的、犯法的、很危險的，因而也是很有趣的和非常吸引人的事情。

这时候，听众的脑子里緊張到了極点，四周圍籠罩着一片迥非寻常的寂靜气氛，只有旋轉着的傳动装置的枯燥無味的喧囂声和在皮带輪上滑动的皮带的特殊响声，才划破这种寂靜气氛，同时从微啓的門外几百个正在干活的人和運轉着的旋床那里也傳来了震耳欲聾的鬧声。老天爷，您千万別讓宪兵或者像宪兵之类的什么人出人意外地跑到这里来。可以預料到，那时候，这些無辜的听众一定会万分惊恐和慌張。只要管理处某个人悄悄地冷不防的来到这里就够了，很多人都会急得滿头是汗——神經緊張状态竟会达到这样的程度。

講話的人講得自己都魅惑了。他活龙活現地講述某个陰謀、某件收买勾当、某桩謀杀案子，而且还提到某个在城外受了絞刑的死囚的名字。我現在已經記不起当时談到的

那些姓名和人了；但是印象一直还是很强烈的。同时至今还不明白：那些人到底是为了什么被处死，而他們又干了一些什么事？在講話的时候，比較懂得事理和脑筋聪明一些的人都会明白，他們(被处死的)准是閱讀了或者秘密閱讀了些什么东西，閱讀了犯法的东西；并且知道他們都不是蠢汉，而是为了袒护工人；但是有些工人却認為，这种袒护工人的行为，正是罪犯們特別狡猾的地方。

我記得当时还談到过一個被带去行刑的軍官的情况，談到他在临刑前的态度等等。我还記得有关一个在这个工厂里做过工的鉗工的故事。这个鉗工每逢星期天經常到市外城牆上去閱讀什么違禁報紙。后来，他被人严密地監視了，种种形迹可疑的人也常到工厂里来了：一个人穿神甫的服装，另一个人是什么官吏，第三个人是乡下人打扮，等等諸如此类的人。他們全都来瞧瞧这个鉗工。这个鉗工也把这些人猜透了，他們的監視，結果弄得他神經錯乱了。

我在十八岁前的生活和工作，大抵上就是这样。到了十八岁，按照当地的規矩，我被人当作成年人看待了，不算徒工，而是工匠了。显然，这是遗留下来的一种手工業行会的規矩。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完完全全的大人，而且不久就担負起独立的、相当复杂的工作了。这种情况并没有使我感到高兴，原因是他們看待我，还是像过去的学徒一样，付給我的工資，少得可怜。我开始打主意，設法到別的地方去干活，但是沒有人撑腰，要办到这件事，也不是那么輕而易举的。因此我只好暫時仍旧在老地方做工。最后，我的願望好像快要实现了，而且我已經准备动身上彼得堡的巴尔契斯克工厂去了。但是，我尽管得到別人的許多諾言，而事情进展得仍旧很慢，我的几次請客还没有产生出我所期望

的那种效果。

正是在这时候，我碰到了一件有趣的事，認識了一个彼得堡的工人，这人就住在我已經住了二年多的房子里。由于細心观察了这个彼得堡的工人，我才明白彼得堡的工人都是些好样的。他們尽管酗酒，但是干活却是沒天沒夜的干，他們每月都能掙到百兒八十個盧布的工資。對我說來，每月掙到十八個盧布，就已經是應該努力追求的理想了。

看来，我使这个彼得堡人对我产生好感了，接着我們結交了一种特殊的友誼。这个友誼在我身上长久地留下了一个彼得堡的無神論者、一个社会主义者-工人給我的好印象。老实說，他本人也还是个沒有觉悟的人，不可能給我什么啓發，但是他能够把他自己对厂里的資本家和一帮渺小的寄生虫的部分本能上的憎恨和反抗感染給我。他几乎整日整夜地干了一个星期的活，到了周末，完全累垮了，星期六稍微喝了一点酒就醉了。那时，我帶着他跑到离开人群很远的什么地方去。在那里，这个做工做得精疲力尽的、被伏特加酒燒得感情冲动的老人，开始慢慢地向我袒露真情，傾吐充滿在他心里的憤恨。

“瓦尼亚！”他向我說，“你能弄到我們老板用来烂坏金屬的那种毒藥嗎？”

“你要这东西干嗎呀？”

“听着：我在乡下有老婆，有孩子，还有房子，因此我想帶着这种毒藥回到乡下去，打算先毒死所有的畜生：神甫和村里的富农，然后再和老婆孩子去安排別的事情。我告訴你，神甫是最坏不过的人了。你要相信我，相信我这个醉汉，什么上帝都是沒有的，全都是捏造出来蒙騙咱們弟兄的。大丈夫每走一步路，都必須当机立断，必須想尽一切办

法来杀尽村里的神甫和富农，不然，他们决不会让咱们弟兄安身活命。”

他常常向我说这类话。

“你想想看，”他接下去说：“咱们要这些吸血鬼（老爷们）干吗用啊？他们只会从咱们身上压榨剩下来的工资，坑害咱们，欺侮咱们，骑在咱们的头上。”

不用说，我的这位彼得堡人骂得最厉害的对象，当然是管理处的那帮狐群狗党。从这种漫骂中，我可以接受相当一部分对压迫者的痛恨的话。但是，他不能正确地發揮無神論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我就不可能有意識地去接受他的观点，同时也不可能感到像他那样深刻的仇恨。他对一切不公正的事情，真是恨之切骨，显然他是在用啤酒和伏特加酒澆愁泄恨……后来，我打听到，他不久就死了……

我的願望终于实现了，我到彼得堡的一家工厂去做工了。我进厂就做包工的（計件的）活。我們一帮，共有十八个人。进厂后，我非办不可的第一桩事，就是敬敬我的同伴，也就是請請客。我当时身边分文不名，因而由我們班的全体伙伴担保，由工头借錢，买四桶伏特加酒、五尾青魚、面包，外加几瓶啤酒。为了庆贺我进厂，同一帮的人全都到場了，除了自家人以外，别的帮会以及和我們这一帮的工作有联系的人，也来了五位。我們大伙聚在門外的院子里圍成一个圈子，中間放着酒菜。当然，这里对于任何起碼的享乐，都是不存絲毫奢望的。一个人喝伏特加酒，另一个人啃面包，第三人嚼青魚。青魚事先就已切成塊，現在已經人手一塊了。工头手里端着一杯斟滿酒的杯子，按照礼节祝賀我的进厂，用这来揭开酒宴的序幕。五到十分鐘以后，我們分手了。走出院子，我就感到自己已經完全被公認是这个

我剛花了两个半卢布請了客的帮会里的一員了。虽然这种陋規，是很討厭的，但是就是現在我也不能对它心怀特殊的惡感。人們在这些請客会上常常不知怎的觉得自己和别人亲密起来。这时候，他們心里都想談談自家的事，叙叙重要的問題。在这些請客会上，人們常常教訓各班工头，責备他們的饒舌和無端指責。

这种教訓的痕迹，有时候，过了一两个礼拜，还能从工头的眼神里看出来。当然，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工头們为了珍惜自己的体面，根本不去参加这种請客会。

总之，我就在彼得堡的塞棉尼可夫工厂里做工了，在帮会里做“計件的”活計。工資不是根据个别的人来計算的，而是根据参加这个帮会的全体伙伴来計算的。在这种帮会里做工，非得精明强干、胆大而又能維護自己不可，否則，就要受到別人的欺侮，或者像別人所說的那樣，被人从帮会里撵出去，这种情况是十分令人伤心的，因为在帮会里干活，干一个卢布的活，可以拿到五十到六十个戈比，要是不在帮的話，連什么都拿不到了。

我在喀琅斯塔得做工的时候，覺得工作絲毫也沒有使我困累过，也很少有因为干活而感到疲倦的时候；天天做工，人也不觉得煩惱，身体也沒有糟得这么快。那时做的，根本就不是这种包干的和計件的活。人一做上这种計件的活，就毫不怜惜自己，完全忘掉了自己的健康，毫不展望一下自己这一生的前途，从来也不考虑到工作会影响他的寿命。

不！他不断地把工作推向前去，汗像雹子似的从他身上淌下来，而沒有擦淨的汗珠沉重地落到他的活計上，引起他的不滿和惡罵，紧跟着用袖口往額角上猛地抹上一把，

接着又是工作，急急的、匆忙的工作。这一切都是为了想多挣一个戈比的工资。

要是待在人人都互相监视的帮会里的话，情况就还要坏。最糟糕的情况是，几个人同时干一样的活。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尽力地加油干。工人干上这样的活，等于是卖命^①。通常总是会有一两个高明的工人，把活计做得赶过其余的人，而其余的人则拼命加油干，竭力不让自己落在后面，甚至心里自然而然地害怕起来，唯恐白白地放过几分钟时间，让别人在工作中赶过自己。

我也碰上干这样的活，尽管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被人欺侮的人，但是别人的保护也永远是需要。在我旁边干活的一个同伴，总是维护我。这是一个上了年岁的、有家室之累的人。不过，他脾气很大，幸好他是个文盲。

我和他处得很好。他常常向我说些从前闹过的各种风潮，还谈到过去有些医生和大学生在霍乱流行的时候怎么坑害老百姓，以及老百姓怎么把他们从尼古拉桥上抛到涅瓦河里去。至今，我一想起他，总是对他当时的这些观点感到十分奇怪。他牢记着民意党人在厂内散发的一本小册子，还记得人们在拷问室里阅读这本小册子的情况。虽然他是个不识字的人，但是他完全同情那些散发这类书籍的人。有时候，他还神秘地附着我的耳朵，向我叙述沙皇被刺的事。他说，据别人说，刺害沙皇是有目的的，只是老百姓不懂得这点而已。没有沙皇，日子会过得比现在好。不用说，他是十分憎恨吸血鬼和形形色色的大人物的。同时，他还把这种仇恨心感染到我的身上，把它烧得越来越厉害。

^① 工人常常因为劳累过度而躺倒在床上。按照工人的说法，这种活计叫作“卖命”。——作者

在厂里干活，第一年使我感到很滿意，尽管可以說，我不是在过日子，而只是一味地干活。白天干，晚上干，夜里干，有时两天也不回家，虽然家离厂二十分鐘就可以走到。我記得，有一个时期，为了做急件的活，一連干了六十个小时，只有吃飯才休息一会。这会弄出什么結果来呢？只要談一談下面的情况就明白了。我有时候从厂里出来回家，半道上就打起瞌睡来，瞌睡得碰到电灯杆子上。睜开眼睛，再走，接着又打起瞌睡来，蒙眬中好像自己在涅瓦河上划船，忽然船头撞着岸边了，但现实生活立刻証明，这不是什么真的河岸，而是桥边上的粗栏杆。

这么做工，既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情况，脑子里也不想什么，只是一个勁地盼望着赶快过个什么节日，而到节日那天，又睡到中午十二点鐘，甚至下午一点鐘；还是看不到什么，什么也不能知道，什么也听不到；第二天还是做工，做那个累人的、連續不断的、要人性命的工，既沒有絲毫人生乐趣，也沒有絲毫休息。

这到底是为了誰呢？为了資本家！为了讓自己变成傻瓜！只有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会感到快乐，于是也就不可能感到可怕的压迫和殘無人道的行徑了。

总之，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凄惨地、憂郁地过着日子。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什么話，但是不明白它，同时也不会分析它。

写到这里，我要結束对我在变成社会主义者以前的那段生活的描写了。那时候，我是一个缺乏严格观点和信念的、只能充个数的平凡人。

有一天，也像过去数不清的那些日子一样，傳动机在單調無味地旋动，皮带在皮带輪上滑动，車間里到处都在热火

朝天地工作，工人在加緊地勞動；領班也在手忙腳亂地奔跑，一會在車間的這個角落出現，一會又在另一個角落露面，而且還可以看到許多各式各樣的好吃懶做的上司也在無謂地忙碌着。這一天，我站在虎頭鉗箱旁邊，全身伏在18英吋的銼機上，繼續修理機車偏心輪的鷄心卡頭。另外還有兩個鉗工也在修理鷄心卡頭。我們在拼命用勁，把襯衣袖口卷到胳膊肘上，而且脫掉了工服和坎肩。渾身冒汗，汗珠涔涔地落在工作台上和地板上，但是誰都沒有理會我們。

我們這麼勤勤懇懇地干活，從來也沒有人來夸奖，或是責備，也從來沒有人叫我們放下這些做厭了的、勞累的活計去稍為休息一會。

這一天，工作快完的時候，許多人都東張西望的，看看有沒有停工的動靜，因為逢到星期六，大家照例在廠里拉放工氣笛前十至十五分鐘就不干活了。

“任憑你怎么賣勁，活反正是干不完的！”別的幫里的一個鉗工在離我不遠的地方說，他也是一個像我一樣的青年人。我抬起頭來，伸伸懶腰，習慣地瞅瞅四周圍，想看看有沒有從哪兒鑽出個什麼人來的絲毫危險；哪兒都沒有這樣的人，於是我就一面打量着他，一面回答說：

“我們在干并包的活^①，因此我不願意落在別人的後面。”

“明天禮拜天，你們的一幫怎麼樣？還干活嗎？”柯斯嘉（我後來就這麼稱呼我的這個同志）有用意地問道。顯然，他早已發覺我是個願意走上爭取自由、平等和團結的光明大道的人。他有了這些想法以後，馬上就有一股教育我的

^① 并包，這就是說兩個工人或者幾個工人干同樣的活計，因而像上面所述的，一個人拼命拖另一個人，最低限度，不能落在別人的後面。——作者

旺盛热力。

“不，明天我們誰都不干活，”我回答道。

“空下来，你在家干什么？”

“没有什么特別事情要干，不过，不久，我們將要举办一次跳舞晚会，”我聊开了，心里也想叫他参加，去快活地消磨消磨时间。

“你家里有些什么書嗎？”他問道。“你有时候看看什么書嗎？”

我打心眼里感到慚愧，很久以来，什么書我都没有看，虽然我也有几十本書。但是，我不懂得这些書，因此它們一直躺在我的书架上，作为年青人房間里的一种体面的裝飾。然而，我心里想，我的这些書里，說不定也有柯斯嘉喜欢的書。于是，我就向柯斯嘉提議，哪天晚上或者星期天上我家去看看那些書。柯斯嘉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請，稍为沉默了一会以后，他向我提議，要我和他更接近一些，而且要我明天午后上他家去。我对这个友誼感到很高兴。虽然当时，我已經有了相当多的朋友，但是还没有像柯斯嘉这样对我的朋友。放工后，我們俩一起走。他常常暂时离开我，去同別人談几句话，然后再回到我的跟前，最后他把 he 住的房子指給我看。我們高兴地分手了，我答应明天一定上他那里去。

星期天，将近一点鐘的时候，我上柯斯嘉那里去了，很容易地就找到了他住的房子。女房东客气地把他的屋子指給我看，我走了进去。屋子不大，是正方形的。除了主人以外，里面还有两个青年人：其中一个，我很熟識，因为他是和柯斯嘉在同一个帮里干活的，另外一个，好像是他的兄弟。我坐下了。我們一对一地攀談起来，接着談話完全停下了。

这时候，柯斯嘉从什么地方里拿出一張印刷紙張來，交給他的一個朋友，要他看一下。這個朋友伸手接過去看着，而我們三個人則默默無言地坐着。我因為不知道這張紙上說些什麼，所以沒有特別注意柯斯嘉的朋友的閱讀情況，也沒有去注意這張紙頭對這個讀者起着什麼影響。但是，柯斯嘉和他的另一個朋友却有些異樣地注視着閱讀的人。看來，他們的神情都很緊張。大家都默不吭聲。最後，那個朋友看完了，把印刷紙頭折好，交還給柯斯嘉。他這麼做的時候，一句話也不說。我心想，這准是我不應該知道的私事。

“怎麼樣？好嗎？”柯斯嘉向那個仿佛感到很窘的朋友問道。

“行，很好，”那人回答道，接着就不吱聲了。空氣又肅靜下來，好像有些難過似的。

“也許，你也想看看？那你就看一下吧，”柯斯嘉說着，就把那張紙頭遞給我。

我打開來看了。從開頭幾句話里，我就知道，這是一件我有生以來從來沒有見過、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不平常事情。我看到的頭幾句話，在我心里激起了一種特殊的感情。思想不禁潛動起來，我好容易才接着往底下看去。這張紙頭說到神甫，講到沙皇，也談到政府，都是用責罵的口气。這上面每一句話都打動了我。我相信，這都是正確的，同時應該像這張紙上所勸告的那樣行動起來。這時我的脑子里幻想出一幅情景：我由於確鑿的行為被處死刑了，我的一生完了。然而，這時好像有一把鐵錘對我當頭插了一下，頓時，什麼天上的王國都化為烏有了，而且它們從來也不曾有過。這一切完全是捏造出來，愚弄我們老百姓的。

我立刻相信紙上說的一切，因而它越加強有力地影響

了我。我好不容易才把這張紙看完，感到這張紙在用汹涌的思想使我苦恼。心想，把這張紙立刻归还以后，紙上的詳細內容就不会存在心里了。但是，紙上的思想已經深深地銘刻在我的脑海里了。从此我就永远成了一个反政府的分子。這張紙是民意党人的。这是第一份秘密讀物，我从它里面生平第一遭看到了反对政府的直言不諱的言論。我默默不語地将紙头遞还给柯斯嘉，并且立刻領会到他請我来的用意，同时下定决心應該为这个事業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我深信，柯斯嘉也是用像我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業的，因此就这一点來說，我們已經是弟兄了。至于另外两个朋友怎么看待这件事和心里怎么想，我是無从知道的。我之所以沒有講話，因为他們也像我所做的那樣，表現了他們由于這張紙头而引起的愉快和滿意。

过了一会，这两个朋友走了。只剩下我們两个人了，我們便談起心来。显然，我已經取得了柯斯嘉的信任，因为我們的談話主題是討論問題：我們怎么才能再弄到这类文章和好的書籍，以便尽可能地增进自己的知識。柯斯嘉开始向我解說他很懂得的聖經，因为直到最近，他还是个虔誠的教徒，愛看宗教書籍。他竭力把神学解釋为只是被現在的神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學說。然而，柯斯嘉沒有說話的口才，不能把我远远地引到那方面去。接着，我和他一起到我的家里去。我們細看了我那兒的書籍。我力求在这些書籍中間發現什么好書。但是，我过去的購書兴趣現在對我們两个人說來是頗成問題的。我們決定下星期日一同到市場上去找好書。不用說，我也再三地詢問过柯斯嘉，他是怎麼弄到这些違法的紙头的。他說，有一天晚上，做完工，正要出厂，在另外一群工人中間，他被一个人喊住了，那人在厂

門口塞給他一張紙，說：“喂，回家什麼事也別干，拿去，看看它！”的確，柯斯嘉看了，而且為了和那個人談一談，幾乎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

不久，我和那個把紙頭塞給柯斯嘉的人相識了。當然，他知道我看過了那張紙，知道我對自己完全不明白的事業表示了革命的看法和革命的行動，知道我願意學習，再學習，願意按照給我的指示去行動，力求尽可能在一切便利的場合吸收恰當的人，而且進行宣傳。

我本來就猜出我們工廠有一個人正在領導這個事業，因為我曾經幾次看見柯斯嘉同他談話。有一次，在做工的時候，我和柯斯嘉兩個人去找他了。我是被柯斯嘉當作一個可靠的同志來介紹的。我被介紹認識的那個人，身量很高，一個典型的男人，長着一雙咄咄逼人的峻厲眼睛。他的目光一直刺到我的心裡，我可真的發慌了。我像犯了過失似的望了他兩眼，隨即就把眼皮垂下了，感到好像有一樣什麼沉重的東西壓在我身上似的。間忽，我也胆壯地抬起眼睛偷偷地瞧瞧這個使我感到透不過氣的人。這人的一撮又密又寬的淡黃鬚髯，激起了我對他的特別敬意，但是一遇上他的目光，我又變得軟弱無能了。這些都太奇怪了。以前，我看到這個人，或者從他身邊經過，從不注意他，而且也沒有感到什麼不尋常。他那時在我的眼睛里是個極其平凡的人。但是，現在，當我自己想變成另一種人的時候，卻在自己面前看到一個有覺悟、有毅力、有膽量的人。這人現在想洞察我的心靈是否真摯，想弄清我的性格是否堅定，想知道我的願望是否赤誠，——在他的凝視之下，我產生出一種特殊的恐怖感覺，以致我沒有能夠說出一句話。

Φ 給我的就是這樣的印象。有一天，我走到他的機床

跟前，打算从他那里听到一些特别有教益的话，然而第一次，他却用严厉的词句和问题把我吓唬走了。

“怎么？你在胡想些什么啊？”

“我想弄一本好书看看，”我喃喃地说。

“你要它干吗用啊？你看了一本好书，打算干什么？”

“情形很糟糕，”我说，“你瞧，别人都欺侮我们，不肯说真话，全都在骗人。”

“知道真话以后，你想干什么？”

当然，我没有吭声，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类问题是好。回到虎钳机床跟前以后，周密地思考起他向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不用说，我对Φ很不满意，他自己什么都没有说，却逼着我伤脑筋地去思考这些我应份不会知道、而且完全不懂的问题。但是，我对这一切的看法是，他们想考验我。我并且认为这些是对我的不信任，因此感到有点难过。但是我相信，我是会把这些问题完全弄清楚的，而且一定会弄懂它们。我和柯斯嘉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我们随时随地地都在一起，经常讨论各种问题。很快，我们也有了秘密书籍，大部分都是民意党人写的。我们对于这些书简直入了迷，竭力想办法小心地把它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

这时，我们的交友圈子也逐渐扩大了，逢到礼拜天，不是我们去看别人，就是别人到我们这儿来。生活情况发生了大变化，家里也好，厂里也好，周围的环境都起了显著的变化，但是我们对这点没有十分注意，仍旧一心一意地干新的工作。用不着说，我们只要发现对方和我们谈得投机，马上就想办法弄一本什么秘密书籍给他看。但是，我们在结交新朋友方面非常谨慎。首先，我们对于那些喜欢三天两

头喝两盞的人、平素生活不檢点的人，以及和厂里的领导亲戚带故的人，都尽量避开，不和他们来往。既然我们自己非常年青，因此我们也最喜欢和青年人接近。工作上的一两次的失败，已经使我再也不敢接近有家眷的人、中年人，或者中年以上的人了。因此，选择对象的范围，显得十分狭窄。

我时常听到工人们谈起革命家们的旧事，谈到他们被捕和被关进什么石牢等等的情形。然而听得最多的是：很多人被捕以后，就永远不再回来，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有时候，我们也和一些盲目相信自己的谈话的工人们争辩，但是我们也不是常常在这种争辩中占上风的。毫无疑问，这类谈话之所以形成，是有一部份根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过去住在工人中间的知識分子常常被抓走，后来再也看不到他们，而且得不到关于他们的丝毫信息。因而，一些無知的工人就异想天开地捏造出各种各样的荒誕無稽的故事。这些故事慢慢地流传开来，同时由别人任意地添上形形色色的恐怖情节。这种恐怖情节过去和现在一直成了吓唬所有多少有些迷信、还不了解工人运动的、見識不广的人的工具。我和我的朋友竭力不同散播这种幻想的人去谈话，去争辩。但是却特别乐意听这样的谈话：塞棉尼可夫工厂过去如何发生風潮，以及从前（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里到处都有人偷看秘密書籍的情况。

由于时常看到各种秘密書籍、接近具有革命信念的人、和同志们談論革命的問題、制定各种改变整个生活制度的計劃，使我们这两个在严格的辯論中經不住考驗的人，生活經常过得非常激动。我們过去認為極其尋常的、还没有發覺到的这种生活，給我們的印象越来越新鮮。

这时候，我們对于加班加点的工作，从心里感到憎恨。傍晚，我們从楼底下走过車間的时候，总是恶狠狠地瞅瞅挂在牆上的亮着的电灯，玻璃上写着一排字：“今天小夜班，晚上七点到十点半”，或者“今天大夜班，晚上七点半到深夜二点半”。这两排字天天来回替换，也就是說，今天小夜班，明天大夜班。因此，我們每月都得工作三十天到四十五天，因而塞棉尼可夫工厂里有一些工人常常十分恶刻地說：“你我这个月过的日子比上帝过的还要多”，的确，該死的小夜班和大夜班有时候一个月叫我們多过二十天。

这些夜班到底剝夺了每个人的多少健康，是很难想像的。然而，他們把事情安排得十分狡猾，以致每个人在領工資的时候，总是确認，如果他們少做大夜班或者小夜班的話，就要比从不放过一次加班活的人掙得少。結算的情况是这样的：全帮的工資总額按照天数来分，而余下的錢是按照工資的百分比来分的。最好是做不太紧急的活計，那时做完当天的活，就可以如願以償地回家；要是碰到做急件，領班就要强迫全帮干活，那时工厂里的放工汽笛的响声，就变成了恶刻的諷刺，好像是开玩笑。这种笛鳴只是說：今天夜里，你还要留下来千儿小时活，別人已經关切地从記工板上摘下你的工号牌，交到領班的办公室里去了，而沒有工号牌是决不讓你出厂的。你要是到領班那里請求的話，多半是徒劳的，結果不是和領班吵架，就是被解雇。这类事件，天天都会發生。工人們任意恶罵，咀咒工作，但是仍然得干夜班。我和柯斯嘉过去經常在夜里工作，絲毫不覺得特別累，不知道这种工作会損害我們的健康，一直到讀了秘密書籍为止。現在，夜班工作却使我們感到相当的疲倦，因而我們开始利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它。我們还鼓动老师傅

們出來反對做夜班，說明做夜班的害處。

我和柯斯嘉雖然在工廠里做工，但是絲毫也不明白工人的生活情況。我个人不論在生活起居方面或者在經濟方面都過得相當好。同志中間，有一個年青小伙子，過去在工廠里做過工，他的一舉一動都和工廠里的工人一樣。他對我們談的一席話，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我們很想去看看，實地了解一下我們還不知道的這種生活。我們決定去找工廠里的同志，這樣，不僅可以上他們那里去，而且還可以對工人宣傳。我們逐漸了解了工廠和工廠的生活，認清了工廠里的現存制度，以及其他等等。

有一次，一個同志談起工廠生活的时候，想起一個廠主為他的工人建造的一所新房子。據說，這所房子在工人的工廠生活中很特別。然而，我們很難想像出這是一座什麼模樣的房子。也不知道它是一座設備特殊的房子呢，還是一座工廠氣味濃厚、好壞雜處、快樂與丑惡混淆的大工房？更不知道它是否是一座有些恐怖的房子。

因此，我和柯斯嘉決定禮拜天上那兒去一次，細細地瞧瞧這所房子，看看那兒的居民等等，但是想起外面人很難走進這座工廠宿舍，於是我們決定冒充一下這個廠里的工人。星期六晚上，我到亞歷山大市場去，買了一件帶腰帶的紅斜紋布的普通外衫和一頂合適的鴨舌帽。星期天，我裝扮成這個廠的青年小伙子的模樣，怪不好意思地偷偷走出屋子，去找柯斯嘉了。因為害怕別人注意我們的衣衫，從那里，我們也是非常狼狽地出來，順着斯里塞布爾格大道往瑪克斯維爾工廠走去。過半小時，就到達那兒了。

在離大路約莫四十俄丈遠的地方，出現一座巨大的鋼筋水泥的建築，它的外表還非常的新。“大概，這就是，”——

我和柯斯嘉認定了，接着就沿着一条稍稍狹窄的巷子和鋪筑好的軌道向这座誘人的房子走去。我們走进院子以后，就看到一批一批的男女工人。男人，大多是青年人，他們一堆一堆地站着，看来他們是在指手划脚地討論着什麼問題。姑娘們东一处、西一处地坐着，同其余的人离得远远的，有的到处和小伙子們瞎鬧，常常嚷叫着奔到一边，一会工夫又回到原来的人群里去。这一大批青年男女，活像生活在某个省份里的一座大村庄內。姑娘們的五顏六色的衣服，刺人眼目，它們同城市妇女的服装不一样，尤其和首都妇女的衣服不同；年青的小伙子們，有的穿着酒瓶子似的长皮靴，有的拿着手風琴，有的穿着短到小腿肚子的褲子；許多人穿着特別肥大的衣服，有的穿粗布的条紋褲衩，有的穿着紅斜紋布或者印花布的短衬衣，用一条不甚美妙的帶子束着，脚上套着露出光脚面的破鞋。他們絲毫沒有因为穿这些衣服而感到害臊，也沒有人羞辱他們中間的任何人。这些衣服的簡陋，給我的印象很不愉快，虽然这是一幅我相当熟悉的圖画，很像过去在喀琅斯塔得做工的斯摩梭斯克来的粗木工。

我們决定先去看看这所房子的內部情况，然后再到院子里走走，同这些工人們聊聊。这所房子的正中央有一扇大門，一直通到里面，时刻都有人出进，因此我們就走进去了。一座又大又寬的楼梯告訴我們，这所房子能住很多人，牆上塗着普通的白粉，还很干淨，結实的铁栏杆使人相信，这所房子是紧严而又牢固的。我們登上一座楼梯，走进过道。一股臭惡的、窒息人的气味像把斧头似的对准我們的脑袋捶了一下，整个过道上都充塞着从不衛生的厕所里傳来的臭气。我們不走这層楼的过道了，又上了一層。这里

的空气稍为新鲜些，但是也同样有那种讨厌的、窒息人的臭味。我們在这个过道上走了一段，就回头再往上一層楼上去了。这里的情况也不美妙，但是我們决定仔細好好看一下，我們沿着过道走进厕所，从那里望望風色，然后鼓足勇气，推开一間小屋的門，往里面張張。显然，我們的行动沒有引起別人的奇怪，也沒有人問我們找誰。

我們推开一間小屋的房門，里面什么人也沒有。我們安然地走了进去，随手关上房門。這間屋子的全部陈設，都擺在我們的眼前了。左右两面牆，每一面牆的旁边都放着兩張床。這兩張床几乎把整个屋子的长度都占住了，沒有絲毫間隙，好像屋子的长度是按兩張床的尺寸来量好的；兩張床中間的窗戶跟前，放着一張小桌子和一把怪模怪样的小木椅子。這間屋子的整个情况全在这里了。每張床上睡两个人，也就是說，一間屋子住八个单身汉。他們住这个工房，每个月得付……說得正确些，每月得从他們的工資里扣一个半卢布到两个卢布。这等于說，这样的屋子，每月的租金是十四到十六个卢布；而每个工人每月挣的工資，不过在八个卢布和十二到十五个卢布之間。但是厂老板还驕傲地認為，他对待工人是乐善好施的，在雇用他們做工的时候講定，只要这所房子沒有挤到水泄不通，都要叫他們住在里面。

我們走出這間工房，又去看了好几間。所有的工房都是大同小异的，給我們的印象很坏。我們心里还想去看看替有家眷的人盖的公共廚房、洗衣房和住屋。有一間屋子，里面的陈設很簡陋，只放着一床用数不清的五顏六色的碎布拼縫起来的被单，盖在一張挂着帳子的床鋪上。帳子的用处有两个：一方面，它能用来遮旁，另一方面，它又能滿

足一下做人的起碼的羞恥心，因为旁边也是这么一張床和这样的家庭生活。这一切都是很可怕的，它把我这个过着較好生活、具有种种要求的工厂工人压得連气都透不过来。

我們往外面走去。在寬大的楼梯上，我們站下来仔細地望了望救火的器械。但是，这些水龙带、鉛管、鉛制器具，都不能使我們感到好感和信任；这些亮晶晶的銅質的水龙头和螺釘帽，既不能抹去那些光光的、醜惡的、密集的床鋪給人的印象，也不能消除人們在上面抹死無數臭虫的牆壁給我們留下的記憶。后面，过道上有人在大声呻吟，那里还不絕地傳來一陣一陣令人厭惡的空气，以致我們心里越来越強烈地痛恨那些压迫人的人，憎恨使人沒法弄清不想活下去的原因的愚昧現象。

唉！应当尽可能多地把知識輸送到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来。

只有臆想到下面的情况，心里才感到輕快些：这所房子里也許已經有人在对工人做工作了，說不定，聚集在院子里的人中間就有有覺悟的工人，他們的人数会一天比一天地增多起来。柯斯嘉居然还出声地計算着有覺悟的工人累加的数目。然而，这样的計算，是决不能相信的。这种計算有时候会使人十分失望，因为过于乐观了，反倒会悲觀。这是順便談談的。

我們走到院子里，呼吸呼吸新鮮空气，然后走到一大堆工人跟前。原来，这里在玩擲錢的賭博，几乎所有站在这兒的人都狂热地参加在里面。这些人的臉部都非常緊張，同时还破口恶罵着，以致使我們感到，馬上就要大打出手，鬧出人命案子来了。我們轉到另外一堆人的跟前。这兒在玩

扑克牌的賭博，也是罵声响天。这堆青年男女决不会讓我們挤到他們中間去，因为这非得具有接近乡下美女和談話討她們欢喜的本領不可。不速之客如果这么做的話，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我們只好远远地瞅着他們，在大院子的草坪上蹣跚。我們看了看地窖和儲藏室，还看了一些不太使人感兴趣的東西，接着我們就走出这个特别的工厂宿舍。我們对于我們亲眼見到的事情的印象很坏，而且对于那些在乡下待过、現在住在这里显然很感幸福的人的印象也是坏透了。这是我們第一次有意識地了解工人生活。这种恶劣印象，长時間地印在我們的心里。后来，在另一个地方，那里的工人生活真使我气愤極了，以致我簡直無法明白，一个人怎么会忍得住过这样的生活，怎么会只需要这么低的要求，而且对这种穷得可怜的半飢半餓的生活还十分知足。

要曉得，就是一堵必須加以推倒的墙，当它剛剛有些傾塌的时候，也不是几推就能把它推倒。我們对于我們所見到的東西的印象是十分强烈的，但是我們並沒有对它袖手旁觀，相反的，是更加努力地去进行深造自己的工作，更加希望赶快地去抵制这种可怕的剝削手段，去扑灭这种对人民的蹂躪和愚弄，同时埋头磨炼我們的斗争武器。这就是說，讀書和提高自己的覺悟。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沒有別人的帮助，我們自己决不可能这么快就弄清許多問題。我們的知識十分膚淺，我們在宣傳的时候經常發生爭論。我們的對話人提出的多少有些机灵的問題，常常把我們弄得走头無路，尽管我們确信我們的話是公正的，但是我們还是覺得自己是失敗了。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和柯斯嘉对某个經濟問題得出了一個奇

怪的結論。這是一個有關計件工作的問題。我們向別人宣傳的時候，總是向對方提出一個預先想好的問題：現在對工人來說，勤儉好呢，還是偷懶好？回答的結果，總是勤儉的好。於是，我們就向他說，要是干活賣勁的話，就可能產生兩個後果：第一、會很快地降低工資；第二、一個工人干兩個工人的活，會使大部分工人得不到工作做，反過來又會影響工資，使工資急劇降低，等等。但是，要是慢慢磨洋工的話，情況就不同了。那時候，工資會很快地漲起來，至少不會往下落。同時，因為工作完成得慢，又會增加工人的名額。這樣，失業的人就會減少，工資也會上漲。看來，我們好像講得很有道理，但是別人都不樂意贊同我們的這種說法，儘管他們找不出反駁我們的論據。而我們自己呢？雖然覺得自己是個勝利者，其實心里也想不通，懶漢既然比勤儉的人對社會更有用處，那他們怎麼沒有出頭过好日子呢？諸如此類的問題，常常發生。我們去請教Φ來替我們解釋。Φ看到我們的社會主義思想很濃厚，但又沒有機會和時間同我們談話，便把我們托給他的一个朋友。這人就住在我們的附近。

我們的這個新的領導，是個很不笨的人。他給我們的印象很好。顯然，我們只要一有空，就去請教他。除此以外，他的家庭生活，也像塊磁鐵似的吸引我們去找他。一間單間的屋子，里面的環境，不論從哪方面來說，都使我們感到十分舒適。它給我們繪了一幅我們未來的起居的圖案。在我們這個新相識的家里，我們經常感到滿意的是，第一，可以常常得到書籍；第二，可以得到他要我們謹慎小心的勸告。我們知道，他在組織內部擔任會計職務，而且做我們和城里的組織之間的聯絡員，並且知道他認識很多知識分子，

而又熟悉各方面的情况，因此我們从他这里可以学到許多东西，听到許多卓越的思想和他對我們感到十分不安的問題的意見。真的，他最初給了我們两个人非常好的影响。他特別教导我們，要在对人的关系方面細心謹慎。每當我們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都要詢問我們，問我們来时是否留神，后面有沒有狗腿子跟着。也許，他是为了害怕自己受連累。他在他的妻子的影响之下，經常向我們反复叙述有关特务、搜查和釘梢的事。这些對我們都很有用处。我們学会严格观察自己身后的情况，尽管实际上沒有人跟踪我們。我們在工厂里的行动开始謹慎起来，逐渐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別人居然还把紅巾会的报告給我們看，此外，还送給我許多好書，还有各种已出版的禁書。

一部分冬天和整个春天就这么过去了，夏天已經来了。又将入秋了，随着秋天的来临，大家盼望已久的星期日学校也将要开学。有关这所学校的事，我們已經听到过很多的話。有人對我們說，这所学校有很多好处：在这所学校里，可以很好地物色人，主要是能得到知識；这所学校的全体女教师，都是义务教書，目的只是为了讓老百姓得到知識；她們准备为老百姓忍受政府的一切迫害。柯斯嘉和我心里都很明白，这些女教师是些什么样的人，因此我們迫切地盼望这所学校早日开学。我們竭力劝別人也去报名上学，但是大多数人都回答說，要做小夜班和大夜班，不能上学。这倒是实話。特別阻扰人們無法上学的，是換班的工作。但是，我們至少劝动十五个人报名上星期日学校去念書。关于这所学校的事，我打算留到后面来談它，現在我想回头重新談談我最初了解地下工作的經過情形。

起初使我感到害怕的Φ，当然不会撤下我們不管。他

竭力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适当时机来影响我們，給我們解說我們所不懂得的問題。他給我們的印象很深刻。我們拿他当家长看待，特別敬重他。我記得，有一次，为了閱讀第一份地下傳单，我和柯斯嘉上Φ家里去了。这是一所黑黝黝的房子，好像有两間屋子，租金十分昂貴，屋內的光景簡陋得給我的印象特別深。我記得，我为了上那里去，穿得相当講究。穿着漿領的衬衣，等等。然而，屋子也好，屋子里的住戶也好，都好像在仇視我的衣服似的，因此我覺得很窘，好像犯了什么过錯似的，一面暗暗地咀咒自己的漿領衬衣。我拿定主意，下次穿得朴实些，而且已經考虑到完全抛掉这种浮华的装束，尽管后来我又改变了这个主意。

在这間屋子里，我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个知識分子，我們称他为 П·И。他給我們留下的，永远是最好的回忆。他是我所了解的人中間的第一个人。他抱着一个特殊的目的和工人接近，讓他們得到知識，懂得生活。为此，他受到了种种的困苦。

很难說明，我和柯斯嘉对这种人的尊敬程度。應該特別提到的是，我們这些文化很低的人对其他階層的人如此大公無私地讓我們获得知識这类行动，是不可能不感到奇怪的。在同别的知識分子或者同女教师十分接近以后，我們心里还是久久地怀着这种感情。要是失掉一个这样的知識分子，我們會万分难过。为了他們，我們甘願去赴湯蹈火，甘願去忍受一切痛苦。当然，和知識分子們常常見面，也会逐漸對他們失掉了像对待特殊人物那样的特殊感情。同时你又会感到既失掉了最亲近的工人同志，又失掉了有學問的同志。但是，同知識分子經過一段長時間的交往以后，結果，那种在初次会面中結成的特殊感情便会漸漸冲淡，而

變成平常的真誠的感情了。

我和柯斯嘉在Φ家里和П·И初次會面的那個晚上，一直貪婪地傾聽別人講話；我們迫切地希望干一件什麼特別的事情，然而我們什麼也不懂，只是抱歉地望着別人，聚精會神地听着。除了我們以外，還有三個人，再加上屋主Φ。我記得，還有一個人也在場。那知道，這人後來竟當了奸細。這人就是柯茲洛夫。我和柯斯嘉特別信賴他，這個情況只是在我們最初相識的一段時間。

我現在很難表明，我們當時的觀點和民意黨人意圖之間的分歧，究竟尖銳到什麼程度。然而，這些分歧是存在的，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上面提到那個知識分子給我們拿來了一份民意黨人寫的傳單，交給Φ，同時問他，這份傳單對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是否合適？看上去，好像Φ否定了那份傳單。我們也沒有見到那份傳單。後來，當我們問到那份傳單的時候，他的答复是，傳單丟了。我們沒有參加過我們的人同民意黨人進行的辯論，因此不知道雙方在觀點上有哪些分歧，但是我們還是站在社會民主黨方面，也許，這是受Φ、知識分子和我們的友人的影響。民意黨人的傳單不大在我們的地方出現了，而且我們也不大喜歡贊成民意黨人的活動的人，最討厭那個——我說後來當了狗腿子的柯茲洛夫。我們還特別厭惡一個民意黨人，這人和我們同在一個車間里做工。他經常在談話中談他的謀刺沙皇的計劃。但是，這些只是一種幻想和計劃罷了。我們從來也沒有看到我們的民意黨人有过什麼真正的行動。這類話，我們都聽膩了。事情明擺着：要是他真有勇氣去行刺沙皇，或者去殺害和沙皇相等的人，他就應該是個陰謀家，要不，也得是個秘密活動分子；他要是重視自己的計劃，就會惦念着

去执行它。因此，他應該对自己的活动諱莫如深。等到暗杀計劃一旦成功，人們一定会像敬重英雄那样地去敬重他，不过他的理想决不可能对群众起大的影响，因为群众不可能了解他的这些理想。敬仰他的人，縱然很多，然而决不会拥护他。可是，这样的人，我还没有见过，不过，我却见到了这样一些人：他們光喜欢空談各种暗杀勾当，除此而外，甚么都不会，甚至也不努力去宣傳一下他們的思想。

因此，很多純潔的人等着要我們去宣傳。當我們去寻找我們認為可靠的人，并給他一本禁書和一本合法的書，或者向他提出有关学校和學習的問題的時候，我們总是發覺，还没有人同他这么談过話，还没有人影响过他。但是，我們認為，单憑我們的能力，要去說服一个比我們活在世上年岁多得多的，是很不够的。

有一次，我在班上去找一个民意党人。这人把他的一个爆炸冬宮、謀刺沙皇的荒誕計劃，告訴給我听。我虽然認為这个計劃沒有特殊意义，但是自己却老是嘀咕着這個問題，竭力想說服自己，由我們来执行这个計劃。这个計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它要求有一个幻想，而这个幻想又要是誰都没有想到的。因此，計劃本身完全是捏造的，但是我自己解釋不了這個問題。我怀着这个情緒去找Φ，談到了那个民意党人的計劃。Φ听完后，冷冰冰地回答道，要是有人想謀刺沙皇的話，可以不必費这么大的心思，只要跑到涅瓦大街，租一幢上等房子，或者到旅館里去租一間屋子，等他路過的時候，開槍打他就行了。人能够開槍打得死麻雀，难道打沙皇就这么难嗎？妙極了！这样的答复，可真把我窘死了，而Φ那張老是繃得板板的臉上的譏笑太羞辱人了。我为我的这个思考那个荒謬計劃的笨脑袋，感到万分的遺憾。

受到Φ目光羞辱的我，回到家里，拿定主意，再也不会同他谈这类问题了，并且对他很冷淡，自己埋头读书看报。我甚至常常头伏着书本，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慌忙熄灯，不让大街上的警察和司閤在夜里看到我的屋子有亮光。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地过去，我们常常几乎每天都做大夜班和小夜班，甚至星期天还干活，因此我们没有空余时间看书，即使间或碰到一点闲工夫，也白白地消磨过去了。虽然，我还在最好的年岁，但是我已感到某种特别的疲倦和困乏。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大大地影响我的健康。Φ从来不做大夜班。我们知道他每天都和领班吵架，结果往往是Φ拿回自己的工牌回家去了。这种情形所以可能，原因是Φ是个非他不行的工人，此外他总是同意别人给他计算的工帐。这时，他们总是想用这点来吓唬他。我和柯斯嘉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厂方第二天就能用新工人来替代我们。因此，我们只好一直待在车间里，甚至一个星期总要有两次在机床底下过夜，为了免得把时间浪费在路上。

每个星期六的早晨或者晚上，我们总是在Φ的家里聚齐，上面提到的П·И也上那里去。他给我们诵读拉萨儿^①论“第四阶级的思想”、论文化史、论阶级斗争等著作。我们因而很愉快地过了好几个星期天，慢慢地越加了解革命活动，和革命活动融合在一起了。我们在这里还认识了П. А. 摩洛索夫^②。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工人中间最有学问的人。我们常常向望着自己几时也能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只有一件事不赞成他：他喜欢喝两杯，有时候还喝得酪酊

① 拉萨儿·斐迪南，1825—1864年，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活动家。列宁称他为旧式的黑格尔主义者、好战的唯心主义者和先进科学的敌人。——译者

大醉。

我和柯斯嘉認為任何一個有覺悟的社會主義者，都不應該喝酒，甚至對於抽煙，我們也加以譴責……同時，我們還嚴格地宣傳這方面的品德。總而言之，我們要求一個社會主義者在各方面都是一個完人，自己也努力常常做別人的表率。我和柯斯嘉彼此間沒有絲毫秘密。我們甚至想同住在一起，但是由於我們都各自租着住屋，根據各種私下的打算，我們決定還是把兩間屋都留着，以便將來建立兩個學習小組。要是只建立一個小組，那就輪流在這兩間屋子里進行學習。

我們這時候获悉，已經有人在注意Φ了，逐漸擔心會失掉他。П. А. 摩洛索夫為了防范萬一，決定去尋找一所單幢的房子。他很快就利用上這幢房子了，然而這反而把情況弄糟了，因為這幢房子里住着好幾個受到憲兵注目的人，其中也包括Φ……

在這幢房子里，Φ存着很多書籍，好像整個涅瓦關的書店似的，但是我們沒法從這裡得到最大的滿足，懊惱自己沒有一點看書的時間。真的，為了看鮑凱里^③的一本書，我們

② П. А. 摩洛索夫——織布工人，是對彼得堡工人進行宣傳的鼓動員。他曾經幾度被捕和流放。他在索里維契城流放時，同 Н. Е. 菲道席夫過往很密。在沃洛城流放後，又流落到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在那裡身患重病，但是仍然從事革命工作。1899年4月，他重新被捕了。出獄後，他在貧病交迫的情況下被送到斯摩倫斯克省綏喬夫市，後來死在那裡。列寧主辦的“火星報”在紀念 П. А. 摩洛索夫的文章中說道：“死者是我們運動中的優秀的鼓動員之一。”（1901年5月第4號）——俄文版編者

③ 鮑凱里·亨利·湯麥斯，1821—1862年，英國自由資產階級的历史學家、社會學者和實用主義者。他把社會發展史解釋為地理條件對各民族的心的影響。他把歷史的內容歸結為理性的發展。——譯者

至少得花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時間。在这种只有一点有限的空閑時間的情況下，我們看見書籍，情不自禁地從心里感到特別羨慕，然而看書還是看得很少，只好通過和跑來看我們的П·И的談話和短短的討論來提高自己。當然，我們和從前是不同了。令人感到興趣的是，摩洛索夫從家里進進出出地都帶着書：他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在自己的身上藏上十五本書，而且走過特務身邊的時候，一點也沒有危險^①。

在這間屋子里，我們認識了許多紡織工廠的工人。因此，我們的交友圈子慢慢地寬廣起來，我們的眼界也擴大了，但是就是感到時間不夠。我們也知道，紡織工人干活的時間并不比我們少，然而他們掙的錢却比我們少得多。（在紡織工廠干活，是從早上五點鐘到晚上八點鐘。而我們連加班的工作時間在內，是從早上七點鐘到晚上十點半，或者從早上七點鐘到半夜兩點半，然後再是早上七點鐘到晚上十點半。）因此，我們的情況是相當被人眼紅的。正因為如此，我們也就更加熱切地希望大家一樣平等地干活。

這個冬天就大概這麼過去了。我和柯斯嘉什麼特別事情都沒有做，好像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生過什麼特殊事件似的，到處都非常寧靜，工人們沒有鬧事，靜靜的。不過，要是哪個地方出事的話，我們也不大知道。因為那時候，大家都認為少談為妙，而工廠里也沒有人發傳單。我們所殷切盼望的夏天來了，然而它不像我們所盼望的那樣。

夏初，也許還在春末，有一天，我們早晨上班的時候，發

^① 這個辦法後來被先兵知道了。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常常發生這樣的事，警察和特務用手推撞他們認為可疑的人。如果發現這人身上帶着書，便當場把他逮捕起來。他們用這種方法曾經屢次逮捕過身上藏着傳單和禁書的人。——作者

現Φ不在了，很吃驚，跑去找先前和Φ同住在一起的另一個同志，可是除了說Φ大概睡失覺，下午一定會來以外，從他那兒什麼消息也打聽不到。我和柯斯嘉預感到事情很嚴重。我們三番兩次地下樓到Φ干活的車間去，但是全都白跑了。每一次，我們都是失望地回來，而且越來越強烈地感到這個人對我們的寶貴和重要，同時意識到如果我們的預感証實的話，對我們說來，這將是一個大損失。吃晚飯的時候到了。第二天一清早，我們就趕到班上去等候消息，因為我們也害怕到Φ的家里去。忽然，一個同志垂頭喪氣地走來，他詳細地把Φ遭到搜捕的情況告訴了我們。當然什麼違法的東西都沒有被搜到，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收藏得很好。不過，他們還是逮捕了他，把他押走了。他現在在哪兒？情況怎樣？我們都懷着這些心思分開了。每個人的心里都很难過，每個人都擔心自己會遭到不測。

車間里在熱火朝天地干着活，大伙都忙着趕快做完各人的活計。這是為啥呢？是為了趕快接別的活計。重新忙着干嗎？是為了急如星火地加油干活嗎？究竟是為了什麼呢？……仍然為的是：老板需要利潤！因此，你得在老板把應付給你的微薄的工資扔給你以前，拼命地、頭也不回地干活！這時候，我的眼前又浮起一幅憲兵警察到來的圖景。

我們的Φ沒有了，我們的家長和父親沒有了，同時又失去了他那深思的目光、嚴肅的面龐、他的鋼鐵般堅強的毅力、還有他那無畏的勇氣。唉！失掉這樣的人，是非常難過的，尤其對一個對這種損失還不習慣的人來說。後來，我很安然地看待逮人的事了，那樣做，情況就不同了。但是，對現實妥協，畢竟是很難過的。

我和柯斯嘉現在開始考慮別人過去替我們決定的問題

了。Φ的被捕使我們的青春倍增活力。但是，我們的好朋友却竭力向我潑冷水，他这样做是枉然的。我們背地里称他为胆小鬼，算不上是个人，尽管我們还是繼續不断地請教他給我們解釋各种各样的問題。他在这方面滿足了我們，不过反复叨嘮，想叫我們暂时安靜些。他說：不然，你們會落到監獄里，过早地把自己坑害掉。这番話對我們不起作用。我們还是繼續努力干自己的事。柯斯嘉这时候調到另外一个車間去了。別人叫他到那里去管理一批学徒。他現在有很多宣傳工作可做了；情況要求我們設法去弄各种小冊子。我們挨着書店去尋找，甚至到好多地方去詢問兩本違禁書籍，我們不知道它們是禁書。最后，我們終于慢慢地做出一份可以到處詢問的書籍目錄了。

我們虽然感到自己孤單無援，但是並沒有灰心喪氣。柯斯嘉順利地在他的車間里替 П. А. 摩洛哥索夫找到了工作。我們對這件事感到十分高興，因為紡織廠過去不要他，還因為他從此就能生活安定，保障自己的經濟狀況。我們最高興的原因是：他能在我們緊跟前領導我們，啓發我們，讓我們得到新知識。那時候，我們就能比較容易地推進自己的事業了。情況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我們必須着手啓發年歲和我們相仿的青年，以及許多比我年青的人，同時揭發廠方施行的某些剝削行為。這時候，柯斯嘉在一個受我們影響、家庭負擔很重的人那里租到了一間屋子。我總是在吃晚飯的時候去找柯斯嘉。每次碰到柯斯嘉，我總是再三詢問他，這天他和摩洛哥索夫談了些什么話，心里很想打聽到一些有趣的事。但是，柯斯嘉說摩洛哥索夫現在只埋頭工作，新的工作把他吸引住了。我們希望他趕快把自己安置好，那時候他就能和我們暢談了。情況完全出人意外：有

一天，宪兵队把他叫去了，随即把他逮起来，关进拘留所了。这件新的事件，完全把我们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我们几乎失掉了一切领导，因而我们的好朋友也越来越厉害地用各种话来吓唬我们。他要我们把存在他那里的书拿走。在我们没有把这些书拿光以前，他一看见我们，就反复地怨怪我们……

总之，这个夏天，我们作为两个成年人开始进行宣传工作，纵然我们感到自己做独立工作还没有充分的把握。果真，什么事也没有做成，我们被迫同情况妥协了。没有Φ，没有知识分子П·И，没有摩洛索夫，我们不由得常常感到自己的境况十分孤立。忽然，有一个人到涅瓦关来找我们了。这人早就熟悉各种革命活动，革命经验也很丰富，而且无条件地忠于事业。我们立刻感到了一股新的活力。同时，我们的处境也立刻好转了。无论哪个星期天，我们都不约人到自己家里来，自己也决不上别人那儿去。同派尔、玛克斯维尔、托尔东等纺织厂以及尼古拉铁路工厂的联络，已经安排就绪，会议开得很频繁。参加这些会议的，虽然纯粹是一些个别的人，但是大伙的目的和意图都是一致的，原因是运动高涨了（如果能够这么说的话）。

我们由于一心一意地埋头从事革命工作和交友的活动，连星期日学校几时开学，都没有去注意。大家迫切等待的开学日，终于到了。当然，我们大家都去报名进这个学校。这所学校既是一个健全的文化机构，也是一具从泥沙中筛取谷子的筛子，而且也是一架使两个东西互相撞击的机器。这里的社交圈子虽然不很广，不过也够复杂的了。这时候，我们已经在准备进行经常的小组学习。说不定，还有别的一些小组，但是我们不了解它们，同时也不打算去打

听它們。彼得堡剛一入秋，各方面的知識分子都紛紛來了，跟着便掀起緊張的腦力勞動。我和柯斯嘉忙着做各種各樣的緊張工作，因而干脆不回家。一個新朋友，我們稱他叫H（B. A. 謝爾貢諾夫^①——俄文版編者）的，是個工人，住在涅瓦關的後街。他和一批知識分子有聯繫。這批知識分子的外圍，好像有很多工人，因而他們想在涅瓦關領導經常的小組學習。H組織了一個學習小組。我的屋子比較方便，做了學習場所，因為我那裡沒有外人。這個小組是六個人組成的，加上講解員，一共是七個。於是，關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學習便開始了。講解員^②向我們口述了這門科學，沒有用筆記本。他常常設法啟發我們站起來反駁或者爭辯。那時候，他總是鼓勵我們，要一個人向另一個人辯明自己對某個問題的看法是正確的。由此可見，我們的學習是十分生動有趣的，而且還會慢慢地把自己養成為演說家。這種學習方法是向學員說明問題的最好的手段。我們對這樣的學習，感到非常滿意，而且對我們的講解員的智慧常常感嘆不已。我們暗地里俏皮地說他的禿頂的原因，就是他過於聰明了。這些學習還教導我們去自修，去找尋參考資料。我們從講解員的手里拿到了上面寫着許多問題的紙頭。這些問題要求我們留神了解和觀察工廠里的生活情況。於是，我們在廠里干活的時候，時常假借各種借口到別的車間去，實則是通過觀察的途徑去收集必要的消息。有時候，得便，我們還交談一番。我的工具箱經常塞滿了各種紙頭。吃飯的時候，我總是設法偷偷地抄錄我們車間的工作日數

① B. A. 謝爾貢諾夫，1867—1939年，俄國革命家，聖彼得堡的冶金工人，布爾什維克。——譯者

② 講解員是列寧。——俄文版編者

和工資數。毫無疑問，缺乏空閒時間，是搜集各種消息的主要障礙。但是，事情還是有所進展的，雖然不像應份的那樣完滿而熱烈。

學校中的學習，還是照常進行。女教師們的生動而又巧妙的言詞，引起我們產生出一種對學校的特殊熱忱，而我們的議論也是沒有完的。女教師們採用的辦法，我們很了解，而且驚嘆她們有一種激發每個學生坦白說話的本領。這些學生中間有小市民，有工人，有農民。我們每來一次，就越加緊密地同學校和女教師接近。我們感到自己特別同情她們，彼此間都產生出某種親近的、純粹思想上接近的感情。大家一走進學校，就坐在課桌旁邊，懷着某種特殊的感情等待女教師。她的到來會引起某種難于描摹的快樂。每一班里都有這種相同的情況。所有上學的学生都不能不欽佩和贊揚他們在學校耳聞目睹的一切事情。原因是，這所學校是如此深奧而巧妙地傳播着知識。不僅如此，常常還有個別的人帶朋友到學校里去看看女教師，聽听课。我自己就曾經抱着這個目的到別的班里去過。

女教師還想在校外影響我們。為此，她們在我們中間指定了幾個人，邀請我們星期天上她們家里去玩。我們高興地接受了這個邀請。於是星期天，五、六個人進城了，時間大約在下午一點或者兩點光景，詳細時間，我記不清了。在女教師的家里，我們也是坐在課桌旁邊，每個人的面前都放着一本筆記本，上面記着喜劇“執褲子弟”^①中的劇中人。她們向我們說，如果我們能夠用功地研究劇中人，就能當眾公演這個喜劇。我不知道，其他的学生過去是否有過這種

① 俄羅斯大文豪馮維辛的作品。——譯者

願望。但是，我和柯斯嘉第二次去的時候，方才明白，研究這個喜劇的劇中人，乃是一種喜劇，因為我們很快就不再研究它們而轉到飯堂里去了。那里，桌子上放着茶炊和吃食，喝茶時候談的，根本不是“襖褲子弟”，而是沙俄政府的種種殘酷行為。桌上出現了許多像片，照的都是各地鬧飢荒、移民餓死等等的淒涼景象。她們好像在努力“鼓動”我們，其實，我和柯斯嘉早就是忠於這個事業的人了。因此，我們提議，不必教我們學習喜劇“襖褲子弟”，而把她們知道的全部東西都教給我們，同時用不着預備點心和茶，這些客套會使女教師們——一些很不富裕的人負擔過重。我們這種訪問很快就自動停止，憲兵們在注意我們了。但是，我們卻永遠牢記着這些次的談話。我應當說明的是，除了學校女教師家的學習和我家裡的經常的小組學習以外，我們還同上面說的知識分子 П·И 學習。在每星期約定的日子，到時候，П·И 還是很準確地繼續來看望我們。那時，我們在另外一間屋子結合了八、九個人。他給我們進行有關各種知識的講演。我們仔細地閱讀了拉薩爾的一部分著作，後來還閱讀了凱南（Кеннан）的著作。凱南的著作給我們的印象很深。我們由於工作和學習都很忙，常常放下書本，就在屋子裡睡了，儘管我們不是經常這樣。我們十一點睡覺，早晨四點或五點半非起來上工不可，因為這時工廠已經開始張嘴吞嚥無其數的人了。

這時候，我們在求知識方面非常緊張。對我們來說，每一分鐘都十分寶貴。放工空閑下來的每一個小時，我們事先都加以安排好，而且每個星期都是這麼嚴格分配的。現在有時回想起那段時期，自己也感到十分奇怪：從前過那樣緊張的生活，精力不知從哪兒來的？由此，也就會明白其他

城鎮缺乏有知識的工人同志的原因了。那些地方甚至知識分子都很少，你會深深地感到知識分子的不夠。同時也會完全明白，彼得堡工人很容易從自己的隊伍里挑出又勇敢又有覺悟的工人，甚至彼得堡省經常還能提供出十分熱情、勇敢、首先是有教養的戰士。我們這些當時的彼得堡人，四圍都是知識分子，然而還是常常嚷叫着，要工人自己在小組中抓緊同志們的學習。這只有在缺乏知識分子、而有些地方甚至沒有知識分子的省份內，才着手這麼做。在這種基礎上，像我們在下面的場合所見到的那樣，工人和知識分子之間形成着一些獨特的交往關係。我們這時候被四圍的各種知識和願望壓得氣都喘不過來。要把這些知識灌輸給我們，遠遠不是經常能夠辦到的事。原因是，沒有空閒時間來學習，何況學習的時候許多人都說，他們的體魄精力盡到對他們講什麼都接受不了。

1894年9月底，彼得堡涅瓦關後街的工作，就是這麼進行和準備的。那時，各個小組中的建設工作進行得很緩慢。情形很明顯，知識分子中間有人正在準備開展充分影響廣大羣眾的工作。我們的小組也間或談論這個問題，但是我們對這個新工作很不熟悉，而且也沒有了一個能夠領導我們做這件工作的人。顯然，我們不能特別匆忙地來進行這類活動。

有一天晚上，我和柯斯嘉買了書從城里回家，在有軌馬車的頂座上碰到 П. А. 摩洛索夫，他剛從“拘留所”放出來，挎着一包袱書和內衣，準備上他妹妹家里去。用不着說，我們對於這個突然愉快的見面，高興得沒法說，立刻把摩洛索夫拉到柯斯嘉的家里去。我們在那兒向他提出有關兵訊問他的時候的各種問題，問到他的被捕情況，問到監

獄中的生活，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許多問題。這時我們才知道，他們要把他送回鄉下去。這件事對我們的影響很壞，因為碰到他所高興的理由是，我們又有了一個能干的領導人，就是說，情況會不斷地好轉。我們三言兩語地向摩洛索夫說了說我們的工作情況，當然用我們的成功之處去使他高興。晚上的幾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我們一直把他送到他妹妹那兒。為了以防萬一，我們不從人煙稠密的斯摩梭斯克村走。客氣地分手以後，我們就回家了，一邊討論對這個晚上的印象，心里更加迫切地需要努力工作。

這時候出現一種非常突出的現象，青年中間有很多十分忠心於事業的人，經常反復地討論一個問題：如果某一個人被捕了，那我為什麼就一定要倍加小心，或者說，做一個不太積極的同志呢？他們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我就比他好，要不，就不如他嗎？為什麼別人一定要逮捕他，而不逮捕我呢？難道我就經不起審問嗎？不，去說，我願意證明，我也是這樣的同志，也忠於事業，決不會逃避逮捕？同志中間某個人被捕以後，一些熱情而又堅強的人便立刻反復表示這樣的信念和意見。有一次，我就這個問題甚至寫信向某些同志提意見，向他們指出，這種態度對待事業是有害的，說明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並且指出，重要的是儘可能長久地堅持下去，儘可能長時期地不讓別人發現自己，竭力把自己的價錢賣得高些，並且在自己被捕以後，把痕迹留得更深一些（也就是使自己活在同志的心里長些）。然而，我也不是經常注意這點的。因此，我相信，這種情形也是我被捕的一部分原因。總之，我希望每個人開頭就應該謹慎小心，注意自己，留神自己的一舉一動。

摩洛索夫動身後不久，剛入冬，一個大清早晨，我被敲

門声吵醒了。我本来就养成习惯，睡觉很惊醒，现在立刻从打門声中醒来了。当然，我毫不迟疑地认为，来的准是宪兵，由于想到没有什么东西要隐藏，便镇静地去开门，放那些后来把我关进牢里去的仇人进来。和自己的一切愿望恰好相反，神经非常紧张。但是，我在表面上还是竭力装得很沉着。心里暗想，宪兵在我这儿什么也不会找到，走到灶屋里，看到房东老太太在那儿唉声叹气，准备出去开门。我向她说了几句话，叫她放心，便走到过道上，突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熟人声音。原来，我对宪兵的预测为时过早了，但是我深信他们还是会来的。一个好心的女人——柯斯嘉的女房东，站在我跟前激动地哭泣着。她告诉我，柯斯嘉被捕了。她是一个不识字的人，但是我们感到她很懂得我们的正义的观点。当然，她亲眼看到了搜捕的全部程序。在别人把柯斯嘉装上敞篷马车带走以后，她感到她好像失去了一个亲人，一面哭着，一面撇下孩子，奔来给我报信。而我呢，不是安慰她，而是向她，他们也会立刻到我这儿来。因此，我要她回去，甚至不让她待在我那儿。她继续哭哭啼啼的，奔回家看孩子去了。我努力把屋子里的各种便条字笺以及对宪兵有用的东西都清除干净。一两个小时过去以后，我就要去上工，可是宪兵还是没有来。我走进工厂，感到失去了一个对我来说非常宝贵的同志，一个我与之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同志。他先我而去尝试俄罗斯宪兵的蹂躏了。柯斯嘉将会怎么样呢？宪兵将用什么去折磨他呢？他们会在他的家里搜到什么违法东西吗？我的思想一直围绕这些，脑子里惦记着很快也要这样来搜捕我。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和他这么接近，在他屋子里吃饭，他们竟没有像注视柯斯嘉那样注视我，——这是不可能的。后来才

知道，他們是根據一封上面有柯斯嘉的完全地址以後去逮捕他的。當然，幸運的是，他們在他的屋子裡什麼東西也沒有找到。雖然沒有預料到會逮捕他，但是我們對於逮捕的可能性已經作了相當的準備，因此他的被捕並沒有特別使我感到震驚。糟糕的只是，沒有他，我們在他的車間裡的工作完全停頓了。那裡有很多年青工人，柯斯嘉特別慣於對他們做工作。我是絕對不能上這個車間去的，只能對那些我竭力在廠外與之會面的人做點工作，做我能夠做的事。在我屋子裡集會的小組學習，照舊準時而又經常地進行，像往常一樣，只不過感到少掉了一個人。

柯斯嘉被捕後不久，H對我說，我必須去參加彼得堡工人的一個普通會議，會上需要解決某些個問題。我記得，涅瓦關方面出席這次會議的，連我在內，一共是三個人。會議是在城邊的一個工人的家裡舉行的。參加會議的人，看來，至少有十五個。好像，其中有好幾個知識分子，或者只有一個知識分子。在所有的人沒有到齊以前，大家都是輕聲地談話，好像開親切的小組會。人一到齊，也不舉行任何特殊儀式或虛套，便開始討論各種問題，而且爭論起來。我和另外一個同志過去從來沒有參加過這樣的會議。因此，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我和他感到自己根本就沒有能力在這類會議上發言；參加會議的，全都是工人的領袖，或者是一些很有修養的、慣於體面地應付這種場合、並能巧妙地說明自己的思想和建議的工人。當然，大多數人事先就已經知道將要談些什麼，而且過去已經參加過這類會議，在那裡培養了說話的勇氣。我細心地聆聽他們的爭論，當然弄清了問題的實質。我清楚地記得，有人提議，設立彼得堡工人互助儲金總會。這個互助儲金會應當是所有互助儲金會的總機

构。基金，由各“区”的互助儲金会提供。彼得堡工人互助儲金总会的目的是，設法把錢交給被捕的工人，必要时資助某地的“区”互助儲金会。在討論知識分子的互助儲金会現在有錢和工人的互助儲金会基金空虛因而無法滿足很多急需的用項这一問題时，大家議論紛紛。許多工人坚决希望从知識分子方面支取一部分款項。他們的感情相当冲动，以致引起我的惊奇。我疑惑他們的感情冲动，准是为了問題触及他們的荷包，因而一直默默地注視着，害怕自己失言，說出什么不恰当的話。問題終于解决了，办法是从知識分子的互助儲金会里撥出一笔錢来，放到工人的互助儲金会里。在这以后，决定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會計員，另外还选举两个什么負責人，我記不清了（是不是这样，我不敢保証）。大家决定在隱匿出席人的姓名的情况下，用下列方法来选举：所有的人都固定坐在一个位子上，每个人的名字都代之以一定的号碼。我好像是第十三号，每人都領到一張同样大小的干淨紙头，把他要选举的那个人的号碼記在紙上，叠好，接着好像放在一頂帽子里，然后再計算掺杂在帽子里的紙头。誰的号碼，被写的次数多，誰就算当选了。当我被选上會計員的时候，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滿臉通紅，感到很难为情。我走到桌子跟前，在上面放了十个卢布，說：

“同志們，这十个卢布，是紅十字会的一个人交給我，捐給彼得堡工人的。”

大家留神听着，然后对这件事表示意見。我不記得他們說些什么了，况且我在自己激动得还没有平靜下来以前根本就听不清楚他們說些什么。我这个被选上的會計員，重新走到桌子跟前，拿了錢，就这么行使起自己的职务了。

此后，大家又提出一些問題來討論，爭論些什麼，我可記不得了。接着，參加會的人開始一個、兩個地走了。天黑時，我同一個同志走出涅瓦關，回家了，因為這時候已經好走了。這是第一次會議。我是作為一個代表出席這次會議的。當然，這不是眾人選舉出來的代表，因此只好瞞着好多人，雖然我原先還以為它是一個盛大而又隆重的會議。不過，它還是給了我一定的印象。

我仍舊在廠里干活。走運的是，我轉到另一個幫里去做容易做的活計了。我在那里堅決拒絕做急件，我終於僥倖地擺脫了它。同時，同幫里的人都非常了解我，了解我的觀點，猜想能從我這裡弄到秘密書報。常常發生這樣的事：別的幫里的一些老師傅跑到我的虎頭鉗床上来，直截了當地要我向他們談些什麼。我总是覺得自己很年青，感到很不好意思。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沒有什麼可說的。但是，這些都不是實話，因為說完這話以後，我就聊開了，像俗話說的那樣，我竭力繞圈子說，結果怎麼呢？——他們很樂意聽，贊成我，夸奖我。然而，我還嫌不夠。我想叫他們完全獻身給事業，從此就停手不干小夜班和大夜班的活，閱讀書籍，學習，用功而又堅持地學習，像我自己那樣。但是究竟不是所有普通的、常常愛喝几杯的人都能什麼都不考慮，而只惦記着社會主義的。

我在这方面犯了一部分錯誤：我根本否認這些人能參加黨。畢竟在一天內不可能堅決把他們的整個世界觀扭轉過來，使他們都成為有思想覺悟的人，像他們中間的個別人一樣。但是，群眾仍然在各種時機中變為徹底革命的人的，然而這種時刻事先很難確定，甚至在一小時前都確定不了。我逼真地回想起這麼一個晚上，那時工人群眾的情緒十分

激昂。他們很難忍着不讓自己投入已經迸發的暴動的漩渦中去。他們很難抓住緊握在手里的石塊，不把它們拋出去，那怕去砸壞領班的某個狗腿子家的窗玻璃。在這種時刻，袖手旁觀是決不可能的，要制止自己的同志，不讓他們去憎恨自己的壓迫者，那非要有很大的勇氣不可……

事情發生在 1894 年聖誕節前夕。節日前兩天，工人們做完活，拿着工資簿，各自回家了，像平常放工回家一樣，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怨言，縱然每個工人都不滿。事情很明顯：廠方常常拖欠工資，特別是年終最後的兩、三次工資。

星期六三點半鐘，汽笛拉起迴聲，機器停止不動了，突然全廠靜寂無聲。這就是說，工廠將要停工到下星期一（大家都知道，發完工資以後，是很少有人願意干活的）。往常只要工廠汽笛一拉放工迴聲，工匠們便從各方面奔出來三腳两步地往大門口走，有的人跑着，有的人從什麼角落里奔出來。門警們一面吆喝着，謾罵着，一面不停手地習慣地搜查工人的身體。但是，工人越擠越厲害，門警們只好動作加快。可是，到了星期六，大伙出門就慢吞吞的，不慌不忙的，甚至一小堆一小堆地聚在一起。這種情況說明，大多數人還待在車間里，等着發工資。許多住在附近的人，聽說出納員還沒有從城里拿錢回來，便回家吃晚飯，然後再趕回廠來，甚至不肯放過自己領工資的次序。但是，住家離廠很遠的人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他們在沒有結束他們對廠方或同伴的一切事務以前，不能回家，不能放下自己應盡的各種義務。他們一個小時接一個小時地等下去，工資還是沒有着落。時間一直拖到晚上，工人終於開始怨罵管理處，其實一放工，管理處的人都走光了，甚至沒法找人問問，到底幾時發工資？因而大家都怨聲載道。到了八點鐘，出納員

终于带钱回来了。他听到四面八方都是一片震耳欲聋的埋怨声，有的地方还破口恶骂，扬言要向出纳员砸铁块。看来，出纳员简直是个替人受罪的倒霉鬼。出纳员默不作声地赶快踏进车间办公室。过了五到十分钟，开始发工资了。有时候，大约到十一点半钟才发完工资。当然，三点半钟完工，接着在厂里干等到十点钟，可以想像到，在这以后回家，什么地方也不可能去，甚至上澡堂洗澡，也没有时间了。这些自然使工匠们很生气。然而，厂方还是作恶多端，对工人的埋怨，毫不理会。

1894年圣诞节前夕的情况，偏偏就是这样。完工第二天，工匠们大约在午后到厂里去领工资。他们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地继续等下去，但是钱还是没有着落。许多人都诉苦，没钱买粮食。有的说，明天就活不过去。另外一些人发牢骚说，他们本来想回乡下一次，现在看来去不成了，诸如此类。黄昏了，钱还是没有来，甚至没法弄清事情的原因。有人说，老板破产了，没法付给工人工资。很多人开始相信这点，因而散布的谣言就传开了，接着又出现许多谣言。当然，这些谣言都是对工人不利的。结果，大家都有点惊慌失措。工长们很着急，工匠们一会到车间里去，一会又从里面出来。在工厂附近的大街上，工匠们一堆一堆地站着，热烈谈论老板和工资的事。谈话中夹杂着各种谩骂。这时可能会酿成不小的乱子，但是厂方在七点钟光景宣布，工资改在明天上午十时发。这正是圣诞节前夕。尽管大家很不满意，但是已经宣布的声音毕竟起了安慰的作用。工人在出入口附近结成密集的人群，一帮一帮地拥出工厂。过了一会，人群慢慢地散开了。全厂重新宁静地甜睡到天明。

这种情况在聖誕节前夕又重复發生了。傍晚，大街上，天已經黑下来，家家戶戶都掌上灯。冬天，車間的工作台和机床上的电灯都点上了。別的地方也亮灯了。到处都有人在乱慌慌地談話。大伙急得站也不好，坐也不是，出出进进地一会从車間里跑到院子里或者大街上，一会又从那兒往車間里走。我也到处乱跑，听別人講話，自己也到处講。我出去走到院子里，然后又走到大街上，到处都是人。看上去，不相干的人，厂外的人，很多。他們也在厂里和車間里来回地走动。我在街上稍微說了几句話，便回到車間里。突然听到有人說，厂門口鬧事了。我不相信地說，我剛从街上回来，那里什么乱子也沒出。可是，大家不相信我說的話。很多人馬上站起身来往外走。不用說，我也想把事情弄清楚，因而也和別人一起往外走。在楼梯口跟前，領班十分着急地冲着我們走来。他声嘶力竭地嚷道：“哥兒們，別到大街上去。錢馬上就送来，就要發工資了。請你們別着急！我求你們安靜些。”這話破除了全部怀疑，工匠們赶紧下楼，匆匆地往厂門口奔去。我們身后有几个工人在叫喚，喊我們回去，生怕惹出麻煩来。这些喚声，徒然無用，誰都沒有理它。我們一会工夫都奔到大門口了。大批人都成了看熱鬧的了。根本沒有办法从这堆人中間穿出去。我們厂里的門房都給打坏了。玻璃碎了，窗戶框子也坏了。大街上有人用石头和木棒往我們的厂里扔，目的想砸坏灯泡和牆上的石头老鹰。灯很快就灭了，玻璃也碎了，好像两头老鹰也受了重伤。在这以后，石头和木棒就停止往厂里扔了。于是，我們也就能从工厂的院子里出来跑到大街上了。門房被打得七零八落，成了一群憤怒的好汉們的战利品。他們甚至想放火把它燒掉，但是沒有成功。它像个妖魔似的

屹立在那里。誰都不敢走进去，害怕別人疑心他是門警，而被人打死。因而門房沒有被燒掉。所有暴怒的人的視線，現在都放到工厂的对門去了。那兒門上的灯，怎么也沒法砸坏，其实人們不願意去砸門房，生怕害了自己，因为这間門房里放着大家的出入証。

大門旁边有一幢长形的平房。工人大伙所痛恨的厂里的一个管理員就住在这里面。工人們也打算懲罰他一下。怎么懲罰他呢？大家試着想打开他的門，可是就是打不开，于是决定放火燒他的門楼。

“把火油拿到这兒来，快一点！”奔到門楼跟前的人嚷道，可是沒有地方去弄火油。有人弄来了几只打坏的火油灯，把它們吊到門楼檐上，把火油洒在堆成一堆的各种木塊上。

应当說明，这时候，人群把大街都堵住了，連一輛馬車都过不去。然而却有一輛拖着三、四节車厢的机車，还是要繼續开过来。机車司机害怕工人冲上車，伤害服务員和旅客，便讓火車开足馬力往前冲，自己則坐在窗戶底下，在火車开过工厂以前，不准备了望路程。工人看到这种情形气憤極了，把所有握在手里的东西，全都往火車上扔。我亲眼看見一个人專門砸車厢的窗子。他支出一根长棍子，像打鼓似的，敲打飞驰而过的火車的窗戶。車上很少有几塊玻璃是完整的。旅客們吓得伏在車厢的地板上，避免被石塊和木棒打着。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沒有出事。工人們只要輕易地在鉄軌上放上一样什么东西，复車就不可避免了。显然，这时候站在工厂附近的工人吓得沒有去参加这些行动。

在打門房的同时，又有一批工人向厂方開設的杂貨店：

奔去。这个杂货店是工人的灾星。賒購物品的工人在这家杂货店里不仅受商店里的坏蛋的气，还要受形形色色的狗腿子的欺侮。工人在这里花钱买东西，不能要求过严。别人给什么，他们就得拿什么。他们得不到自己必需的东西。工人在买肉的时候，特别感到这一点。他们先给你骨头，你要是叨唠两句的话，就把你从厂里开除出去。当然，现在在闹风潮的时候，这家人人痛恨的商店，是不会让它好好待着的，事实上，它是被捣毁了。果浆罐头被砸碎了，很多别的商品被毁坏了，糖和茶叶被洒在大街上，碗盏器皿等等东西也被打碎了。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工人们就这么砸坏了门房和放在里面的账本和书册，砸碎了洋灯，还想闯到一个管理员的家里去。这个管理员同全家人躲在屋内，不敢出来。他感到他快没命了。后来，工人们又打算烧掉他的屋子（也没有成功）。他们打了商店，毁了大批货物，还去砸总管理处和厂长家的窗户玻璃。总管理处和厂长住宅的房子是面朝大街的。大家把一块一块的煤块，直往这所房子里扔。我也抓了一块煤，可是没有扔。最引起大伙生气的，还是那家杂货店。所有的人都往那兒奔，把一条又窄又细的小胡同挤得水泄不通。这一切至少持续了半个小时。

当地警察局的消防队成了管理员的第一个救命恩人。消防队的驻地离管理员的家很近。消防队制止了工人在这儿的行动。哥萨克骑兵队迅速出动，出现在工厂对面的大街上。他们听说工人去砸杂货店，便往那兒奔去。但是，狭窄的小街道不让很多人涌到小胡同里去，到杂货店去。毫无疑问，待在杂货店里的人企图尽可能快地从里面退出来，可是退出来，还是会碰到哥萨克。一部分人越过篱笆，跳到

工厂的院子里，沒有碰着哥薩克。哥薩克在雜貨店附近逮捕了很多老百姓。这些人根本沒有去搗雜貨店，只是好奇地瞧瞧熱鬧而已。

消防队来了以后，聖彼得堡的消防总队长巴斯金將軍，也紧跟着来了。他向总管理处的房子走去，但是大門关得紧騰騰的。过于胆小的管理处的職員們，沒有迅速讓这位將軍进去。他因为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很着急，揪着电鈴的按钮。这时候，又有一个年約十五岁光景的人，安慰一小群工人，說他馬上到办公室去安排一下，叫他們馬上發工資。有人回答他說：我們不是鬧風潮，只是等着領取看来別人不願意發給我們的工資。最后，大門敞开了，將軍几乎像跑似地奔上楼，到办公室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一群人聚到办公室跟前，沒过十分鐘，聚集了五十多口子。这时候，那位將軍从楼梯上下来了。他出来，走到大街上，来到我們的跟前。他的臉漲得通紅，看来，非常生气。应当說明，他对管理处的解釋不很滿意。但是，他仍然面对着聚在大門口的工人，呵責我們不該砸坏門房和雜貨店，泛泛地談到我們的行动是不道德的。一个上了年岁的工匠理直气壯地答复了他，指出，整个搗乱事件都不是工人干的，而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搞的。这些人后来首先去砸雜貨店。他还說些什么，我記不清楚了。我也說了几句話，另外还有两三个人發了言，接着这位將軍又要求我們老实些，不要胡来，至于發錢的事，他們立刻会把錢送来。他說，錢本来已經送来，出納員們因为害怕鬧風潮，又回到城里去了，現在已經派专人进城找他們去了。这位將軍再次地要求我們安心地等着拿工資，随即忽然往大門口走，然后上雜貨店去了。这时候，显然，哥薩克騎兵赶来了。过了半小时，出納員带着錢出現。

了。在各个車間开始發工資給工人的时候，形形色色的头兒腦兒們都到总管理处去了。他們在那里举行了一次特別緊急的會議……

我很想弄清釀成这次風潮的起因。根据較為可靠的人的說法，事情的發生原因是，有一个頑皮的小孩罵了門警一句，或者向他扔了一样什么东西。警察當場把他逮住了，巡官命令他把小孩拖到門房办公室去。人群奔去保护这个小孩。这时，不知是誰打碎了一塊玻璃。这就是整个騷動的原因。这时候，在場的門警和人群混在一起，要不就躲藏起来，逃到院子里，尽量离开那些暴怒的工人。

在聖誕节的假期內，在斯摩棱斯克村逮捕了大批人，原因是我們的工厂就在那里。他們按照令人十分怀疑的指示，逮捕了很多人。譬如說，有些人的被捕原因，只是为了过去和某个狗腿子吵过架，要不就是和哪个領班頂过嘴。大多数人都根据警察局的命令而被捕的，或者是根据在搜查时發現二两或者四两原封的茶叶和白糖而遭到逮捕的。理由是这些茶叶和白糖的数量比杂货店賒卖賬上最后一次記載的数量多。总而言之，逮捕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們过去根本就沒有引起別人怀疑他們同情革命运动，或者贊成鬧風潮。所有被捕的人都坐了長時間的牢以后才得到审判，而且好多人的罪名都被判得很重。

在聖誕节的假日內，我們討論了有关出版評論这次風潮的傳單的問題。时候再也沒有比这更恰当的了，大家都希望从這個問題开始試着进行鼓動工作。編写了一大張傳單，然后用胶印版印刷好，訂成若干小本子，准备散發。这时产生了一个問題，怎么把它們散發掉？大家委托我来主持这件工作，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把小冊子散放

在工具箱里，不方便，容易被人發現。而且，因為是第一次，準備的小冊子也不太多。我記不得了，星期六呢，還是星期一，那天晚上，我把一部分小冊子分別散放在各個廁所里，余下的，我尽可能地把它們撒掉：從破玻璃窗里塞進車間里；從門縫里把它塞進別人的家里；放在鍋爐上；還放在機車的窗架上。總之一句話，我千方百計地把它們都放到所有的車間里。在工廠的另一方面，也有人準確地把一切事情都辦妥了。他們東一處西一處地把傳單放到工具箱里，放在工人們常常在那兒歇腿的軋輾機上，等等。這件工作做起來，好像很簡單，很容易。然而第一次做這樣的事，還是有些膽小。關於這些傳單的事，事後很少聽到別人談起。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是不是傳單太少，還是不該在風潮以後馬上就出傳單，或者是另外什麼原因呢？雖然我們都很想把原因弄清楚，但是什麼都打聽不出來。在某一個車間內，一個發現小冊子和傳單的工人，把它交給了領班。領班蠻不講理地去找一個老工人，斥責他不該散發傳單，其實那時候他早就不過問這類問題了。我因為這個老人受到無理的譴責而很為他難過。但是我們還是不能不把傳單暗中扔到他們的車間里去，我也向他說明了原因。這次經驗，可以認為是成功的，雖然沒有看到特殊的成績。在這以後不久，彼得堡港也有人照樣把傳單偷偷地放到各個車間里。他們在那兒的活動，比我們塞棉尼可夫工廠有勁得多。

聖誕節過去以後，每逢星期日，我們又開始在我的屋裡進行學習，同時大伙重新到星期日學校去念書。此外，上面提到的 П·И 也常上我們這兒來。他仍然有時候在晚上給我們講讀些什麼東西。我們完全埋頭在書本上了。

在學習的時候，小組里有時發生這類事情：我們正在屋

子里和社会民主党的知識分子坐在一塊談論問題，这时候，忽然門被推开了，一个女人的头探了进来，接着又消失了；有时候，在露过面以后，整个的人也跟着走了进来。我們的談話或者講解員的發言只好中断。这时进来的人要求某个先进工人和她出去，随即他們就一起走了。原来，这人是民意党人。她在我們小組學習的时候来找人，感到很不好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意見分歧的情况，并不很尖銳。在同一个小組中間，有时候既有社会民主党人，也有民意党人。这种情况的原因常常在于：小組里的人过去都是民意党人的小組成員。民意党人最后终于截足不上我們的小組来了，原因是我們沒有給他們提供新的小組，同时他們也沒法把我們小組的人和拥护我們小組的人拉过去。这时候，我們这兒有一个少女和一个被放逐出去的犯人的妻子。她們有时候向我們提議想参加我們的學習，或者参加我們在沒有知識分子参加下举行的讀書会。像上面提到的那样，我們曾經独自讀过凱南的著作。讀書的那間屋子，本來就已經有五、六个人了，現在至少得加上两个人，因而产生一个問題：人会不会太多呢？大家在这方面滿意地解决了这个問題。那时我提出了一个問題，女人参加到我們中間来，会不会對我們小組的學員产生不良影响。結果，大家在这方面談出了某些危險。一个組員甚至表示，如果情况真是这么复杂的話，他都不敢保證自己。这个看法本来是某个紡織厂的工人說出来的，后来我們都被这种看法迷惑住了。鑒于这种种緣故，大家都拒絕妇女参加我們的學習，虽然她們有时候还是来看望我們。这是我这一輩子碰到这类問題的唯一的一次……然而，我深信，下次碰到这类問題一定会完滿地解决它。

Φ·A也三天两头地来看望我們。他是一个非常乐观而又很有人緣的工人。拿革命活动的經歷來說，他可以算是老資格了。我总是特別喜欢听他的談話，接受他的意見。我把他当作是我們必須接替的老前輩。不过，我常常怀疑，我們将来会不会比他更坚定，更頑强，更聪明。我牢記着他被押上“十字架”去受刑的情况。这給我留下了非常沉痛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記这个善良的人，一个可說已經失掉生命，但还被迫到監獄里去的人。他的一部分生命被交給了饕餮的专制政权。我記得他曾經埋怨我們很少唱歌，据說他們过去是常常唱歌的，并且唱得很多。这是事实，我們更少唱好的歌子，也不大懂得它們。

我們就这样繼續生活下去，學習下去。当然，这时候，又相識了好多工人。光陰不知不觉地过去，春天又来了。我記得，我这时候同帮里工头的关系搞得很糟，起初是因为我不做小夜班和大夜班，后来他干脆要把我排除出去。工头对我越来越厉害的、尤其是最近的独立行为，很不滿意，另外还不滿意我带坏了工头想按照他的心意加以教导的一个年青小伙子。这个年青小伙子在我們的帮里当学徒。这个暗斗，結果終于在某一天把我調到另外一个、情况更糟的帮里去了。我在这个帮里干了一个多月的時間。

有一次干急件，全帮的人都被迫做夜班。我和另外三个人不願意干。他們用解雇来吓唬我們，而我們还是不答应，大發雷霆的領班給我們每人下了一張两个星期的曠工条。这等于叫我們两个礼拜沒法干活。如果我們曠了两个礼拜的工以后再去上班，他們照例还要強迫我們上夜班。这种手段常常能把一个工人治得服服貼貼。我拿了曠工条以后，去找駐厂檢查員。他想把我打發走，对我大嚷一通，

把全部責任都推在我的身上，而不責怪廠方。我向他指責說，我是找他求保护的，不是來叫別人對我大嚷大叫的，也不是來叫別人把領班的責任全推到我身上的。听了這話，檢查員的態度和緩下來，說他曾經一再禁止在廠里實行這種辦法，可是他們還是採取這種辦法。他答應到廠里去檢查這件事。結果，領班受了懲罰，把扣掉的兩個星期的工資又發還給我。這件事在廠里議論紛紛。有一段時期，我居然成了敢于沖撞領班的英雄。顯然，在一個短時期內，車間里不再強迫別人做小夜班、大夜班和全夜班了。

情況發生了變化。我已經準備離開本地，轉移到別處去。但是，後來由于接到任務，而又留下來繼續做工作。不久，還要搬家。我在那里已經住了很久，還沒有受到警察的注意。這里還可以繼續進行小組學習。夏天來了，星期日學校關閉了。女教師們都四分五散地走了，工人運動也好像停止了。這不過是表面現象，實際上工人運動非但沒有停止，而且日益壯大了。不過，目前的工作，由于沒有知識分子參加，在進行方法上有些獨特。

這個夏天，彼得堡的工人又召開了一次常會。這次會議是在涅瓦河右岸糕點工廠后面稍左的一個樹林子里舉行的。大家在那里談到運動太緩和，應該通過某種方法去加強它。大家都埋怨小組的活動，一致要求聲勢浩大地進行某種新的、還未檢驗過的活動。爭論得很激烈，嚷得也很火爆。兩個青年工人的發言特別尖銳。他們對所有的事情都加以刺激，加以評論，還責怪工人對新思潮太冷淡……總之，這次會議開得非常熱烈……會上有人提出了給恩格斯墓送花圈的問題。恩格斯剛在那時候逝世。一部分人主張送，大部分人反對。反對送花圈的理由是，我們的運動範圍

太小，如果送一个上面附着彼得堡工人敬輓的字条的花圈，很不恰当。同时，我們还将失掉一个同志，这对我們來說是十分苦痛的，而最主要是，我們的花圈会誤期。要在殯葬日那天送上花圈而不是在事后，这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們最好用别的办法来紀念恩格斯，不必老惦念着花圈。这不是什么男爵和公爵的死，这些人死才需要花圈哩……

这个意見占了上風，后来好像提出过拍唁电的問題，現在我不記得這個問題是怎么解决的……散会后，大家的心里都有这么一些思想，必須尽可能地从积极的方面来改变宣傳方法。但是，这件事做起来，远不如想像中那样容易。这时候，还只能讀到胶印的宣傳小册子……只能把革命問題的領域限止在很狹窄的範圍內。只有領導本地本区和小組的工人，才略略知道这个狹窄的範圍。現在还可以在具有下列情况的若干边区和省份里看到这种現象。那里，工人还在自力地摆脱愚昧和閉塞的地位，得不到知識分子的帮助……

这时候，每逢星期日，我还同四、五个人带着書本到涅瓦河对岸去，在那里閱讀一些書籍，讀完再討論；我們也对工厂里發生的事件互相交換意見，大家准备在秋天，考慮再建立几个新的學習小組，并且預先确定好十分可靠的人。毫無疑問，这时候工人互助儲金会还存在，但是沒有制定出严格的章程，因此現在很难弄清那些錢是怎么分配和支付出去的。我只記得，支出了很多买書的錢，甚至連購買違禁書籍的錢都沒有記賬。錢支得最多的，是一所合法的圖書館。^① 我們从女教师那里得到了很多書籍，自己也买了好

^① 这所圖書館是克魯普斯卡婭主持的。——俄文版編者

多，而 П·И 也經常給我帶書來。利用各種雜誌上的文章編輯而成的很多寶貴書籍，都失落了。我後來經常感到書籍不夠，也只有在那個時候，我才能真正地估量到一本好書對於其中沒有知識分子推動而工人只好自己邁步前進的城市的好處；也只有在那個時候，書本才能成為好的領導。現在是新時代了，有着新的歌聲。到處都傳播着，而且必然傳播着定期的違禁讀物。這些讀物可以做許多問題的指針。一個生活在偏僻地區的工人既然有可能得到這類書籍，因而也就得到了一個可以依靠的錨。

1895 年的秋天到了，知識分子紛紛從各地趕來。大家開始感到運動正在猛烈地高漲着。來到本地的知識分子都希望工作，尤其其中有一部分知識分子由於把工人擱置了整整一個夏天而受到過責備。大家都忙着要彌補夏天的消沉（說良心話，這個夏天決不能算消沉）。機器全都開足了；冬天還沒有到，而各個小組就已經開始集會了。每逢星期日，每個小組里都會出現一個知識分子和五個工人。大家都強烈地感到屋子不夠，全都有人占着，因而特別租了一間屋子，專門用來學習和開會。有關鼓動的問題，已經肯定地解決了。但是，我對此不滿意。我耽心各個小組會被消滅，認為鼓動工作會把他們完全害掉。到那時候，我和其餘的人就不會看到這一工作的果實。然而，各個小組的活動仍然進行得很好，有人要求我再建立一些新的學習小組。大家都等待着散發早已準備好的傳單。在這以前不久，有人開始監視我了，而且還不止監視我一個人。引起他們特別對我注目的原因，後來才弄清楚。有一個工人從我這兒拿了几本違禁書籍回去以後，送了一本給他的妹妹，而他父親又在他妹妹那兒發現了這本書，於是就把這件事報告給憲

兵了。这就是引起他們暗中監視我的原因。这种監視沒有产生任何显著結果。虽然有人警告我說，很快就要逮捕我了。我还是干我的，不过格外小心謹慎了，不讓宪兵注目。工厂里仍然出現違禁書籍。这些都是我通过我的一个同志干的。那时候，托尔东呢絨厂里也釀起各种風潮。这些風潮主要是因为厂方降低工資而引起的。最好在宣傳傳单中說出工人們最关心的事，譬如尽可能地說明当选的大多数領導者(和社会主义組織無关)的要求。为此，通过一个工人，把他們召集在一間秘密的屋子里。然后，由一个知識分子和他們談話，弄清他們的情况。可是，談話沒有成功，原因是托尔东呢絨厂的工人不願意同一个他們素不相識的人談問題，疑心別人会給他們上当。他們对什么事情都不相信，只要求写一份恳切的請願書給他們去求見市长。写一份如泣如訴的請願書，对于大伙是枉然無益的。同时，要指望依靠这份請願書去得到什么好处的話，更是想入非非。因此，通过托尔东呢絨厂的一个工人(現在变成了狗腿子)收集来的材料，都已写成了傳单。这个工人和我們都对这个傳单很滿意。傳单印了出来，然后偷偷地把它們撒放在工厂里。这样，热火朝天的鼓动工作便开始了。

不久，普契洛甫斯克工厂里也有人散發傳单了。有人拿了一份傳单到涅瓦关来給我看。有一个同志在工作的时候，带着这样一份傳单和一瓶胶水，跑到厕所里。他趁沒人的时刻，把胶水注在手上，用手掌把胶水抹在墙上，貼上傳单，随即便溜到車間里去了。过了十五分鐘，他忍不住地去看看他的那張傳单。原来，已經有十五个人光景站在傳单前面。其中有一个人竭力大声地讀着傳单。但是，他念不好，这个同志便挤到前面，高声而又抑揚頓挫地向在場的人念

起来。大家都非常注意，厕所里挤满了人，不断地有人看。所有的人回到車間里，都要慫恿别人去看。你来我往的，差不多持續了两个小时，大家都看过了傳单。最后，管理处知道了这件事，便下令把傳单扯掉。然而，当厕所里挤满了很多人的时候，門警不敢去扯，其他的許多敌人也沒有胆量扯。这种情况特別引誘我和我的那个同志去进行这件事。此后，我們常常把小册子和傳单偷偷地放在厕所里和背人的角落。过了一会工夫，这些小册子和傳单就不翼而飞了。事情明摆着，有人悄悄地把它們拿走了，居然，快得我們都来不及注意。我們由于留神观察，最后我們終于發現一个人，悄悄地走去，小心地把他寻到的东西塞进袖籠里，立刻带着它走出厕所。

开冬，工人代表开了一次会，人数大概是六个。在这次會議上，宣讀了一份傳单。这份傳单不久就要用油印机印出来，散播到所有的工厂里去。不过，这份傳单还没有最后定稿。有些地方，还需要訂正。当时宣布，这类會議将要經常进行。好像說，一个月至少要开两次。参加这个會議的知識分子方面的代表，就是宣讀上述傳单的那个人。从这点可以看出，組織方面已經采取各种新办法，以求促进宣傳工作。当时工作进行得非常秘密——情况非这样做不可。看来，一部分知識分子負責草拟上述各种傳单，并且在十分秘密的組織問題方面和工人保持联系；而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則負責學習小組的工作。当然，我对这些知識分子的情况是了解得不够清楚的。譬如，某人是誰，是做什么的。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时候知識分子和工人，双方都在加紧活动。在从學習小組过渡到宣傳鼓动这样大的变动中，还没有产生特殊的誤会和爭論。显然，这是因为各个學習小組

在繼續努力进行各自的活动，并且恰如其份地符合極其正确的工作方法，也只有这样的工作方法才能被公認為令人十分滿意的。凡是在宣傳鼓动的时候放弃学习小組的地方，那里的工作就会轉上不正确的、有害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必然会在有觉悟的工人中間产生激烈的爭論……这种情况不仅不能培养出有觉悟的工人，而且知識分子也会在不参加小組学习的情况下逐渐变成修养很差的人，同时也不能深刻了解工人的心灵。

一年前，我在埋头从許多知識分子和学校女教师那里学习各种优美的言詞和学識的同时，胆怯而又怕难为情地去参加各种會議，而現在我被逼着要到处独立工作，解决学习小組、工厂和学校中發生的一切問題。有时候，显然感到自己很不在行，但是还是需要講話，还是需要發表意見，还是需要給別人解釋問題，原因是許多优秀的、聰慧的領導人都被流放出去了。既然要做一个先进的人，那就不能不講話。我不認為我自己不会出漏子，要自己注意自己是相当困难的。我在工作中十分努力和异常小心。

有一次，放工以后，我到那尔弗关去办件事。在一家人家遇到了那里的一些本地人。人們常常談論他們，說他們都很勇敢，而且都能带头做榜样。不过，他們自己也常常到处这么說，这是为什么呢？他們給我的印象很不好。我一心一意想在这里看到或者听到件把新事情，好学习学习，把它带回涅瓦关去，虽然，我們在那兒的工作做得還不錯。但是，我在那兒沒有發現一件新鮮事情。因而我对他們，对带头的工人的一部分信心便大大地冷却下来。从此我就更加热烈地专心致力于自己涅瓦关方面的工作，很少亲自出去了解別的地方的工作了。我对整个涅瓦关方面的情况，了

解得比較清楚，因此我特別感到这个地区在广泛散發过第一批傳单和小册子以后，运动是高漲了。我們收到的傳单和后来收到的小册子，都很順利地散播到各个工厂里去了。居然，撒傳单的时候，誰都沒有被人發現。当然，这种情况使我們更加胆壯起来。同时，我們等待着更多的东西去散發給群众看。这种活动立刻把群众带动起来，各个工厂也謠言四起，說很快又要起風潮了。“我們这里人人都說，过年以后一定会鬧風潮”，厂里的一个临时工向我这么說道。这人根本就沒有参加过我們的事業。另外一个工厂的临时工竟然直接向我索取大批宣傳讀物，同时向我指出：我在我做工的那个工厂里常常散發許多傳单和小册子，而他們那里却很少。我不能把宣傳小册子給他，因为我根本不認識他，过去也从来沒有和他談过話。这次我怀着殷切的期望問他，想弄清一个从来沒有参加过我們組織的临时工人心里的想法。同时我还产生一个要求，想叫我們中間的每一个人都深入到群众中間，去弄清群众的真正的意見。而这些人則是我个人的群众。

現在我想來談談，参加过我們學習小組的知識分子 П.И。这年冬天，他不大到學習小組去了，尤其不大上我这兒来了。但是，他介紹了两个对學習小組很有兴趣、很負責的人。这两个对事業忠心的人，受到了學員們的愛戴。这时候，有一批知識分子，坚决要求我們給他們建立學習小組；經過長時間的商談以后，我們滿足了他們的要求。但是，他們不是秘密地去工作，而是經常两个人一起去。与其說他們是上課，还不如說他們對他們所不滿意的學習日程进行各种質問和批評。起先是學習小組的領導人，接着是學員，都紛紛抱怨这类學習毫無益处……另外一批知識分

子，人数最多的一批，由于准备进行鼓动，了解了彼得堡方面的全部情况。他们领导了鼓动工作，这也就是说，送来了一些传单和宣传小册子。同时，他们还弄明这些传单和宣传小册子将在什么地方散发。地方上的工作是由工人来领导的。他们把宣传品转送到所有的工厂里去散发。每一个工厂里，只有一个这样的工人来进行这个活动。这个工人知道那儿需要多少宣传品，还知道散发传单的具体日子等等。上面提到的两批知识分子想通过我们的帮助，双方合并。但是，这件事由于整个工作的失败而作罢了。

12月5日前后，我们遭到了一次突袭。若干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知名的工人被捕了。逮捕的事，大家本来是预料到的，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范围会这么广。不用说，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强烈的，然而没有像以前发生事情时那样强烈。我对于逮捕这件事已经司空见惯了，能够很镇静地把它忍受过去。学校里的女教师的脸上眼泪汪汪，神情都很惊慌。这种惊慌与其说是为自己担心，还不如说是为事业担心。一般的影响当然非常重大。运送宣传品和传单的工作停顿了。必须到全区的各个地方去看看。这些地方的革命活动已经中断了。我们必须重新去掌握这个地方。可是，没有这份力量了，各处的小组已经瓦解，甚至我们这里的部分情况也是这样。我们这里本来只有三个工人，而现在特别感到H不在了。可是，我们还能继续活动。在工厂工作的人员方面，我们没有感到特别的损失。知识分子方面露出了缺点，他们不能迅速地恢复元气。一个星期以后，我们仍旧按时举行了会议，建立了联系。这时候，同志们的意见十分激烈，想打垮我的顽强的态度。我本来就特别反对进行鼓动工作，虽然我也看到这种工作对于提高工

厂群众的一般情緒会起肯定的效果。可是我害怕，万一事情失敗，一切都將完蛋。我畢竟在这里犯了錯誤。我知道，我被捕以后，工作还是要繼續下去。当然，那时候，我再也不会过問鼓动工作了。我对于我没有被逮捕，感到非常奇怪。看来，他們不逮捕我，是另有打算的，企圖追踪我的縲索。但这点警察当局方面并没有得逞。这时，同志們把我制服了，我終于同意繼續进行鼓动工作。为了显示一下我們的組織的力量，我們在秋貢制造厂、瑪克斯維尔紡織厂和派尔紡織厂散布了几本宣傳小册子：“誰是靠什么活着的？”、“每个工人应当知道些什么和牢記些什么？”、“代表會議”、另外还有一本宣傳小册子，名称，我不記得了，数量都很多。这件事造成了大混乱。警察和宪兵繼續出动，这只能更加激励我們，而信心和勇气則在各工厂工人讀者的心里扎根了。談話和爭論非常激烈，看来，汹涌的浪头就要潑到船舷里面来了。尽管这时候我們还没有通过学校做过任何事情，但是瑪克斯維尔紡織厂的領班苏里茨却指摘学校是这一切現象的禍根。他把有人从邮局寄給他的东西都轉交給了宪兵。不用說，他密切注視着他的工人。他們在工厂里逮捕了很多人，或者暗中記下看傳单的人。令人最感兴趣的是，有一个暗中散發傳单的人在干活的时候进行活动，相当大胆。大胆得出奇，一次也沒被他的同伙發現。尽管他經常单刀匹馬地一个人在各个車間里暗中撒傳单，有时还把傳单扔到里面待着三、四个人的鍋爐間里，而这些看到傳单的人从来也沒有来得及發現，傳单究竟是誰扔的。大家起初好奇地端詳这些扔进来的傳单，等到弄明事情真相以后，便开始小心翼翼地去看它們了。有时候，他們看完，便立刻把傳单撕掉。不过，胆小的工人，很少会这么做。

有一次，塞棉尼可夫工厂由于發生一件奇怪的事而沒有出現傳单。原因是：某个工人傍晚收到傳单以后，把它們藏在一个地方，等到第二天早晨上工去拿这些傳单的时候，發現那地方的傳单竟然不見了。此后，大家便更加小心了。一直到我被捕，这件事还没有弄清楚，而失落的傳单也沒有弄回来。一个月內散發了相当多的宣傳小册子和傳单，但是居然还發生了某些誤会和抱怨：某些工人抱怨說，給他們的傳单給得比別的工厂少。情况也多少是这样的，宣傳小册子不够。我有把握很快就能弄到这些宣傳小册子，打算到那时候，再广泛地把它們散到各个工厂去。各工厂散發宣傳品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把宣傳品偷偷地塞到工具箱里，或者把它們放在机床台上；有的人把傳单塞在別人的大衣口袋里，这个办法做起来比較容易，比較簡單；有的人把宣傳品放在工人常常拿东西的地方，有时候把它們丢到鍋爐間的工人那兒；把宣傳品丢在大修的机車的各个部件上是最恰当不过了。有时，那里的工人上工以后，过几小时就發現了这些宣傳品。那时候，从奥伏德运河起，一直到桥边的小教堂中間，只有一家小工厂，而亚历山大村里一家大工厂都沒有。那兒沒有出現过一本禁書，因此我們在那里沒有自己人。在派尔紡織厂和瑪克斯維尔紡織厂里，我們的人就特別多。如果这些人中間能够出現一两个自己的話，工作就会上軌道，而且只消一个月就能把損失完全弥补上。真需要有一个英明的領導……

大失敗以后，过了两三个星期，各地的联系又接上了。

到处都沸騰起學習小組的蓬勃工作、傳单和宣傳小册子的鼓动工作。大失敗以后，过了四个星期，我收到了相当多的傳单，性質都大同小异，談到宪兵策动的这些突襲，談

到政府取締思想覺悟的工人的辦法。我接到這些傳單以後，感到散布它們將是我的最後一件工作。我努力把傳單按照各廠工人的數量加以適當地分配好，然後把這些傳單分別送給我所知道的人，同時弄明他們大約在什麼時候散發。這些可靠的人立刻動手工作。有的人為了把傳單妥切地貼在公共場所，忙着準備打漿子，或者找膠水。把傳單分發完畢以後，我和同志們告別，並且預先告訴他們，我可能被捕，一面囑咐他們，在我沒有去找他們以前，千萬別上我家去。晚上十一點鐘，我搭上公園去的有軌馬車往亞歷山大村，到某個同志的家里去，有人在那裡等我。我把應該分給奧布霍夫工廠的傳單交出以後，預祝他們平安地繼續工作下去，同時告訴他們，我相信在這批傳單散發出去以後，我一定會被捕。接着，我就泰然地回家，心裡滿有把握地相信，明天一早，從施里塞爾到布拉格去的整條公路上的工廠里，都將有人散發傳單。當然，事情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時，警察將四處奔忙，搜索散發傳單的犯人，也必將有很多平白無辜的人被誣稱為嫌疑犯。

白天過去了。晚上，我哪兒也沒有去，留在家裡，準備別人來搜捕我，我對這點早就估計了。也真是這樣，我剛睡着，就聽到嘖嘖的叩門聲。我的房東困惑不解地趕忙去開門，而我則自言自語地認為自己再也不會是涅瓦關方面的工人了。一個警察巡官從房門外闖進來，緊接着，自由黨人——警察局長阿迦馮諾夫也跟了進來。他一面狡猾地表示道謙，一面聲明他的來意，要在我這兒搜查一下。但是，當他們經過詳細的搜查，在我這兒沒有發現任何犯罪證據以後，他還是客氣地宣稱，仍舊要把我逮捕起來。他說，這是小事情，過兩三天就會把我放出來。不用說，我是什么都

准备好了的，这些对我都没有起什么特殊作用。

早晨，当彼得堡大街上的路灯熄灭的时候，我和警察巡官，连同另外一个犯人，走进了拘留所。我弄清坐在我边上的这个犯人的唯一罪名是：有人在号房里从他的大衣口袋里拿走一本宣传小册子，交给了宪兵，因而他被捕了。宪兵确认某些个人的犯罪行为，往往就是这样。我也弄清楚，其他一些犯人也是不大参与撒传单的工作的，像坐在我对面的那个青年人一样。因而，我相信，那些真正散发传单的人，没有被逮捕，还平安无事地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最后，我们都被关在拘留所里。庞大的监狱，第一眼看到它，我就打内心里厌恶。但是，不得不和它接近，按照它的规则生活下去。十三个月的监禁，强迫我忍受着自己心里在这个时期内产生的种种波动。在这整个一段时期内，我没有和一个同志交谈过一句话。我旁边的人，也和我一样，默默地忍受着长年累月的死般的寂寞。我的关于圣彼得堡涅瓦关方面的活动的回忆，就此结束。



II

1897年初春，我迁居到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城。在彼得堡坐了十三个月牢以后，能够作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几乎走遍整个俄罗斯，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而在初春季节来到南方的城市，可真叫人太高兴了。周围一切都是新的，人也好像完全不同，不是远远地留在北方首都的那些人了；从前老是看到监狱里冷酷的墙壁，使人感到头痛，现在可不再有那些墙壁了，一切都是轻松愉快的，而那兒——在另一条街的外面——就已经是辽阔无边的草原，在招呼着没有工作的人。

来到以后，我在当地警察的警惕的目光下办理了必要的手续，同时居然荣幸地听到市警察局长由于我选择了那个城市而对我表示不满，说是一定要给我吃点苦头。我开始等待彼得堡方面的文件，因为他们答应我要等文件到了以后，才发居住证。在等待的时候，我仔细地了解了当地的生活和工厂的制度，弄清了进厂工作的可能性和工资的多寡；至于一天做几小时工作，我因为住在一个当锻工的犹太人家里，所以已经弄清楚了。我看到各处都在陆续兴建新的工厂，心里充满了信心，认为对我来说上工是不会很困难的，所以就暂时安心地继续等候发居住证。

过了大约三个星期，我的文件终于寄来了，并且归入警察局秘书的特号档案里。这位秘书填写了居住证，盖了章，

把它交給我，我拿去給副局長簽了字，走出警察局，希望有一個很長時期不來找這機關。可是居住証看來並不令人滿意，它引起了公民証書登記員和房東太太的疑惑。所有這些都給我添了許多麻煩。我為了領取真正的公民証四處奔走，結果並沒有成功。我只得忍氣吞聲，過着沒有公民証的生活。

還在我到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城以後的頭幾天，我就盼望一個人來，這個人我是約好在該城的一個廣場上碰頭的。在約定的日子，我到廣場上去白跑了一趟，那個熟人沒有來，這種不順當的事很使我難過。後來才知道，他沒有到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城來，而是為自己張羅了一番，根本跑到另一個城市去了。這樣，想同一個志同道合的人會面的唯一希望完全破滅，而其他的熟人又不氣味相投。因此我自然不由得感到寂寞，而且除掉這種寂寞以外，還加上運氣不好，我不能進工廠工作。

錢快用光了，前途又很渺茫。我早晨五點鐘起床，動身到一個工廠去，就已經在那裡碰上一大群失業的人。有時候我站開一點，有時候擠到這個人群中間，同他們混在一起。當然，大多數人是從農村來的，主要是奧爾洛夫查人。他們有同鄉在這裡，指望靠他們的幫助找到工作，結果多半能夠達到目的；我屢次看到，好些下班的工人，就是一兩天前同我一起站在工廠的大門外的。我沒有任何熟人。每次向經理或工頭要求工作，都沒有成功。

在我到達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的第二個月，有一天早晨，房東上完夜班，從工廠帶回一個有點醉醺醺的工人。這個人自稱為同志，他把我從床舖（實際是鋪在室內地板上的一條薄墊子）上叫起來，拉我到他的屋子裡去。在那屋子裡，我

碰見了兩個彼得堡人，他們是在同我一樣的境遇下來到這裏的。我的一个新朋友是工廠里的模型工人，另一個是工廠里的學徒，雖然他年齡已經不小（二十歲）。這個學徒的鱗直脾氣和他講的故事都使我對他發生好感。在那些故事中，他自願地把幾次著名的彼得堡罷工的波折津津有味地講給我聽，並且還講起他在那裏所起的作用。我第一次從他口里聽到那遍及彼得堡各工廠的波瀾壯闊的罷工運動，並且只有這個時候我才相信，鼓動工作初步下的工夫沒有白費，瑪克斯維爾工廠的那個工人的話是對的。那時他說，新年以後，一定會鬧風潮。如果不鬧風潮，而是舉行罷工的話，這等於說，這時候工人的思想已經前進了一大步。

這個樸實的小伙子馬秋哈（為簡便起見，我們這樣稱呼他）是群眾的最典型的代表。他除了在鄉村小學獲得的最簡單的概念以外，什麼也不知道。他起初費力地看完那些在工廠里偷偷地散發的傳單，後來才親身積極參加散發傳單和鼓動罷工的工作。在遭到放逐以後，他只是惋惜朋友們的被捕，擔心這種情況會損害運動的開展，並且滿腔燃燒着彼得堡的罷工熱情。

在馬秋哈的身上，我滿足了我對言行方面的切實要求，因而他獲得了我的全部同情。同他認識以後，我感到精神特別奮發，郁悶的心情完全消失了，除非在自己感到無事可做的思想影響下，這種情緒才會偶然出現。可是，人們使我相信我很快便能踏進一家工廠，早晨到我屋子裏來叫醒我的那個工人就在這工廠工作。後來我才知道，曾從彼得堡招募了一些專業的工人，以應工廠的需要。應募的工人旅費由自己掏腰包，可是他們在工廠里享受不到任何優厚的待遇，眼看着這樣地受到了欺騙，都想回彼得堡去。他們沒

有錢，只得暫時繼續工作，后来对当地的生活慢慢習慣起来，逐漸把彼得堡拋在脑后了。

和同乡，和思想上的同志認識以后，我常去拜訪他們，也請他們上我这兒来，并且送他們几本带来的書。生活过得比較活潑了。

一天晚上，他們知道我第二天早晨得上工厂去試工。这消息是令人十分欣慰的。早晨，我觉得非常兴奋，怀着开始工作的希望往工厂去。在緊張的工作停歇了一年零八个月之后，我不免心里發慌，精神特別緊張地等着試工。一个意大利工头来了，他一句俄国話也不懂，有一位同志照顧我，把我介紹給他。

意大利人一声不吭，抽着雪茄，用打量的目光注視着我，暗自作着結論。过了十来分鐘，我得到試工，也就是干活的机会，这个活我是应当尽可能干得好些的，为的是讓工头瞧着活兒，可以了解我的工作能力强，并根据这一点来估計工資。我接受了試工以后，立刻聚精会神地干起活来，因为用鋸子(銼刀)鋸鋼十分困难，过了两个鐘头光景，我的活兒有了进步。不过，結果使我感到非常惊駭和惋惜的是，我觉得我不能够完成这项工作，馬上像被兜头潑了一盆冷水似的。

問題是：还在进牢以前，我就长期沒有干銼刀的活，而在牢里待了十三个月，終于把我一双手完全給毀了，使它不宜于干活了。我的手变成了老爷式的手，上面連一小塊茧皮都很难發現，而对工人說来，茧皮是护身甲；不做工的人皮膚同鋼磨擦，会感到疼痛，有了这种护身甲，皮膚同鋼的磨擦以及任何扎伤，都可以忍受得住，不会有什么危險。我還沒干滿两个鐘头，就觉得右手手掌上痛得很厉害，我尽量

想法不去注意它，繼續干下去，可是肿起来的茧皮痛得够呛，妨碍工作。

有一个刚到这里的过去彼得堡的工人就在这工厂干活。他曾在“十字架”监狱^①坐了一年牢，并且度过了监视期。他知道我是彼得堡人，来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不久，同时还受着监视。我们交谈了几句话以后，互相有了了解，我就把我的苦痛告诉他；他很表同情，叫我停止工作，可是我还是继续干下去。当巴掌上的茧皮破裂，手里渗出水来的时候，我还没有丧失把工作进行到底的希望，在扎上一块手帕以后，仍然继续干下去。可是一切都是白费气力；手没有了劲，只得用略为不同的方式握住锉刀，因此工作就不能照旧进行。我还是干着，虽然必须停止工作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最后，我支持不住，终于屈服了。我对翻译说，让我过三四天再来结束试工；他把我的要求译给意大利人听，这位工头以为我害怕试工，也就是说不能工作。我猜到他的心思，就伸出手给他看，表明我不能干活的原因，这时他相信了，对翻译讲了句什么话，这话由翻译译给我听，说是机械师要他转告我，我身体柔弱，不适宜于他们的活，因此他们打算把今天的工钱算给我，人却不能录用。

对于这话，我能提出什么异议呢？当然提不出什么，满肚子委屈，拿了八十戈比（据说一天的工资是一卢布二十戈比），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失望地回到自己的住处。“现在我怎么进别的工厂呢？”我想，“要知道，这样的试工又会磨破皮，人家又会谢绝我，说我是个身体柔弱的人，不适宜做工厂工作的。”我寻找可以使掌上起茧皮的办法，可是想不

^① 彼得堡的一座囚禁政治犯的监狱，因建筑式样像十字架，故名。

出来。我的手痛了两个星期光景；后来我試試在手杖上磨擦手掌，想讓它磨出茧皮来，可是这样做終于叫人厭煩，我就停止了。

有一天，我在車站站台上走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一位彼得堡的同志，他是同我在彼得堡工人的几次大会上碰过头的。我們彼此都很高兴，并且暢談起来；原来我們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已經住了两个多月，彼此还不知道，只是偶然的会面才使我們聚在一起，使我們想起我們关在拘留所里的情形和其他許多事情。看来，我們是处在同样的警察条件下，并且等着同时結束警察局的監視。我同他談了一会以后，就把我認識几个彼得堡人的事情告訴他，同时答应想法使他和他們認識；在这一次，我們碰見了我那天試工失敗时在工厂里認識的那个工人，因此我們便一起上他的住处去。这样，我們彼得堡人已經有了三个，并且很快就变得很投緣。最后，我总算順利地进了布良斯克工厂，而我認識的那个年老的彼得堡人則进了一家小工厂当工头，很快就能把另一个同志和馬秋哈安置进去，因此我們大家都覺得很滿意。不久，我們又認識了一个彼得堡人，他是两年前放逐到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的，現在已經在一家工厂里工作。我們常常会面，終于决定想把生活安排得更密切些，因此特地租了一間屋子，三个人住在一起，其中也有我。

在这以前，我已經和工头吵过几次架，因为他老是想用罰款来吓唬我，而我总是声明說我不能同意罰款，我們同他的問題鬧成一場共同的斗爭才算告一段落，結果使我干了两个星期不能再干下去了。我待在这工厂的短短的期間，發現了一位很好很能干的人 Г (Г. И. 彼得罗夫斯基。——編者)。这个 Г 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們常常作長時間的談

話，這些談話使我們能夠真正按照彼得堡人的方式生活着。

在這個時候，我靠馬秋哈的幫助，同一個子女眾多的老人見了面，他是個受合作制社會主義影響的老工人，一個手藝出色的工匠。這個人的理想是：開設公營小鋪，以便後來由此成長出一個良好而鞏固的強大組織，能夠供給資金來同資本家作鬥爭。也像所有入了迷的人一樣，這個老头兒一心想要開設這樣的小鋪，所以常常同我談到這個問題。我可決心要尋找現有組織的一切舊的力量，那時再開始有所行動，而暫時只是繼續擴大交游，這事我甚至也很容易地辦到了。每逢星期天，我又忙起來，我得把自己的知識傳授給一些青年人，那些青年人是「有時替我召集來的。固然，他自己也需要全面的發展，因而他晚上常常在我這兒，但是我所熟悉的加班加點制度是那時主要的敵人。雖然我看到這樣的工作使「在體力上很感疲乏，可是我又不能硬勸他完全不做夜工，因為他還需要訓練做個優秀的工人，此外，他還受到家庭環境的壓迫，那種環境需要他在經濟方面給以不斷的有力的支持。這就是我將來的幫手。

像我已經講過的，我來到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城將近三個月期間，由於我沒有可能待在工廠里，我根本無事可做。而在結識朋友方面又沒有達到很成功的地步，因而我沒有立刻投入緊張生活的旋渦中，並且當時也沒有這樣做的心情。在認識了新朋友，開始過那非常活潑愉快的親密的小組生活以後，我們完全沒有覺察到整個夏天已經過去，秋天已經降臨了。因為沒有特殊的工作，我想起了彼得堡夜校的生活，心里按捺不住，就報名參加了制圖和繪圖班的夜課，朋友們也學我的樣。但這對負擔重的人說來，是個很大的重荷。從住宅到學校要走四十分鐘；在白天忙碌的工

作以后，这样的闲逛决不是件乐事。我的朋友們不久就不去了。我一个人还繼續去上学，如果学校是有趣的話，我也許会去很长一个时候，虽然对我这样一个被涅瓦关的星期日学校所寵慣了的彼得堡人說来，这个学校是很不能令人滿意的。此外，有一个小老头兒，后来又有一个我称之为B的人，常常在晚上到我們屋子里来閑談。我記不起这个B是怎么跟我認識的，他近来常常来看我們。显然，我并不喜欢他，但这一点，我可沒有表示出来。

我有时候也不得不同这些新朋友談話。小老头兒特別引起我的同情，他看見我們的屋子不隱蔽，不很願意談話，在告辞的时候常常請我上他那兒去。我有时去找他，可是在他那兒覺得不很自在。你有时候到他家里，他正坐在那兒同他的太太(一个相当胖的迟鈍的女人)說着什么事。打过招呼以后，他請我走进前面的屋子，毫不客气地把里面的孩子赶出来，关上了門。在只剩下我們两个人的时候，我們就小声地或悄悄地談話，既不讓他的邻居也不讓他的家屬听到我們的一言半語。如果他的家屬有誰偶然走进屋子，这个小老头兒就要罵人，把他赶出去，并且把門上的搭扣扣上。我和他談書籍、社会主义、工厂制度，一般地也談各种問題；他把从前哈尔科夫的工人运动告訴給我听。他曾在那里住过好多时候，最后不得不离开那里。从他嘴里，我知道了哪些人是可以信任的，哪些人是很有希望的，哪些人是危險的；总之，我力求从他那里获得可能得到的好处。在我們談話时，他往往講起他怎样把合法的書籍藏起来，免得人家注意到他总喜欢研究“这些無聊的东西”。

自然，我看出这个人是没有能力参加現代的运动的。他年紀已老，不易改造过来。虽然如此，最好还是給他一点

什么工作，不讓他的不甚深远的思想完全埋沒掉。有时候，这样的人也能对运动有所帮助；当然，这时候跟着他們走是危险的，必須讓他們一瘸一拐地勉强跟着你走，那末事情就不会遭到損失了。我正就是力求用这样的态度对待那个老头兒。于是我們的友誼就增长起来了。不久，我又認識了同样的一个小老头，不过年紀比較輕些，他是一个有目的、有計劃的人，这些目的和計劃在我看来完全是空想的，也是永远不能實現的，可是你既然不能給他以另一种理想，又何苦打破他的理想呢。

在我住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的下半年中，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交游。Д 仍然繼續跑来，并且不知为什么特別注意我們的生活，这常常使我很恼怒。我有时向同志們提出这样一个問題：Д 究竟为什么要来，他需要我們什么，他只是向我們打听，而一点也不把自己的事情告訴我們。假如他想博得信任，他就得更直率些。

最后，我决定直截了当地問他前来探問的目的，可是这一点沒有来得及做到。

有一次，一个同志跟我講起Д 給他的一本小册子，我現在已記不得那是什么小册子了。我們決定一同讀完那本小册子。我們的屋子很不方便，因此我們就到那老彼得堡人的住处去找他，在沒有屋主人和房东在場的情況下，了解了小册子的內容。这是我們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住了六、七个月之后讀到的第一本非法的东西。可見那里的非法事業还很薄弱。在这本小册子以后，又出現了其他的小册子：我特別需要它們，所以我把它們抓得很紧。之后，我們同Д 的友誼就更亲密了，常常同他談起从前彼得堡的事情。

有一天，Д 向我們建議，要聚集起来討論一個問題。我

和同志們很高興地同意了，並且就在那個星期的一天晚上在一間屋子里聚會，提出了希望團結一致的問題，希望更積極地表現自己的存在的問題，以及從各工廠中搜集材料，特別是搜集有關當前重大事件的材料的問題。为了不致把這件事情遙遙無期地擱置下來，我們決定立刻着手工作。此外并議決，每一個人不但應當搜集材料，而且應當為他所工作的工廠寫傳單，這樣的傳單決定在下次會議上宣讀，如果我們認為它們是可以用的，那就用膠版印出來散發。這次會議決定，由于工作不多，暫時有三個人一起聚商就夠了；在我們兩個人中間，我當了選，因此從那一天起直到順利地離開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的兩年幾個月中，我成為這種會議的當然成員。我們的會開得相當多，各種技術方面的問題歸兩個知識分子負責。他們經常到我們這里來，或是來開會，或是帶來傳單，商談其他問題。我記得，我們從開頭起就彼此十分尊重。我和貝——工人和兩個知識分子非常活躍地參加我們的組織。貝已經是個相當有經驗的、早就干過革命工作的人了。主要是，他善于進行秘密活動，心思非常周密。我也已經有了彼得堡的經驗，知道怎樣行動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那兩個知識分子不很沉着，性子太急躁。這一點基本上只會對他們而不會對我們這兩個工人有害。

就我所知道的，在我們成立這個組織以前，就已存在着一個可以稱為手工業性質的、沒有什麼特出表現的舊組織，而我們的組織則在各工廠中奠定了作廣泛鼓動工作的基礎。在開始積極工作以前，我們就預先規定了自己的行動綱領；為此，我們同許多工廠，甚至同那些設在離葉加特林諾斯拉夫三十俄里的卡門地方的一些工廠取得聯繫。我們同卡門地方各工廠的正確關係建立起來了。傳單也分別準備

好了。这些傳单預定要在同一个时刻，即我們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散發傳单的那一天散發出去。

早在我們开始鼓动工作以前，我就觉得有必要另外租一間屋子，以便更容易保密。因此，我在这个时候虽然已經失了業，还是租了一間低廉的屋子。

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对于散發傳单的人說来，1897年年底和1898年年初是运气特別好的日子。所需要的，不过是在夜間大胆地跑出去，在碰不到任何人——正在安睡的警察、清道夫、奸細和密探——的时候，赶忙散發傳单。我們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情况。在出色地完成工作以后，只是在有些地方碰到了更夫，就平安地回到了家里。

有一天晚上，收到了預定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查德涅普尔和卡門散發的第一批傳单。必須在夜里把它們散發出去。傳单与其說是很多，还不如說是很少，所以我們決定要十足張貼一半。我轉告一个同志，讓他准备在当天晚上十一点鐘以后同我一起去工作。

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的气候，是相当寒冷的，很快就把所有那些不需要待在街上的人都赶走了。更夫偶然敲敲梆子，讓人知道他們在什么地方，敲过以后，就坐到角落里去舒舒服服地打瞌睡了。

当我和一个同志袋里藏着傳单，手里拿了一大罐調好的浆糊出門的时候，月亮已經爬得很高。我們繞过广场，越过铁路，走到了一个住着工人的名叫“工厂”的村鎮。我們四面張望了一下，沒有看見什么人，就在栅栏上塗抹浆糊，随手把傳单在浆糊上粘牢。我們小心地越过大路，一面在那些小屋的墙上塗抹浆糊，貼上傳单，然后四处把傳单放在地上或塞在栅栏的縫里。后来，我們进入另一个街区，把同

样的事情再做了一番，不过很快浆糊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好把传单塞在栅栏的缝里。

那个同志在散播和粘贴传单的时候心里很慌张，往往不够勇敢，但他还是继续忠实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过了一些时候，我们一张传单都没有了。我们就这样没有让谁注意到我们的独特工作，平安地回家了。

工人们早晨上班的时候，看见了散放在街上的这些传单，就把它们拣了起来或从栅栏缝里拿了出来；这样，传单很快就拿空了。群众开始停留在栅栏旁边，读着粘贴的传单。有些传单，他们很中意。他们抱着想把这些传单带到工厂去的欲望，尽力设法把它从墙上揭下来，这样一来，大部分的传单给他们撕破了，他们自己固然没法加以利用，别人也就没有机会再看到了；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后来得出结论，认为贴传单是不值得的，因为这种工作要冒很大的危险，进度很慢，而收效不多；反正大部分都要撕破的。我和那个同志只在一个需要散发传单的地区活动。除我们以外，还有人在其他地方完成这项任务，虽然我们人数很少，不能很好地到处散发传单……

在假定有必要散发传单的时候，就提出了可以在各工厂中散发传单的问题；这时才知道，我们只能在两个工厂里散发，虽然三个最大的工厂和铁路工厂里还一直没有发过传单。由于考虑到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受着监视，可能很容易引起警察来追踪散发传单的人。我们就不得不利用我在上文提到的那种散发传单的方法。

警察到第二天的早晨才知道那些出现在街头的传单，可是这些传单很少落到他们手里。第一次，一切都很顺利地过去了，参加的人谁也没有被人发觉。

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城及其郊区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卡門方面的情形还一点都不知道。最后，也从那里傳来了很可喜的消息。这就是說，开头的工作做得很成功，并且显然它在鼓舞我們要在最近期間也把其他的傳单發出去。但是我們打定主意不找警察的麻煩，要更仔細地逐一檢点一番，看有沒有暗探在我們后面釘梢，因为我注意到有一件可疑的事情在追隨着我。在留心地观察的时候，我看見有一个普通人經常在我住宅附近徘徊，显然他是在監視着我；那时我就开始注意他，往往出其不意地跑出大門，向他那个方向看去。

那个普通人戴着一頂庄稼人戴的帽子，穿着一件短外衣或短大衣，繼續每天待在同一个地方，或在同一个地方徘徊，表面上装作并不注意我所住的房子。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就通知任何人都不要来找我，而我自己則力求整天待在家里，晚上才跑出屋子，出去的时候，讓灯仍旧点着；假如偶然有人打算从远处向窗子里窺視，就会相信我好像是在家里。我沿着柵栏下降，然后跳了下去，等我一下子到了离我住的那条街道很远的地方、并且知道背后不会有人釘梢的时候，便动身到我需要去的地方去。我用平常的办法回家，因为要沿着柵栏吊到上面去是很困难的。这样办没有什么危險，此后我也就常常采用这个办法。上面提到的那个人監視了我两个星期光景。看来，他对我頗有好評，似乎已經把这种意見报告給了他應該报告的人，因此我以后就繼續安心地工作了。

在散發第一批傳单之后过了約一个月，打算在工厂散發的傳单已經准备好了，而且对于每一个工厂專門預备了一种傳单。我們相信这些傳单将轟动一时，可能还引起普遍

的搜查。領到的傳單是这样分配的：一部分留給鐵路工廠，另一部分留給布良斯克工廠，第三部分留給制釘工廠，第四部分留給哈勒施坦工廠（農具工廠），第五部分留給德涅伯河右岸的一些工廠（好像是法俄工廠），最後一部分留給卡門工廠。一共將近有八種不同的傳單。每一種傳單都反映出散到傳單的那個工廠對工人層出不窮地濫用權力和殘酷勒索的行為。

傳單應該在夜間或清晨散發。為了在白天就能知道結果是否順利，每一個在一定地點散發傳單的人都應該作出順利或不順利的暗號。如果沒有暗號，那就應該認為這個人已經被捕。暗號要用白粉在約定地點的牆上或柵欄上標出。為了避免混淆，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暗號。這種辦法很方便，也很秘密。

夜晚，我帶了馬秋哈動身到一個工廠去；我們在路上藏了一部分傳單，然後走近工廠。鑽進廠里去是很危險的，甚至在旁邊走過，都要十分小心，免得給看廠的狗聽見。我們走近一座兩層樓的樓房，跳過了柵欄，到了樓房的窗子旁邊。我把馬秋哈舉到窗口，他打開了小窗，使勁把一扎傳單扔了進去。我們就這樣地繼續行動，把傳單扔進三個車間，只剩下兩個車間沒有去；我們相信，在工人們的幫助下，一到早晨這些傳單也會在其他的車間里出現。的確，到了早晨，聚在一起的職工剛剛打開車間的門走了進去，立刻就將散在地上和工作台上的傳單撿了起來，過了一刻鐘，直到工長為止的全體職工都讀了傳單，雖然沒有達到罷工的地步，可是大家的不滿情緒已經極端高漲了。

在另一個工廠里，由於工廠日夜開工，工人們到處奔忙着，使散發傳單的人感到棘手。因此，散發工作曾經發生極

大的困难，可是这个散傳单的人很有耐心，也非常机灵，只是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他早晨带着傳单去上班，不慌不忙地工作了一整天。当大家在七点鐘准备回家的时候，他也和别人聚在一起，可是他沒有走出大門，而是走到人們挖掘自流井的地方，溜到了井里，坐在梯子上整整待了五个鐘头，直到夜間十二点鐘，这正是机器停歇讓工人吃半夜餐的时候；后来，我們这位自願囚禁起来的囚徒带着准备好的傳单小心地爬到上面，等着熄灯。这是最宝贵的时刻，他就是为了等待这个机会才在坑洼里坐上五个鐘头的。各車間的机器一停歇，电机也立刻停下来上滑潤油。这位同志看到电火一灭，馬上就从坑窿里跳出来，奔进車間，不顧在夜間的黑暗里会撞着什么东西，迅速地散發傳单。接着他跑出車間，或是奔进另一車間，或是从打破的玻璃窗里扔进傳单，然后急忙地飞奔到选定的地点，就在电灯的照耀下跳过栅栏，脱离險地，沒有被誰發覺。

电灯熄灭三五分鐘，这期間，工人們安靜地坐在工作台上或者別的东西上面，絲毫想不到有人在匆忙地跑着散發傳单；当灯光复明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搶到一張放在地上或工作台上的傳单，开始閱讀。这时候，我們这位已經跳过栅栏的主角，打破了办公处的玻璃，把傳单塞了进去，此后就安然地回到家里，躺下睡覺。早晨，他到工厂去的时候，把这种傳单当作厂里的新聞一样閱讀着。这样的方法是常常被使用的。

夜里，当局的人都在睡覺，只有到了早晨，才会来沒收傳单。这时留在厂里的傳单已經很少。它們一部分落到乌克兰土屋里，落到卡伊达基或捷也夫卡，或者落到了契契辽夫卡，因此警察們有时候只好滿足于两、三張沒收的傳单，

这当然無法削弱这些傳单所造成的效果。

在其他几个工厂，大概也正是用这种方法偷偷地放置傳单，并且处处都很順手，沒有引起人們对放傳单的人發生任何怀疑。这一次傳单起了很大的影响，所有的工人都知道了这些傳单，工厂主管人員也知道了，宪兵队和警察队也知道了。可是他們誰也弄不清这是哪些人散發的。这就鼓励我們用同样的办法繼續进行以后的工作。在所有的工厂里，工人中間傳說着不久就要發生騷动的謠言，这些傳单使工人們振奋起来了，另一方面，当局的气焰显然已經矮了半截。

我記得，在卡門工厂散發的傳单里，曾提出在工厂系統內建立病房的要求，第二天就从理髮館里請来一个医助，安置在工厂的編制以內；还要求在那里造两座出外的大門，这也如願以償了；另外还有某种要求，也得到了滿足。当地的警察局长（显然是县警察局长）猜想一定要發生罢工，而他实在又不知道工人們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于是他想起了傳单里提出的种种要求，就不等工人方面提出任何請求，立刻讓这些要求得到了滿足。在有些工厂里，許多要求就是这样地得到滿足的。

通常，任何工厂当局都力圖使大家相信，他們工厂里的制度是最好的，工人对工作条件都很滿意等等。而現在突然这样赤裸裸地揭露了各种虐待工人的行为！工人們从傳单里知道了实际情况，清楚地看出指示的正确性，都滿腔希望結束这种豈有此理的行徑，哪怕是結束一部分也好。总之，平靜的沼澤开始起了漣波，預料就要掀起汹涌的浪潮了。

騷动只会給工人带来損害，关于不希望發生騷动的話，

在傳單里講得很清楚。因此，聽到工人中間傳說完全與傳單內容相反的要舉行騷動的謠言時，覺得很奇怪；可是工人們在讀過傳單後卻立刻說，人們號召舉行騷動。進行鬥爭的舊的傳統還很有力量：工人們還不能想像不毆打工頭或搗毀辦公處就可以罷工。在傾聽他們的談話並直接理解到所談問題的範圍時，不會聽到他們提起任何罷工的事，雖然每一個工人都會講述一些關於騷動的回憶；而這個時候如果提起當局方面所實施的鎮壓，那是不會產生什麼效果的。這種談話總是以他們暗地里表示希望組織一次像樣的騷動而告結束。當然，這時候他們會想起某一個他們真正稱頌的領導者。在這種情況下，群眾自發地加以理想化的，顯然不是他們完全陌生的罷工，而是騷動，因為這種抗議的方法是每一個人都能懂得的。

傳單鼓動了廠里的群眾，我的工作增加了。首先，必須搜集更多的材料來印發新的傳單；其次，需要同我的那些在卡伊達卡方面的熟人晤談，這常常是在晚上。年輕的群眾不能很好地領會我的意思，往往完全誤解了我的話；只有一個青年真正懂得我的意思。他們要求常常來，甚至企圖租一間單獨的屋子供上課之用。在這一伙人里，我曾碰到兩個近乎民意黨人的人……最使我生氣的，是他們往往以不許人家提意見的命令方式來傳播自己的觀點的那種落后作風。如果有哪一個年輕人開始擺脫他們的影響，他們就要暴跳如雷。他們特別對「感到憤怒，因為「似乎想要把年輕人引上可怕的社会主義和革命觀點的道路，如果有人還是感染上這些觀點，他們就會把他視同陌路，有時候還認為同他作梗是很有道理的。有一個民意黨人在布良斯克工廠的機械工場里工作，得到了相當多的報酬，自己有一宅小房

子，生活過得很不錯。因此，他對真正的社會主義顯然沒有什麼熱情，只求白忙一場。我屢次企圖了解他們究竟抱有什麼樣的觀點和規定什麼樣的綱領。可是我得不到任何結果，只看出他們是竭力想要擴充自己手下的青年人的力量罷了。

“在讀‘斯巴達卡’以前，應當研究一下希臘的歷史，你才能够了解這部小說，”有一個民意黨人對年輕職工們談起他們閱讀“斯巴達卡”時說。他們總是竭力強調自然科學，而我在翻閱那些從這幾位先生那裏拿來的書籍時，多半只看到算術習題集、文法課程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當青年人要求看一本比較嚴肅的書籍時，他們就回答說，這還太早，據說應當先精通地理、算術、文法等等，然後才可以開始看嚴肅的書籍。由此可以明白，為什麼那些年輕人老是不滿意自己的領袖，不願仔細研究他們給的書籍。

當然，不能否認在教科書里也有好的方面，但這應當在學校里，而不是在一個人希望了解他的社會地位的本質或對工人運動發生興趣時的學習上。民意黨人的學生固然常常向自己的老師提出意見。可是他們並不能夠全心全意地獻身於需要犧牲的工人運動，因為他們是被自己的老師用銖兩必較的自私精神教育着，雖然社會主義的世界觀要求放棄每一戈比，甚至要求爭取廢除每一戈比。我記得一位同志講起，當他偶然走進車間談談某一個人的情況或利用機會向什麼熟人進行宣傳的時候，就有一個上面提起的民意黨人來追問他。這個不幸的人只是為了欺瞞熱心的民意黨人的獨特的偵察行動，有時就不得不採用偽裝的辦法。在和這種民意黨人談話時，我常常想起彼得堡的同志H的一句話，那是講到彼得堡的一個工人—自由分子時說的。

“作为一个自由分子，他还不坏，是个很好的人，可是作为一个工人—社会主义者，他就相当卑劣了。”这句话对于这些先生也是同样适用的，虽然他们只是解释了上半句。而俄国的宪兵们有时还要查究甚至惩罚这样一些先生！这只有证明，警察队和宪兵队的一切蠢物看来都是恶魔。

我打定主意不同上述的民意党人打交道，并且要求同志们不要在他們面前講起我，免得讓他們知道。我耽心人家可能会对我散布各种流言，那样的話，我就不容易繼續保持隱蔽的地位了。在当时俄国的条件下，出了名是很危险的。这一点我当然完全明白，因此我权且把民意党人撇开，固然还經常特別注意他們，同时开始常常到卡伊达卡的当地青年人聚集的地方去。我在那里待到十二点鐘，待到夜間一点鐘，然后动身回家，由几个人送到一个树木茂密的深谷，我自己再从那里走向德涅伯河，路上由于刺骨的勁風和寒氣而直打哆嗦。我身边藏着一柄短刀，因为在那种地方走路并不安全，我曾相信我会被人搶去銀錢和其他东西。在卡伊达卡有了熟人，就使我以后能在他們从前沒有到过的地方以及在我离开叶加特林諾斯拉夫以前他們不再去的地方散發傳单，并且对此后的工作也有把握。

到了1898年的春天，我們成了孤兒。在傳单出現后不久，我們的知識分子开始受到严厉的監視，他們应当离开这个地方。可是，他們显然抱有完全不同的意見，再三跟我們說誰也沒有監視他們，并且繼續来拜訪我們，繼續准备一批一批的供散發用的傳单。

有一次，我們本来規定要举行一次討論某一問題或关于領取傳单的碰头会。我和一个同志来到了指定的地点。可是我們自己人一个也沒有碰到，只發覺有一个陌生人站

在街角。我們沒有特別注意這一個人，就停下來開始談話。我們在廣場上站了好久，於是那個站在街角上的人就開始形迹可疑地盯着我們看。我們注意到了他，就討論起這個人是不是密探的問題。我筆直地向他走去，希望看清他的面貌。他發覺了這一點，就沿着街道走去，很快便拐進一個院子，在那里消失了；我走近那所房子的大門，沒有看見一個人，就折回來告訴我的同志，說那顯然是偶然的事情，於是我們繼續站在沒有人的廣場上，心里已經很焦急，埋怨同志們不守時刻。最後，終於來了一個同志，在他後面很快又出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當我們四個人聚在一起，開始討論某一個問題的時候，那個行動詭秘的家伙又在附近出現，開始卑鄙無耻地在我們的四周兜圈子。我們的心里產生了要結束這個密探的性命的熱烈願望，可是誰都沒有手槍，而他顯然是帶着武器的。我們決定使用刀子，大家都向他移動。也不知是他猜到了威脅着他的危險，還只是以為我們要穿過廣場，他却用相當快的步伐沿着那個廣場走去。當他已經離我們很遠的時候，我們突然拐彎，走過一部分的街道，然後跳過了柵欄，走上另一條街，再爬過柵欄，到了鐵路停車場，在那里的大批車輛中間是不容易追蹤我們的。這樣，我們的會議給打斷了，而我們在匆忙地交換了一點情況以後，就接受了傳單，各自走回自己的住處。這是最後一次和知識分子會面。因為，正如後來所知道的，確實有人在釘他的梢，而上述的那個形迹詭秘的家伙就是从城里專門跟他來的。當那知識分子躲進了一個空車廂的時候，密探認為一定是到指定的地點會面去了，因此他仍舊在那里等候，希望好歹能發現一個工人的踪跡。這一點他沒有成功，可是憲兵們不久就不讓那個知識分子自由行動了。

現在想起那個知識分子的時候，我可以說，他是一個忠心耿耿的人，但是他盲目地相信能夠很快地實行自己的主張。

我記得有一天夜里，當我送他回家的時候，我們意外地碰見了瓦。我們的四周一個人也沒有：在城市的危險地段，這樣晚是不常看見行人的；因此，我們放心地在一座小橋上坐下以後，就非常熱烈地談起我們的工作來。

夜間的黑暗籠罩着我們，只有遠處布良斯克工廠的寬闊的火光鮮明而動人地證明我們的工作的必要性。那個出了神的知識分子說，我們的鼓動工作再搞三年，多至四年，這個制度就要崩潰了。

我竊笑着這個出神的知識分子的天真，這是一個熱心的、淺薄的人，一個社會主義者。可是他為了自己的理想甘心毫無保留地犧牲自己。大家可不願使他失去信心，他對葉加特林諾斯拉夫說來是個值得看重的人，他第一個開始用鼓動宣傳的方法進行工作，第一個帶來了一些傳單，那些傳單有必要向廣大工人羣眾指出並說明他們的艱苦生活，並使他們的閉塞的頭腦中產生對於革命的渴望。大概，此後的長期監禁完全損害了這個先驅者的智力。

這樣，他就被逮捕了。另外還有幾個知識分子也被逮捕了，可是工人中間卻沒有一個人被捕。無論我們或事業所受的打擊，都是嚴重的。可是，這些逮捕絕對沒有在較深的程度上影響羣眾中的工作，因為工人——領導者們沒有遭到損失。事情進行得相當順利，參加散發文件的人每天都在增加……可是我的話有點講過頭啦。

正如我曾經提到的那樣，在剛開始散發傳單的時候所採用的一種方法，是把傳單貼在過道或者牆角旁邊的柵欄

上,但是很快就被警察注意到了,所以不得不改换另一种方法。記得有一天夜里,天气很冷,我和一位同志从家里出来,两个人的口袋里都装满了叠成三角形的传单,积雪在我們的脚底下沙沙作响。我們走完一条街又一条街,在每条街上都撒下了三、四張传单,走到最后几条街道的时候,我們便分头沿着两条平行的街道走去,一路上撒着传单;同时必須常常从街道的这一边走到街道的那一边。最后,我們在街道的尽头相遇了,便向着布良斯克工厂走去,尽可能地在所有通向这家工厂的小路上都撒下了传单。我們走了很多的路,后来便拐了个弯,越过铁路,向另一个地点走去,后来从那里再往前走,又撒了許多传单,因为这条路是通向工厂区的。經過一处栅栏,在那里扔完了传单以后,又走到铁路上来,从一列停在信号机旁边的列车车厢底下鑽过,又在路上撒了許多传单。当我们看見自己的口袋凹进去的时候,便往回走。走过工厂以后,我們便朝着一条通向这家工厂的小路上走去,虽然路上行人很多,可是我們仍然把剩下的传单都撒到这条小路上。我們总共只有两个人,但我們尽可能地在許多条小路上撒了传单,这样就能使这些传单准能落到每一家工厂里去。我們用这种方法把所有的传单都撒光了,便从容不迫地回家。我們在約定地方的栅栏上,用粉笔划了个暗号,好讓自己人在白天看見这些暗号,知道此地一切都平安無事,因而可以走进此地的某一戶人家。早晨,我們一走进工厂,每个人都听到大家在紛紛談論传单的事情。

我們津津有味地聽見人們夸大昨天夜里發生的事情。許多人都在談論,一个夜里到处都撒了传单,可見“他們”干这件工作的人一定很多。当然,我們也听到了关于“这些

人”的威力和勇敢的各种各样的傳說。

一个工人毫無危險地在大街上檢到了一張傳单。他把傳单帶到工厂里，于是，許多人把傳单上的文字讀了一遍。最初因为積極分子的人数很少，很难發現傳单到底产生了什么印象，工人們在談論些什么。后来我們特別注意这件事情，責成大家有义务尽量地去傾听工人的談話，把听到的一切都彙報給委員會。此外，每一个積極分子都應該尽力去認識暫時還沒有和革命發生任何关系的工人，时常去訪問他們，以便尽可能多搜集一些关于工厂的确切情报。

在卡門工厂（离叶加特林諾斯拉夫三十俄里）撒了三、四張傳单以后，那些撒了这类文件的工人便引起別人的注意。有一个星期日，一个撒傳单的工人来找我，后来又来了一个，他們把自己要逃往奧地利去的打算告訴我。因为待在奧地利比起待在俄国要好得多，而且自由得多。

我覺得很惋惜的是，工作剛剛开始，每一个有覺悟的人都十分重要和宝贵，而且工作還沒有打好什么坚固基础，而这时候，他們却想着要走开，他們好像光是为了自己的“我”，而要尽力赶快离开，这是件十分遺憾的事。

另一方面，我又害怕他們当真会被捕，这等于把多余的一張王牌送到宪兵的手里。宪兵会把这些人从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弄走，因此，能够逃脫宪兵的魔掌，从而逃脫这些張着血盆大口要吞食我們这些受害者的凶恶敌人，也是一件愉快事情。我恳切地要求我的卡門工厂的同志們向我报告他們平安越过俄国国境的消息。他們答应了我的要求。不久，我果然知道了他們平安抵达奧地利的某一城市，并且很快在那里找到了工作。这些同志离开时，給我們留下了关系。他們走后，傳单繼續像从前一样准时地出現。这是最

早一批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们干的，我当时曾被迫和他们分手。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我又被迫和另一批朋友分手，我曾经和这些人在夜间散发过传单，有时曾一同待在井坑中。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只要什么地方一开始发生运动，那里很快就会失去一些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情投意合的同志。

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我们失去了几个知识分子，他们一直都是我们的鼓舞者。必须提一提这些知识分子的优点，他们在没有和我们商量以前，几乎从来没有擅自做过任何事情，所以我们的新事业进行得很顺利，而且获得了发展；我们之间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意见分歧。进行这种工作，这点无论在哪里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必须加以强调。现在我们被迫失去了这些一直完成了重要工作的知识分子。

不用说，这对我们发生了严重的影响，对鼓动工作的影响尤其严重：我们甚至没有一个人做过这种工作的技术方面的事情。这点在传单的缺陷上特别可以看出来，因为编写传单，我们当然是办不到的。正像不幸地发生了一场埋住许多人的雪崩以后，不许人长久地考虑用什么特别方法来刨掘这些人，而是必须赶快拿起镢子来挖，不知疲倦地、无止境地挖下去，一直挖到能找出活人或死人，我们也没有时间讨论我们的处境，必须尽可能快地接受留下来的工作。

Л同志不得不去建立一处文件储藏所，虽然文件的数量不很多，但是它们对我们越珍贵，我们就越应该尽可能谨慎地保藏它。Л化了两个卢布租下一间屋子，他把文件放在篮里带到这间屋子里去，放在卧椅（一种木床）底下。第二天自己就离开屋子，借口职务关系，必须出差，实际上他

是回到他定居的那所房子去，而且从来没有想着要离开那里。他开始每周一次或两次地到文件储藏所去过夜，免得引起别人怀疑，或者怀疑他专门来拿文件。

同时，他又得给自己找一些助手，两个人工作很困难，何况担负领导成千上万群众这一重任是很艰巨的。就我现在所记得的，当时我们也印过传单，但是知识分子方面的积极性这时已经低落了。

上面还没有谈到必须完全由我和贝编辑传单的事，贝还必须经常缮写胶印器上的原文底版和印刷传单。我们还必须指导散发这些传单的工作。但是，这件工作非常容易，因为我们得到了工人们有力的支持，只要把传单交出去就行了，用不着我们去散发。

我们的工作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着，工作面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

我们终于吸收了两个新人来参加我们的工作，这样一来，就把那些抱着指导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一切运动的目的的人结成了一个非常团结的集体。我们抓住各种机会出版传单，解答工厂中发生的问题。我们的话都变成了事实。我们准备了大量的传单，成批地出现在工人们中间和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的大街上。

我记得我们为了讨论某一个问题而举行过一次集会。正如当时所有的集会一样，这次集会也是在户外举行的，地点在城外某地。我记得我们全都到齐了，只等待着一个迟到的同志。我们谈到各种问题，交换一些听到的话，并且开始讨论到今天的集会，然而老是不见那位同志到来。我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又无法知道他缺席的原因，我们忍不住地甚至决定要散会。正在这时候，那位同志忽然来了。我们

很冷淡地迎接他，开始严厉地盘問他迟到的原因。他断断续续地回答我們，而且常常显出非常兴奋的神情。最后，他答应告訴我們一件特别重要的消息，这件消息不但会使我們，而且也会使得俄罗斯全国和俄罗斯全体工人大大地高兴的。看起来，他是在計劃着怎样更加有力地影响我們。我們一声不响地听着，等着他說出这件重要消息。这件重要消息究竟是什么呢？最后，他非常兴奋地宣布：所有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已經形成了一个統一的政党。它的名称叫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拿出了一份党为这事而公布的宣言^①，我們为了表示对党的尊敬，立刻站起来讀完这份宣言。我們当时就在会上宣布自己的組織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市委员会”……

有一天晚上，我和Г坐在自己家里，我忽然高兴得惊奇起来。刚从伏洛果州流放所归来的 П. А. 摩洛索夫，在一位彼得堡同志的陪同下走进屋来。当然，我們都是老朋友，所以很快就几乎在所有的問題上和他取得一致的意見。鑒于摩洛索夫是一个很开展的老練的人，他見過各种各样的人物，知道各种各样的方法，因而准能在許多方面帮助我們。这样，我就断定應該把他吸收到我們的委员会里来。我把自己这种願望告訴过別人，得到了大家的同意。这种願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我們非常需要参加过工作的、具有丰富工作經驗的、能够多少帮助我們編写各种傳单的人。摩洛索夫可以說是最能符合这些要求了。也就是說，他是个最理想的人。他被接受为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委员会的委員。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屆代表大会的宣言。——俄文版編者

在和摩洛索夫遇到以前，在“工人階級解放斗争协会”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小組改为“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委员会”以前，我加紧同我的老头子在德涅伯河对岸下德涅伯罗夫斯克小鎮上进行談判。他这时已經搬到了那一带地方去住。我常在晚上或是星期天到那里去。我們就在他家里开一个有两、三个人参加的小会。我們的會議不带革命的性質，但是仍旧很秘密，都是悄悄地召开的，决不許住戶中任何一个人走进我們开会的那間小屋子。当然，我所遵循的，或者說指导我的，是純潔的革命思想……

我的老头子早就有了开办一家合作社的打算。他相信業務很快就会兴旺起来，这样一来就能够积聚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錢。它能够使我們把强大的革命事業向前推进一步。我在当时已經知道合作社的業務，特别是知道布魯塞尔人民合作社，当然，这一点使我产生了一种希望，相信能够把業務办好，那时就可以从合作社的基金中抽出一部分資金来支援革命事業。我对这种工作不能說沒有濃厚的兴趣。

老头子的計劃是在工厂附近开一家小鋪，因而我們就会有足够多的顧客，特别是我們如果能够努力用各种方法把它办得大众化的話；后来，他自信自己熟悉經商的業務，向我們保證，决不会因为开办这种小鋪而遭到任何亏损。万一遭到什么失敗的話，連老天爷也不会知道，我們在这家小鋪上会賠去什么錢。我們决定尽可能准确地計算一下有多少冒險的成分，以及我們的計劃有多少保證的因素。我們开过好几次純粹秘密性質的集会。当开办这家小鋪的問題已經解决了的时候，还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回事。在有一次这样的集会上，我們最后解决了這個問題。剩下來的，只是

筹集一部分資金來添置開辦設備的問題；雖然小鋪在計劃中不是辦得很大，但是它創辦的目的就是為了取得資金，如果沒有錢來購買必要的商品，我們的計劃肯定是會破產的。我去催促同志們，要他們每人出五盧布來建立這個機構，連同我自己的錢在內，一共籌集到了五十盧布。必須去請求我們的一位同志，他約有二百盧布，要他借些錢給我們，哪怕開具借據也行。他並不是一個特別忠心耿耿的人，他終於憑票據借給老頭子一百盧布或一百五十盧布（正確的數字，我記不起來了）。

除了我而外，老頭子和其他兩個人，都是屬於某一個組織的成員。看樣子，這個組織是在經濟鬥爭的基礎上產生起來的。它的幾個成員後來因故被捕，當作刑事犯被定了罪。他們的罪名是毆打一個公務員。為了辦理他們的訴訟案件和援助他們，募集了一筆當時說來是非常可觀的現金。這筆現金剩下了三十盧布，暫時還沒有地方可用（被捕的人都被遺送到故鄉去了）。我們決定把它們作為流動資金，條件是在亟需時可以取出三分之一，用來幫助因散發傳單或因參加小組而被逮捕的人。這筆錢，像我說過的，決定作為小鋪的流動資金。我們所籌集到的資金約在二百盧布左右，後來還增加了大約五十盧布，我們決定拿這一筆錢去經營商業。

老頭子被選為小鋪的法律上的老板，他不但要主持小鋪的業務，而且要对這小鋪的一切事情完全負責。收到錢後，他就必須發出票據，作為防備任何意外的保證。這樣一來，開始就对籌集到的資金確定了法律上的保證。以後，老頭子必須定期向檢查員正確彙報賬面上的買賣情況和存貨的數量。我被選出來充當這種檢查員，所以我对這一企業

負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責任。我們決定定期召開全體大會，好讓我們在大會上知道業務情況，並且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而採取某種決定。我們也決定將小鋪暫時開辦三個月，期滿時，我們的大會就應該來決定小鋪是否要再開下去。最後責成每一個人去招徠顧客，但是盡力不給任何人賒賬。

在這一次會議以後，我們收到了資金，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我們的代理人着手找尋合適的房子。但是，找了很久還是找不到——這點使我們開始失望；主要的原因是缺少資金。房子倒是找到了一些，但是有一個條件，必須預付一年的押租，總數達二百五十盧布或三百盧布。希望這樣的房子里能住上一戶人家，而且房子要相當不壞。這樣將是十分有利，而且非常方便，因而可以逐漸擴大營業。儘管我們有這樣的希望，然而因為缺少資金，租賃這樣的房子對我們來說是絕對辦不到的。我們必須像正視愉快的未來那樣，也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一個月以後，我們以每月十八盧布的房租在市場地區租下了一所房子，條件講好是租半年，預付三個月的押租。在不可能找到更加有利的條件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同意這些條件，而且不得不立刻支出我們全部資本的四分之一；接着，必須領取營業証，這樣又得支出各種各樣的小數目的費用，因此很快就使我們資金減少下去。當這一切事情都辦好之後，我們又得拿剩下的為數很少的資金去購買商品，而這些資金是必須要給我們增加收入的。我們所抱的能夠從小鋪里獲得特別幫助的一切希望，一下子都破滅了，而花去的資金也要求我們出一把力，無論如何要把它們賺回來。

我記得在一個星期日，我去向那個名義上的老板祝賀小鋪開張之喜，同時仔細地觀察了一下小鋪里的內部情況。

房子足够使用，地点非常热闹，顾客盈门，而且看起来好像都很有钱。但是，不幸的是，几乎没有做过一笔买卖；在我待在店里的半个钟头的时间内，店方就回绝了四、五个主顾，理由无非是说还没有备全这些商品。的确，排列在架子上的木箱，里面都是空的，有一处地方放着一堆商品，然而数量实在可怜，一堵墙壁上是精光光的，连一枚钉子都没有。几包纸袋里装着两、三磅各种各样的米粒，柜台上摆着四、五个装有糖果的玻璃瓶。当然，糖果的数量也是不多的；这里挂着两磅腊肠，小铺门外的台阶上摆着一整桶鲱鱼和一大束黑海产的小鱼，那里还放着粮食和一些供应乡下顾客的物资。我对它的第一个印象是不太好的。只有关于最初几天营业的数字的报告，才使我对美好的未来产生了希望。当我知道总共买了多少钱的商品，弄到了多少越来越感到短缺的资金，将用第一次的收入去购买什么东西以后，当然，我就抽走了我们小铺里可以购买必需的物资的全部资金，预备动身到城里去。这时候，他们要求我不要带一部分钱带走，留下来满足本地的一些顾客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合作社的创办情况，虽然这样的创办是很难令人满意的，但我仍然认为每一座城市里都应该有这样的小铺。只有一件很糟糕的事：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小铺说成是合作社。我们的小铺在各方面都很秘密，这样自然就不能对它有利；如果不是情况特殊，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拿这样的资金来开办这样的小铺。应该说明，这虽然是一间小铺，却需要一个人在铺子里连续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以上。安插了一个人以后，我们必须付给他相当的报酬。我们虽然这样穷困，仍然规定为十卢布。因此，我们每月最低的支出也达三十卢布；房租十八卢布，职员工资十卢布，守门的人月费六十戈比至一

卢布，外加电費和一些想不到的开支，而商品总共只有六十至七十卢布。

虽然我的住处离开小鋪八俄里，而且我从来不曾为小鋪的事情跑过腿，但它仍然剥夺了我很多時間，而在当时，時間对革命工作是十分宝贵的。必須重視这方面的牺牲，虽然我从前对于時間是毫不注意的。最后 R 同志直率地对我指出，在時間这样宝贵的情况下，我为了小鋪付出了过多的時間。我虽然爱惜時間，但是一星期也应当至少到那里去一次，听听越来越大的怨言，說什么連创办人也对这个机构冷淡啦，一个老人做这件工作太辛苦啦，等等。在这一类的話中，我清清楚楚地感到，这是对我的責难。因而我就坦白地說出，我不能为我們的小鋪抽出更多的業余時間，而使革命的工作遭到損失，如果別的人也不能帮忙的話，那末就很难把事情做好。我甚至沒有进行特殊的檢查就离开小鋪。我觉得这样做，对于这一工作的领导人是一种很大的侮辱；但是，我对他的忠实是深信不疑的。

革命工作按照自己的次序非常正确地进行着。我們也定期举行會議，經常印發傳单，而且另外还印發了一本著作。

必須把事情稍稍往回談一談。

正像我說过的那樣，在事情失敗以后，我們自己就担負起保管文件的工作。可是，我們的保管方法是非常冒險的，而且非常不方便；我們和 R 就想出一个新的保管方法，最后决定把籃子移交給 T，他会把籃子保存在他那里。我和 T 从前就已經談起过这件事。我們决定在房子附近刨一个大坑，把籃子放在坑里，当然，不應該讓任何人知道。

我們决定行动。我站在一所穿堂房子的大門旁边，等

候載着籃子和 A 的那輛馬車到來。當然，我同時也不得不體驗到一種特殊的焦急的心情。那輛載着 A 和籃子的馬車悄悄地轉動着，一會兒就出現在街角上。馬車停住了，A 開始付車錢，我就扛着籃子穿過穿堂院子，走到另一條街道上，接着又走到第三條街道上。Γ 已經在那條街上的一所房子旁邊等着我了。他接過了籃子，我們就一起走進屋子，把房門關起來，開始檢查籃子裏面的東西。雖然裏面藏着的東西很少，但是我仍舊找到了許多使我感到興趣的東西，而 Γ 一般說來讀過的書是很少的，所以他對各種的文件感到很驚訝，當然他也想讀一讀他沒有讀過的東西。

我們把書籍整理完畢，把所有的書都開了一張清單，然後把籃子放在牆角。Γ 有幾回在黃昏和黑夜里爬到房子附近，想挖一個坑。但是我們後來認定，這是很不方便的事，而且也不很安全。正在這時候，我們得到一個機會可以把籃子送到一處很安全的地方，於是我們很快就把籃子送到那裏，後來又把它當作一只盛滿舊衣服的籃子，從那裏轉送到別處去。我們把這樁事情辦得很好，我們相信沒有人會注意到這些地方。

我記得有一回，Γ 男扮女裝到我這裏來。我甚至一時都鬧不清楚究竟是誰到我這裏來了——如果一個受到監視的人負有許多重要任務的話。當然，這樣的小心並不是多餘的。在暮色蒼茫中，甚至在深夜里，都得時時小心翼翼地跨出大門，看清楚屋子附近有沒有人，有時必須走來走去，保護同志的住屋，以便偶然發現有人跟蹤，如果真有這種情況的話。

夏末，有兩個人退出了我們的委員會：一個人實際上是由于胆怯，另一個人是因為要逃亡到倫敦去，所以委員會里

必須補充一些新人。在沒有垮台以前，我們的委員會是由一些工作了半年以上的工人組成的。集會大部分是在郊外的曠地上舉行。我們在那里一次也沒有被人注意到。在這樣秘密的情況下，我們只應該吸收那些非常小心而又堅強的人來參加我們的委員會。正在這時候，我認識了一個也受到監視的、從前曾在一座大城市里工作過的人。他老早就在找尋接近事業的人，而且希望親自參加工作。在沒有得到他的可靠的情況以前，我們雖然仍舊和他保持接觸，但沒有把他吸收到組織里來，一直到後來才把他吸收到委員會里來；接着「」也被吸收到委員會里來了。這樣，我們就用一些無限忠於事業的人來彌補自己所受到的損失，委員會得以繼續正確地執行着它的工作。正是那時候，某一大城市派了一位代表到我們這裡來，同時他給我們帶來了他的——個熟人，這個人是應該參加我們委員會的。新同志是一位知識分子，雖然他受過高等教育，但是在他看到了我們已經習慣了的、已經搞得很熟的獨立工作以後，他仍舊覺得自己很為難，認為自己在關於工人問題的知識方面很不夠。因而，我們就讓他去領導一個由青年人組成的小組，但我們仍然要求他參加委員會的工作。這個委員會，他也去過好幾次。這是當時知識分子中第一個參加小組工作的人。1898年的冬天就這樣不知不覺地到來了。鼓動工作具有正常而定期的性質，雖然各小組幾乎沒有集會，而且也沒有可以參加小組工作的知識分子。由於沒有業餘時間，參加委員會的工人不可能定期從事工作。可是，從這時候起作出了一個決定，委員會務必一星期舉行一次會議。這是一個對於整個活動非常有利的決定。哪怕一星期舉行一次，這也是一種工作，因為每一個參加集會的人都要報告他所在的那個工

場或工厂里的事情，任何特殊的事情都要着重加以說明，有时候甚至決定出版小報來加以說明。如果發生小規模罷工或者什麼沖突的話，委員會就必須了解全部經過情況，作出決定，並把這些決定付諸實施。委員會由於知道自己處境的困難，很感激少數偶然參加的知識分子的幫助；但是，他們的幫助是很不夠的。這樣，我們就成為一伙中間沒有任何一個知識分子的人們。就在這一年中，我們的同志貝被捕了。這是我們委員會的一個大損失，他是我們中間最老的同志，他對於組織的事情比誰都知道得清楚，他和知識分子保持着聯繫，或者用我們的話來說，和城里保持着聯繫，因為城里總是有一兩個人在那裡工作的。在他們的幫助之下，我們得到了各種各樣的書籍。隨着貝的被捕，我們暫時和城里的小組失去了聯繫，這個小組除了書籍之外，還經常供給我們金錢和從事小組工作的人材。

就是沒有這一切事情，我們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的工人們也得尽可能多努一把力，竭力不暴露我們的弱點。但是，在我到達叶加特林諾斯拉夫期間，不止一次地發生了完全缺乏知識分子的情況。在貝被捕之後（他不是因為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的案件而被捕的），我不得不常和城里保持聯繫，這一額外的工作剝奪了我的許多時間。

我因為對這個工作做得不夠好，向城里建議要一個知識分子。這個人很快就找到了，因為這時候正有一批人從流放地回來，他們願意參加組織。原來這樣一批知識分子已經在城里成立了他們的委員會。我們的委員會起初一點也不知道這個知識分子的新組織。自然，它是願意擔負領導工作的責任。事情是十分令人奇怪的，正當老委員會（工人們這樣稱呼它）正確地起着作用的時候，就是在它每周舉

行一次集会，討論各種問題，出版小報的時候，同時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委員會。當然，這個委員會對執行工人委員會的各種決議的工作，例如，運送書籍，募集資金和印刷已經編好的小報等等，是不能感到滿意的。

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那樣，知識分子希望掌握編寫小報和總的領導運動的工作。在這一個基礎上，工人委員會里發生了各種各樣的衝突。這主要都是城里的代表們，也就是知識分子委員會的代表們所引起的。起初衝突是偶然才發生的，而且很快就解決了。可是，漸漸地開始發生一種不愉快的轉變。產生了普遍的不滿，糾紛也增多了，事業因為糾紛而受到了重大的損失。

我記得知識分子們常常攻擊已經散發了的傳單上的似通非通的用語，好像有一張傳單被城市委員會作了一些修改和刪節。這件事情引起了直接的衝突……

已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候，而糾紛還是沒有減少。在每一次集會上，委員會都提出種種的措施，企圖使兩個委員會互相達成協議。曾經建議召集兩個委員會，並在聯合大會上從兩個委員會中各自選出人數相等的人員，如能合併起來，就可以組成一個統一的委員會。城市委員會不同意這一措施，借口是聯合大會規模過大，可能引起懷疑，而且他們也不知為什麼原因，不願意選出數目相等的人員來組成一個像建議中所說的聯合委員會，但是兩方面都覺得有必要來擺脫這種緊張的處境。

終於，在下面幾點互相讓步的原則上達成了協議：（1）工人委員會的集会按照舊程序舉行，知識分子中派遣一個有發言權的代表來參加集会，但是，這個代表不能更換，而且每次如果沒有得到工人委員會的特別同意，他也不能夠

帶領城市委員會的另一個代表來參加集會；（2）同樣的，城市委員會也必須把自己集會的情況，通知工人委員會派來參加集會的代表，而工人代表也必須向工人委員會傳達城市委員會里討論過的問題和通過的決議；（3）兩個委員會同樣可以為某一個工廠的工人，或是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的一般工人寫作東西，但是，最後的編輯責任，以及承認它的及時性和必要性的權力應該屬於工人委員會。在這方面達成了協議，以後對這些問題幾乎沒有引起任何的衝突，而工人委員會也經常不加任何修改地接受城市委員會所編寫的小報。

在1898年年底和1899年年初，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各部分和各地區的革命宣傳鼓動工作，都進行得如火如荼。所有的工廠里都有我們的自己人，他們搜集情報，注意工人的情緒，揭露各種各樣的舞弊行為。工人們對某些工廠中充當門衛的徹爾克斯人特別感到不滿。徹爾克斯人是一個又愚昧又粗魯的民族，配備有鋒利的武器，有時配備射擊武器，他們準備野蠻地保護每一個工長、首長，尤其是廠長和副廠長；他們一有機會拿到武器，便準備向工人攻擊。他們在工作中也是這樣野蠻地執行命令；如果有誰跟工長吵架，工長就打電話把門口的哥薩克人請來，粗暴地嘲弄工人，命令徹爾克斯人把叛亂者或“酒鬼”帶到門外去，他們就立刻去執行。由於這種情況和徹爾克斯人的野蠻性格，工人們簡直是痛恨他們。就在這樣的基礎上不斷地發生了需要警察和縣政當局來干預的口角。

這一方面的鬥爭進行得最激烈的，是在德涅伯河彼岸，主要是在法俄公司車輛製造廠的一個工廠里。這個工廠從開始生產起，就成為最多事最革命的工廠；那里由於對行政

不滿，經常發生罷工。徹爾克斯人就成了全體工人的眼中釘。

早在1897年春天，當我和十二個人從下德涅伯羅夫斯克車站到這家工廠去的時候，親身受到了一次完全意料不到的接待。當我們走到工廠的時候，從廠里出來了一個好像當過多年門衛的徹爾克斯人。他分明是要到車站上去，然後從那里再到城里去。我們這一群人看見這個徹爾克斯人，便熱烈地談起想要揍他的事情。當然，我是仔細地傾聽他們的談話的，但我不讓工人們找機會真去揍他。當我們這群人走近這個徹爾克斯人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分散到鐵軌的兩旁，然而有一個工人，他一面責備其餘的人胆小，一面順着鐵軌的中間直向徹爾克斯人走去，他剛走近徹爾克斯人的時候，就給了他一記耳光。徹爾克斯人抓起了武器。就在這時候，許多沙子和石頭從鐵路的兩旁向他扔來。他像野貓一樣地向柵欄那里奔去，一會兒就不見了。當我們剛走近工廠大門的時候，大門口已經站着約摸二十來個人，從工廠里走出一個哥薩克軍隊的下士，他身後跟隨着那個挨過打的徹爾克斯人。於是，他們就在人叢中找尋肇事者。徹爾克斯人馬上就認出那個打過他的人，但那个人拒不承認打過他，而且不肯跟哥薩克下士一塊走；這時來了兩個証人，他們報了假造的姓名，於是事情到此就完結了。可是那個徹爾克斯人老是反復說，他會記住這件事情的，如果他自己不能報仇，他的孩子也會替他報仇。不消說，那個工人絲毫沒有進這家工廠工作的意思。

確切的日期仿佛是在1898年5月1日，要不然，就在前一天，我到這家工廠去看一個同志。我突然發覺工廠的院子里出了什麼事故。我在工廠的大門口打聽到，有人在兩

小时以前毆打了副厂长。当时在門口站崗的已不是徹尔克斯人，而是一个穿警察制服的門警。这件事情發生之后，他吓得心惊胆战，以致我走进工厂的时候，他也不敢拦阻我。我打工厂的院子朝总办公室走去，看見一群工人，人数在一百人左右，在他們的面前站着县警察局局长，正向工人們打着官腔。我觉得有趣，便向工人們中間挤去。警察局长向工人們講了很久的話，劝他們开始工作。有一个工人非常激动，尖銳地回敬了警察局长几句，所有的工人都支持他。警察局长毫無所获，溜进办公室里去了。

原来工人們在上工的时候，从各車間里聚集在一起，要求副厂长到他們那里去。副厂长到了他們那里，起初說了一些非常尖銳的話，后来看見自己被一群憤怒的工人包圍起来，便改变了口气。显然，他想仗着站在身旁的警察从工人們中間溜走。他的巧計沒有成功，因为这时候有人把一个袋子扔到他头上，立刻便有一个工人用一样硬东西狠狠地揍了他一下，使他蹲了下去。引起了一片紊乱，工人們在拉过汽笛后，都离开了工厂。有人把头上鮮血淋漓的副厂长抬进办公室，我也曾在这所办公室附近遇見過集会的工人。这件事情發生后，工人們有两天沒有上工，而且非常激动；开始进行必須釋放被捕者的談判。但是，当局在發生騷动时都躲进兵营里去，这事后来給工人們打听出来了。事情發生以后，星期六的工作縮短二小时。这样，就滿足了工人們在毆打副厂长前所提出的要求。

在德涅伯河彼岸，徹尔克斯人被赶走了，任何一家工厂里都看不見他們的影子，但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的布良斯克工厂里，徹尔克斯人依然存在，因此繼續引起工人們的憎恨。

有一个黄昏，附近一所炼鋼厂的工人们下班的时候，从布良斯克工厂的栅栏里拿走了一块木板；一个守衛的徹尔克斯人便去追赶工人，等他追到后，便想把木板夺回来。于是，發生了一場搏斗，工人们从四面八方跑到出事的地点。当然，那时本来能够着实地給这个徹尔克斯人來一頓教訓，然而另外一些徹尔克斯人从工厂里奔來援助这个徹尔克斯人，而且有一个徹尔克斯人用短刀杀死了一个工人。这事發生后，工人们非常憤怒，冲进布良斯克工厂，破坏并燒毀了徹尔克斯人的崗楼，毀坏了他們的财产，另外一部分人数更多的工人，拥进总办公室里，进行了許多破坏，并且力圖把錢柜打开。人們拿来了一把大鉄錘，終于用这把鉄錘打开了这个看来好像很小的錢柜，一部分金錢立刻就被拿走，丢到人群中去。这时，办公室由于四面着火燃燒起来，被燒得精光。

几乎和这同时，在凱达卡村(就是徹尔克斯人杀害工人的地点)，工人们搗毀了一家官办的酒店，喝光了店里所有的存酒，显然沒有遇到任何的阻碍就打开了錢柜。一部分喝醉了酒的非常激动的工人燒掉了办公室后，便冲向一家合作商店，他們也像搗毀酒鋪一样地搗毀这家商店，并且开始毀坏商品。另外一部分約有十三个人，跑到契契廖夫卡一家合作总店里，他們在那里遇到了步槍的射击，他們撞了几下商店的鉄門板后就退走了。这时有一批步兵从軍營里被召集到这里來。他們包圍住被搗毀了的小店，这样才使它免于被燒掉，虽然由于不使住在附近的工人受到損害，工人们反正也不会放火燒去这所商店。

当工人们搗毀总办公室的时候，有一部分工人想冲进大門，显然打算破坏工厂本身，但夜班工人阻止住了这一行

动；他們全都一窩蜂地拥到門口，担心会遭到痛打，所以都用鉄器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时候才赶来的警察局长訓斥了巡官一番，說他为什么不把工人們镇压下去；当巡官回答他說这样做是很危險的时候，警察局长为了想証明巡官胆小和自己勇敢起見，便挤到工人中間高声地嚷了几句，但是他所得到的回答，是头上立刻挨了一下石塊的痛击，被打倒在地下，人們只好把他抬回家。到早晨四点鐘的时候，騷动几乎完全平息了。在發生騷动之后，我們馬上向工人們散發傳单，說明这样的牺牲是不会得到什么結果的，号召他們正确地組織罢工。徹尔克斯人不久就被赶走了，工厂开始建筑鋼筋水泥的办公室。

一些工程师在审判时赶到法庭上来，工厂的整个行政当局几乎都力圖把事件的責任推到革命家的活动上和激起工人暴动的願望的那些傳单上，这就是这次事件的特征。然而，有一个工程师在法庭上表現很好，他說出了工厂活动中的許多内幕（虽然他是首长，当然也是个第一流的坏蛋）。这个工程师說傳单上老是写着計件工資不断下降，領導人員对工人的态度不好，以及其他各种舞弊的行为，这样，自然总是博得了工人們的同情。

当时罢工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但是規模并不大，而且大多数是在沒有厂矿監督人員干涉的情况下結束的，或者是慢慢滿足工人們的要求，或者是双方互相讓步。

在审判布良斯克工厂暴乱者的时期中，工人們都搶購“德涅伯罗夫斯克边区报”。但是這張报上的新聞很少，不能滿足工人們的要求，于是大家便經常談到必須出版一种能把事件的始末詳尽报导出来的傳单。

“報紙是沒有什么好看的，等一个时候，我們自己的报

紙一定很快就会出来，报上一定会狠狠地臭罵他們一頓，我們会在报上知道一切。不过時間过得相当久了，他們会不会發生什么事情？……”

从这些談話中可以听出，工人們对于傳单是抱着無限信任的态度，在这次事件之后，可以知道傳单会經常發生良好的作用。

有一件事情搞得很糟，这就是小組工作。我們不断地要求在小组里學習，可是，城里給我們的答复是，找不到人来主持这件事。我記得有一次在城里召开的會議上，我曾直接提出过这个問題，并且立刻相信参加會議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到小组里去：一部分是因为心理的原故，一部分是因为妇女，主要的是因为大多数人沒有說話的才能。在小组里要學習什么呢？“要知道，我們沒有書籍，”他們这样說。于是我們就預备課本，而且立刻开始行动起来。仿佛他們已开始写小册子。当然，写小册子是和委员会的工作有矛盾的，因为当时委员会里还有其他一些悬而未決的問題和要求。最后，眼看着不可能立刻找到願意参加小组的人，我們也只能滿足于人家所謂必須从速找到这样的人材的声明了。

不久以后，有人給我介紹了一个願意給工人上課的青年。我們見面时約定在星期日碰头，那天我應該把这位先生介紹給工人們認識，这些工人是他必須要給他們上課的。我带来了一位工人同志，他應該把这个願意跟工人們在一起學習的人直接带进屋子，和那些在屋子里等候他的同志見面。我讓这位同志站在一边，自己走到这个知識分子跟前，他当时就要求对他說明他在小组中的地位。原来他完全不願意对他实行任何監督，老是說些聳人听聞的話。只有在完全自治的基础上，他才同意在小组里教課。我提出了

自己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他所不能同意的。于是我们就永远分手了。我又不得不使那些聚集起来的工人们失望，尤其是因为我在那个星期天不能到那里去跟他们谈话。

在这一年(1898年)夏天，我为了我们合作商店的事情时常到下德涅伯罗夫斯克，因此看到了那里发生的运动。这种运动表现为频繁的暴动和冲突，情况与我上面所说的殴打布良斯克工厂副厂长的事件差不多。我靠那位老头子的帮助，认识了两个人，他们后来也成为下德涅伯罗夫斯克运动的领导人。起初我请他们搜集关于工人生活的各种资料。可是，他们并不特别喜欢写作，我就只好自己把本地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记载下来。这时我才相信从前(1895年和1896年)给予工人们的那种教育，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样的工人会把自己比作是惊弓之鸟。他们没有毅力、没有本领，而且又没有勇气，所以他们便在自己的工人同志中随便去发展任何一个人。他们丝毫不能传授给他们有用的东西。但他们仍然把自己一点蓬勃的精神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而我也有机会领教了这种蓬勃的精神。

在沒有完全放弃小铺以前，我继续到那里去，而且比以前去得更勤，所以我能够时常遇见这些人在研究找寻同志和散发小册子的工作……大概在秋天的时候，他们集合了很多人，要求给互助储金会制定一项章程，并且表示要更正确地领导运动。用非常革命的精神拟定了“互助储金会章程”，而且在某一个星期天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当我到那里的时候，在一间明亮的大房间——“大厅”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是我所认识的。必须等待其他的人。时间在随随便便的谈话中过去了，而大多数的人都拿眼睛看着我，一声也不响。当然，有人违背我的愿望，把

关于我的許多事情告訴了他們。除了两个人外，所有的听众都陸續到齐了。

“我認為會議可以宣布开始了，諸位，你們以为怎样？”我說道。

全体一致同意，因为最有威信的人都来到了，好像全体出席的人一共是十八个人。在提出章程以前，我当然談到了工人运动，談到了必須要有組織等等事情。后来我宣讀了向大会提出的章程，并且問章程是不是合适，大家能不能通过。我也談到了必須散發秘密書籍，总之一句話，就是要从事反政府的活动。大家都發言拥护通过章程。以后，就开始朗讀各項条款，并且詢問某一条是不是清楚，应不應該补充或加以說明。在向全体出席者征求过意見之后，每一項条款便認為是通过了。我特別担心其中这样的一条，那一条上說，任何一个成員在必要的时候，都有义务来散發公开的或秘密的書籍。其实，这一条款沒有遭到反对就通过了。接着，一切当然都按照它的次序进行下去。最后，讀完了并且通过了全部的章程。組織定名为“开端”，以后，就开始选举負責人，主要是选举委員。我作为一个外来人，不能肩負起任何复杂的責任，但是我仍旧接受監察的任务。現在，在一切的程序都进行完畢之后，一小部分人开始离开屋子，而大部分人則决定要給自己祝賀这个相当重要的組織。我謝絕参加这一庆祝，但不能打消这种款待的方法。

記得有一次，我为了工人运动的事情来找他們談話。我們七个人聚集在一所土屋里，我尽力發言，說了很久的話，不下两小时。大家全很注意地听我說，非常佩服我的知識。显然，他們都全神貫注地听着，但当我說完話，决定討論某些問題的时候，他們（听众們）却熬不住了，請求我原

諒，表示希望喝点酒。当然，他們大部分都是育子女的人，或者至少是接近这种年齡的人，我也很明白，我跟他們認識，也只有利用他們在啤酒鋪里喝酒的时间。所以必須时常扶助酩酊大醉的人。我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有一个这样的工人，有一次到某一区营工厂（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附近的地区）去看一个熟人。显然，他想进行宣傳工作，身边带了几本秘密小册子，但他就带着这几本小册子被捕了。当宪兵們从電話中知道了这个工人的住址时，在这所屋子里除了空啤酒瓶外什么也沒有搜到，所以立刻就把他釋放了。类似这样的事情还不止發生过一次。由于这样的情况，我并不特別主張戒酒，可是他們自己也覺得很难为情。我知道有一些人完全不喝伏特加，另外一些人則竭力戒酒。

当我开完全体大会回家的时候，天已經黑了。我为了要在充滿敌意的环境中（这个地方算是屬于我無权到那里去的另一个县份）求得安全起見，早有准备地拿着已写好的章程，以便一旦遇到什么情况就把它扔掉。但是，發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口袋里的这份章程丢失了；幸亏我写好章程以后还保存着底稿，因而沒有一个人会知道丢失章程的事情。当然，必須經常到下德涅伯罗夫斯克去拿需要的書籍。讀者們已經学会很好地保存这些东西，所以一切都很順利。有些工人被章程吓得离开了；但是，他們在一起工作时，仍然認得从前曾經一同工作过的人。應該努力和他們小心相处，互相提醒危險。这些工人大部分在法俄公司工厂中工作。因此这家工厂經常發生風潮，并且时常使行政方面陷入啼笑皆非的境地。駐厂檢查員必須經常到这里来給双方調解。他不止一次地保證工人代表不遭到解雇和逮捕。后来，他的保證为事实所証实了。

从1899年夏天开始，發生了开工不足的现象。那年冬天各工厂开始裁减工人；工人们發生騷动。当时在法俄公司工厂附近成立的一个特別組織进行鼓动工作，要求裁减职员，减低厂长和其他人員的薪資。这个組織不願理会那个特別使資本主义企業感到鼓舞的事实，要求工厂全部开工生产。我在当时不得不热烈地、匆促地和工人们进行多次的爭論，向他們証明不可能使这些要求得到滿足。他們照例拚命地攻击我，責备我同情資本家。然而，他們很了解我，仍旧时常跑来請我帮忙，給他們解釋各种各样的問題。委员会出版一种小报，它尽可能地出得及时。

在一个晴朗的傍晚（这是在1899年的秋天），我在工作完畢之后坐下来喝晚茶的时候，看見这家工厂的两个青年人匆匆忙忙跑进房里来，不禁觉得有几分驚訝。当然，我是十分了解这两个人的。他們說他們厂里决定要裁减很多人，人数超过半百；因此，他們选出了代表（我記不起代表的人数，好像是十三个人）来进行明天就要开始的談判。代表当中有我十分熟悉的同志。必須說，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感到几分滿意。要知道，談判是由傳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那些人来进行的，所有选出的代表几乎都是社会民主党员，他們会絕對証明工作不是沒有結果的，我們也开始以真正領導者的身份出現。不幸的是，工厂中的这一运动現在不是具有战斗运动的性質，而是具有防禦的性質。必須考慮到的，并不是我們获得胜利的問題，而是考慮到如何以較少的損失来退却，而同时又不做宪兵的牺牲品。有一个代表情緒非常激昂，他主張向政府要求定貨和貸款，要求不辭退工人，要求减低厂长和所有工长的薪資。

这两个青年人讀書不多，但是相信工人和社会主义的

力量。他們这种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必須讓这些青年人的头脑冷靜下来，必須說明在目前情況下不可能取得他們所要求的那种东西。当我做完这种工作之后，他們两人說明自己已被选为代表，到这里来听取指示；他們明天該怎样和厂长进行談判。当然，我的忠告早已准备好了，一部分还是小报上的指示：第一点要求不許解雇一个工人，第二点要求减少工作時間两小时；这样一来，縱然工資会减少，却没有一个人会遭到解雇。

厂方同意代表們所提出的条件。于是，工厂的工作時間不是十小时，而只是八小时了。为了想在工厂已有定貨这种假設的情况中利用这一点来竭力保持八小时工作日，我們拟定了几个相应的条件。这一情况果然發生了。而我当时已經离开那里，不知道結果如何；我只知道厂方后来从特維尔地方招来一些工人，而把他們認为不安份的本地人开革了。但是，工厂方面不久又得对这些安份守己的工人进行工作；当宪兵把我送到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去的时候，我就看見了大門和車間紧闭着的靜悄悄的工厂。由于南俄發生的总危机，它停止了自己的活动……

約摸在那个时候，我們和摩洛索夫談論創辦地方报纸的事情。有人供給我們一百卢布来出版第一期。当然，我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弄到鉛字。我們也开始找寻，而且很快就找到了；剩下來的，只是去拿鉛字和实际使用鉛字的問題。

显然，大概就在这时候产生了創辦南方总机关报的思想。我必須和一个知識分子談談这一件事情。我們不止一次地秘密聚会来討論这一問題。

我回头来談一談 1898 年年底和 1899 年年初的事情。

在这时期以前，由于警察严密监视，散发传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必须特别更加小心。开头那个时期，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散发传单总共只有三、四个人，现在散发者达到十二人至十三人，甚至更多的人。在人烟稠密的地方，有四个人在一条大街上走动（每边两个人），一个人空手走在前面，看见危险就发出信号，第二个人在后面跟着，他的口袋或手提包里装满了传单，从栅栏或大门里给每一户人家丢进一张传单；如果街上没有人，时间又很晚的话，他就走进屋子，把报纸扔到走廊里或者塞进百叶窗里，甚至警察想要找寻的话，也不是能够常常都找得到扔进去的东西的。当走在前面的那个人看见更夫的时候，就发出信号，后面的人便停止工作，从容不迫地继续沿预定的路继续走去。如果没有四个人，那末便是三个人，发信号的人走在街道中央，注意两边的事情。走完了一条街，就转到另一条街，又走到第三条街。有一个人负责给各区散发传单；他知道工作的地点和人员，事先决定好开始散发的时间。只要这个时间一到，带着传单的工人便马上拥到各区的街道上，开始工作；时间还没有到，许多人都已两手空空地回来，安安静静地躺下睡觉，只有在像卡伊达卡这样的大区，工作有时才需要超过两小时。

有一次，在进行这种工作的时候，我们一面在卡伊达卡大街上走着，一面散发传单。我稍稍落在其他同志的后头，当我看见一所房子以后，就上前去扔传单。这时，走在前面的同志们发现了一队巡逻队，他立刻通知我。可是我却继续干我的。士兵走到离我很近的时候，我假装出喝醉酒的样子，站住不动，呆呆地看着他们。等他们从我身旁走过，我就赶快往前走，又开始工作起来。同志们也上前请求兵士

們保護，好像害怕在街上走，而當他們得到一個令人放心的回答，說是前面沒有一個人的時候，他們便往前走去，繼續挨家挨戶地散發傳單。在這種比二年以前更加謹慎小心的情況下，沒有一個人走在街上或者工廠里散發傳單時落到警察的手里。這就使我們在散發傳單時養成幾乎毫不恐懼的習慣。這些傳單常常扔進軍營的窗子或是扔在軍營的附近；有時也把傳單帶到磚瓦廠里，把傳單塞在遮棚或是磚頭底下，這樣，工人們在收拾磚頭的時候，一定會發現它們。總之，沒有一處是這些傳單散發不到的地方。

我在上面已經提到過，通過同某些人的談判和打交道，我在某處發現有鉛字。當然，我對這種寶貴東西是很歡喜的，趕快把這件事情告訴摩洛索夫。經過短時間的考慮，我們就決定趕快從這些人手里把鉛字弄過來，否則他們很容易就會失蹤，而鉛字也會同他們一起失蹤。為了取得鉛字，我負責進行外交談判。擁有這種貴重物品的那些人，絕不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們把自己設想得太高了。其中有一個人和我搞得很熟。我很器重他的宣傳才能，但是對他好說空話這一點，却很不歡喜，我竭力不理會他。我在各個工業團體內享有威信。哪兒發生什麼不滿意的事情，他就常常來請我同他們聯繫，要我指出改正的方法。我為了謹慎起見，加以拒絕了。何況，我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忙。這些工作都需要我經常小心而又認真地去處理。那時他想鑽進我們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工廠委員會里來，但是沒有成功。後來，當別人為了這一目的而施加壓力的時候，他仍然沒能鑽進來。情況也逼迫我去和這個人談判。一開始談判，就和他衝突起來。他突然聲明，這些鉛字並不光是他們的，另外一些人也有份，而他們也想出傳單。這一個轉變是我預料

不到的。他們當真想出傳單的思想很使我吃驚，尤其他們在哪一方面都沒有具備出傳單的本領和力量；但是，他們暫時還能借各種口實不交出鉛字。必須使用外交手腕，必須和某些個人打打交道，但是事情並不順利。那個保藏着這種鉛字的人，認為鉛字是屬於他的。在談起出報的各種計劃時，我從他們那里探聽到，他們除了鉛字以外便一無所有。於是，我表示願意製造一架印刷機器，而且提出用他們的鉛字印刷一份傳單的一定條件。這就鼓舞了他們，欣然同意給予這種幫助。

現在，當鉛字已經找到、談判好轉的時候，當問題只剩下需要市委會幫助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市委會竟派代表來，希望我們不要同這些人達成什麼協議，聲稱他們正在某地找尋鉛字。市委會的代表說，他們對這類消息非常懷疑。

同時，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印出五月的傳單。這種傳單，我們希望無論如何要用鉛字印。市委會的代表說可以用膠印。我懷疑城里的同志已經捷足先登，企圖取得我現在正在談判的鉛字。我和摩洛哥索夫害怕城里的同志得到鉛字，感到會失去我們的靠山。當然，我們開始加緊努力，打算比城里的同志搶先一步。我不放過一分鐘有用的時間，在工廠里趕制一個放鉛字的架子。工長好幾次看見我在給自己做東西，但究竟做的是什麼，他却猜不到。其實，在這種緊張的關係中，他不願意惹起任何反對他的敵對行動。甚至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在擔心着一些更加壞的事情。不管怎麼樣，我总算把架子做好，接着就需要把架子拿出工廠。我請一個相熟的工長來做這件事。他很好地辦成了。當然，他不知道我干嗎要這些方木頭。我帶着做好的架子去看那個有鉛字的人，時間已經不多了，快到四月十八日了，

而傳單無論如何是要用鉛字印出來的。我們除掉希望放棄膠印以外，還希望向城里證明鉛印比膠印快，危險性更少。同時，即使馬馬虎虎地用鉛印印出的傳單，所花的錢也要比膠印少一半。當我取得同意可以去領取鉛字的時候，城里答應拿出它擁有的一切東西，並且保證在必要的時候給予幫助。在製造可以塗抹顏料的印色棒時，是必需要有助的。因為城里的同志現有的那根印色棒，看來太小。

四月十八日是復活節的第二天。因此，必須在復活節前準備好傳單，以便隨時應用。在復活節前的三個星期中，工人委員會在一次會議上作出決定，要所有的同志在下次會議前把傳單完全寫好交出來，當然也包括知識分子在內（根據那一條規則，所有的委員都要親自起草寫傳單，並在委員會的會議上決定哪一張傳單寫得比較好，比較合適，這對於我們所有的人都是有教益的）。我記得，過了一個星期，知識分子沒有根據那條原則把傳單交到工人委員會會議上。據他們說，黨將供給我們的城市一份很好的傳單。我們不相信這點，並且不放棄自己的目的。會議上收到了三份傳單，發現其中兩份很合用，於是決定把這兩份編成一份，並把編輯的工作交給兩個人去做，主要是交給摩洛哥索夫。雖然摩洛哥索夫自己也沒有寫好預定在五一節前完成的傳單。他反對這兩份公認的傳單，但他仍舊必須服從大多數人的意見來編輯傳單，編輯工作至遲須在兩天內完成。

離開復活節大約還有兩個星期，我必須催促同志們，到處東奔西跑。首先，必須動手拆鉛字。我們是在一個同志家裡（鉛字的主人家裡）來進行這件工作的。這是一個全城都認識的人，而且有不少人都知道他的手提箱裡放些什麼東西。如果一旦人家注意到他家裡有鉛字，這該是多麼不愉

快的事啊。時間很緊迫，特別是，沒有時間來從容考慮。拆除工作只要有一個較長的傍晚和黑夜就夠了。我們把拆下的鉛字包在一個小包裏，然后又把它放進一個連鎖都沒有的箱子里。我把經過委員們看過的編就的傳單帶到一間小屋里去發排。傳單在那里也要放三天左右的時間，然后把排好的鉛字牢牢地放進一個鐵框，这样就便于搬移。

就在这緊張的時期中，却接連發生了一連串的失敗。第一個失敗是有人放出有關我和摩洛哥夫的謠言，硬說我們想永久占用這些鉛字。謠言對於鉛字的主人，發生了有力的影響。他們堅決拒絕把鉛字借給我們用，為了逃避和我談判，他們常常不在家。这样我就很難找到這些人了。究竟是什麼人在這緊急的時刻輕易地拆了我們的台，就是後來我也沒法調查清楚。毫無疑問，这里面准是有人搞了鬼。與此同時，我必須用一些材料鑄造印色棒。尽管我東奔西跑，還是找不到一個很準確的圓形容器。找尋工作完全失敗之後，我最後買來了兩個盛電池的罐子。這兩個罐子在工作上不听使喚，而且不到規定時間就破了。鑄造印色棒的材料是用上等的普通細木工膠和蜜糖調成的。這種材料很久都沒法調成功，把它們注進容器後，不能凝固……我去看一個同志（委員會的委員），請他使用各種方法來旋制一個圓管。雖然做這工作會很容易被工廠里的嚴厲的領導人撞見。第二天，這個同志假裝願意留下來做夜工。深夜，他趁頭子不在的時候，趕緊在機床上干起活來。過了兩個多小時，一個滾筒做成了。它旋得很好，有着一個小小的錐體；只剩下把它帶出工廠的問題了。那個同志想了一會，便向柵欄那邊走去。過了一會兒，圓筒就帶到了廠外。第二天清早，他就把它帶到我的家里來了。快近十二點鐘的

时候，我带着它到阿摩尔（德涅伯河彼岸的村鎮）摩洛哥夫家去。他家的爐台上放着盛有胶和糖蜜的各种容器，地板上放着带有鑄成的印色棒的容器，到处都是乱七八糟和違反王法的标记。这里也有用来制造印色棒的把柄和鋼軸，它們都是第三个委員在第三个工厂里制成的。

那天是星期六，大約还剩下一周的时间，必須抓紧時間，尽可能努力工作。我当时失業，所以能够用全部時間来做这件事。但是摩洛哥夫和其他的同志們都必須在复活节前赶工，而夜間还得同样緊張地忙着編印五一节傳单。我那天夜里做好印色棒后才回家。我希望摩洛哥夫明天就会干这件工作，并且好像就在那里事先安排好了复活节前的最后一次會議。

就在那热火朝天的一周的星期一，我去买了三令紙回家，到了晚上就把紙張带到那所指定作为印刷用的房子里。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出去买面鏡子，找了很久，最后才找到一面大小和厚度都合用的鏡子。我記得我和商人講了很久的价錢，希望尽可能买得便宜一些。經過很久的討价还价以后，我买了一面不带框的鏡子。这样，好像节省了一个卢布。我又多买了一張放顏料用的白洋鉄皮，然后回到家里。只剩下去取已排好的鉛字。我为此目的走到那所指定的房子。我們曾在这所房子里把鉛字按大小分开，并且用它們来排过字。显然，鉛字的主人声称，只有当他們能够在場的条件下，才允許借他們房子印刷。这点当然是不能答应的。我知道他們不願意把鉛字給我們，与其用外交手腕，还不如用各种諾言来影响他們，特別需要依靠對他們所作的諾言。經過長時間的荒謬的談判之后，才說服了他們，以后不但拿走了已排好的、拼好版的鉛字，而且还把全部剩下的鉛

字和仪器都拿走。三个人一起来拿一个人难于拿得动的东西。为了不致特别引起别人的注意，大伙都上我家里去。在夜闌人靜的时候来进行印刷和校正清样的試驗。我的房东們就住在隔壁。他們倒沒有怀疑这种带着洋鉄皮的嘩啦嘩啦的响声和印色棒滾过鉛字的沙沙声的活計，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勾当。

結果，試驗完全成功，我对于我們取得的成就很满意，并且打發自己的助手們回家去。当时已是深夜，我知道女房东就睡在隔壁，一旦她發生怀疑，就会把我的情况报告給警察局。我为了担心特务的追踪，小心翼翼地悄悄把所有的东西都收到床底下和箱子里，提心吊胆地睡了一会觉，惟恐会受到突然的襲击。第二天，天剛黑，我就和同志們把所有的鉛字和物件都收拾妥当，然后扛到一处秘密的住所去，也就是再回到那个当委員的同志家里，在那里就可以完全自由地安排一切了。剩下的就是取印色棒和顏料。这些东西也从摩洛哥索夫那里拿来了。經過多次的失敗，終于制成了两根很好的印色棒，而且已經不用担心它們不能滿足全部工作的需要了，因为鑄造它已經不困难了。

記得好像是在星期三，我在女房东的幫助下，一清早起就开始工作。我事先用布蒙住所有的窗子，把門鎖上。当然，工作进行得并不很快，但是畢竟还是有所进展。很快繩子上都挂滿了印好的傳单。一瞧見这些傳单心里就乐了，一看見工作有进展心里就觉得踏实。晚上，一个同志下班后跑来了，接着又来了一位，工作整夜都在緊張地进行。我們一面快活地工作，开着玩笑，一面仔細地观察着和研究着，看看我們的机器里到底缺少什么。原来，旧鉛字印出来的傳单，还不能使我們滿意；有些东西是可以改进的，不过，

暫時缺少時間和資金。尤其缺少資金，因為從城里只領到十個盧布的資金，用在整個工作和一切開支上。必須拿這些資金來周轉，還要買鏡子和紙張。

星期四那天，我一個人和女房東繼續工作，四點鐘的時候，同志們都紛紛聚齊了，連摩洛哥索夫也來了。於是，我便把吃力的活交給他們去做。這個工作就是拿用亞麻布毛巾包着的木頭印色棒在排好的鉛字上滾一遍。印色棒本身很輕，每次必須使勁壓，用整個身子壓下去。如果配合工作的速度這樣做，是非常累的。工作是這麼進行的：一個人塗顏料，壓印色棒；另一個人放紙、拿紙；第三個人把印好的傳單分開晾起來，把晾干的傳單收起來；第四個人是休息或疊傳單。在那個緊張的星期五的夜里，我們完成了印刷工作，大伙一齊動手把傳單疊成三角形，由一個人在上面加蓋委員會的圖章。這些天來一直非常勞累的主婦，刮去桌上和地板上的顏料痕迹，把房間洗刷干淨。印色棒拆掉了，并把印刷材料埋在地里。總之，一切都整理妥當了。一旦憲兵來突襲，也不要緊，房裡一切可疑的東西都收拾干淨了。

接着，大家給各區分配傳單的數量。傳單很快被分成二百張一扎、三百張一扎和四百張一扎，總共有三千張。然後，各人拿走規定的一捆傳單，到自己的區里去。此外，還需要把一部分傳單分送到各地去，同時需要商量好電報的問題。總共有十個區。摩洛哥索夫當時住在阿摩爾。他應當帶走三百張傳單去分發。為此，我們答應給他派幾名助手。

他拿了這些傳單，到一個熟人家里去，傍晚才離開那里。當天晚上，我就得到摩洛哥索夫在車站上被捕的消息。因此，必須趕緊把鉛字歸還原主，把預定發給幾個區的傳單收拾起來。這些工作都妥貼地辦妥了。

現在發生一個問題：摩洛索夫向宪兵供出了什麼，宪兵會採取什麼行動，會不會到處布下羅網，等着逮捕散發傳單的人。問題很棘手，但是大家討論時仍然決定不放棄工作，決定在星期六深夜散發傳單（從十一點半鐘開始），以便讓人們在復活節早上起來就能夠看到五月傳單。同時，大家決定在散發傳單時特別小心。一切都平安無事地過去了，任何地方都沒有被人破獲。夜里回家，我在离家不遠的地方碰到了巡邏兵。從他們安靜的神氣上看，我深信他們什麼也不知道，而當時我們幾乎在每一戶人家的院子里都散發了傳單。造成宪兵隊事先毫不知情的原因何在呢？

據摩洛索夫自己說，他對宪兵的口供是：他們發現的傳單是他從一個陌生人手中得來的。這個人請求在星期六把這些傳單帶到鐵路橋梁附近的森林里去。森林邊上將舉行一個會議，決定如何處理這些傳單的問題。宪兵隊長（他在彼得堡辦過摩洛索夫的案子）居然相信摩洛索夫的話，一清早就派出便衣宪兵和警察，他自己也改了裝，去捕捉他們要捕的社會主義者。過了很久，並沒有發現什麼地方開會，也沒有發現一個開會的人。宪兵隊長怕有人看出他，改裝了好幾次，但这也無濟于事，結果並沒有抓到革命活動的線索。然而，天已經漸漸接近黃昏，最後完全黑下來了，坐在橋下不僅是件令人厭煩的事，而且也是一件愚蠢的、令人發笑的事。他在那里一直凝神地監視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家，他對這些社會主義者很不滿意，很生氣。可是，就在這天晚上，整個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城，它的各區、各個角落和偏僻小巷中都有人散發了從來沒有這麼多的傳單。這種傳單正和前天在摩洛索夫那里見到的一樣。狂怒的宪兵隊長把摩洛索夫從監牢里提出來，摩洛索夫一走進辦公室，他就嚷道：

“你欺……欺……騙了人，畜生……”

“怎么？我什么时候欺騙过人？”……摩洛索夫忍着笑問道。

“昨天是誰說的要开会？难道不是你嗎？！”

“我怎么能知道开不开会？”

“就沒有开会！我昨天在桥下坐了一整夜，換了三次装，可是一个騙子也沒有看見。这一切都是你胡謔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的會議当时又延了期……”

“怎么又会在整个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發現傳单呢？”

受了騙的宪兵決定去搜尋印刷傳单的印刷所，但他不去叶加特林諾斯拉夫，而到特維尔去搜尋。因为，他以前曾下令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搜查过，甚至逮捕过一些人，但印刷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傳单的印刷所还是沒有找到。第二天，当鉛字的主人到我的住所来找他的宝物时也扑了个空，他們也沒有找到鉛字。秘密工作之所以能秘密，完全是因为每个做印刷工作的人，都忠于事業，坐过长时期的牢，受过鍛炼。最有趣的是：到住所来搜查摩洛索夫时，虽然那里放着装印刷材料和胶水的全部瓦罐，还放着許多違禁品，但除了紙張外，什么也沒有查到。为了不让宪兵怀疑摩洛索夫那里还藏着准备散發的傳单，只好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的各地减少散發的数目，把减下来的数目發到阿摩尔去，这件工作做得很成功。我們結束發行五月傳单的工作以后，便离开印刷所。我們取得了很好的經驗。这种經驗对于我們每个人來說，当然都是有用的。但在摩洛索夫意外地被捕以后，工作終究做得少了。每月都有同志退出工人委员会。到了秋天，老同志中只有一人留在委员会里，而且他已經傾心于当时工作做得很有成績的城市委员会了。可是，

我們还是坚持着保存工人委员会的原則，竭力不讓工人委员会瓦解而損害正当的运动。我們决不願意牺牲某个委员会而有利于另一个委员会。

修理厂鉄路上發生的工潮，我記得不很清楚了。但我記得事情的經過好像是这样的。6月25日就要到来，这是紀念为开辟鉄路奠定基础的尼古拉第一的节日。在这一年以前，工人們这一天只消工作到下午两点或正午十二点，就算一天的工作日了。这一次，工厂管理处却决定所謂“顧全一下血本”。工厂管理处希望工人在十二点以后去祈禱，一点半就回来工作，一直工作到下午六点。当然，如果管理处願意放假，讓大家过这个节日的話，就不該提祈禱，或是就地在工厂內安排一下祈禱就行了（这也許就会很自然地讓大家去过节），而不應該用命令的口吻要求工人到教堂去，——要是这样的話，也許工人还会願意做一天。工人喜欢过沙皇的节日，完全是因为这天可以休假。如果过节要强迫工人占用休息時間而不占用規定的工作時間到教堂去为沙皇祈禱的話，那就会引起每个工人喋喋不休地冒罵，罵得沙皇及其僕从的尸体都会在棺材里翻身。这次騷动發生在1899年6月25日。24日将近傍晚的时候，貼出一張通告，上面說：明日应从上午六点半工作到晚上，休息時間去吃中飯，十二点以后全体工人应到教堂去做感恩祈禱。這張通告貼出后，工人們就發出怨言：这可不行。這張通告引起了工人無比的憤怒；通知工人全天工作，中午还要去为死去的沙皇祈禱，这是几乎每个工人都不願意干的事。难道我們就傻到这种程度，竟然默默無言地放过这个机会嗎？

一个在該工厂工作的同志24日晚上回家时跑来找我。但是，沒有碰見我，他就同另一个同志赶快用复写紙写傳单。

写了将近二十份，署名是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工人委员会（这是一个很有威信的署名，曾在工人中间起过很好的作用）。第二天早上，他们把这些写得不太明确的、为数很少的传单分发到两个工厂去。传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每个工厂的工人把传单传阅到完全破烂为止（后来委员会连一份都没有留下来）。传单要求在正午十二点下工后不到教堂去，大家回家吃中饭，午后不再上工。大多数工人完全同意传单提出的要求，只有少数几个人到教堂去。同志们随时都在警惕。不久，大门上出现了用粉笔写的严厉的告白：谁敢在午后上工，他将因他的行动而后悔。接着，又对胆敢擦去大门上的告白的人作了严厉的警告。下午一点钟左右，有一群工人（大约五十人）聚集在大门附近，但是告白不让大家进去；守门人看见聚集了这么多的人，不敢执行考勤员和宪兵的命令，也不敢擦去大门上写的告白……这时，有人发出讽刺性的叫喊声，大家的情绪都是赞成那个告白的，虽然有几个挑衅者站在那里不断地向群众煽动，许多人还是赞扬大门上写的告白。最后一次的上工汽笛响了，但是大门还是紧闭着。最后，来了一个宪兵军官把大门打开，愿意上工的人还是很少；虽然有几个人进了大门，但他们总觉得这样做不大好，幸亏宪兵军官很快地帮助他们，把人群驱散到街上去。工厂的大门一直关闭到第二天。一年内铁路工厂像这样没有工人工作的日子是少有的。以前，星期六、星期日或其他的盛大节日，总是有工人做加班的活，而现在整个工厂没有一个工人，这令人多么痛快啊！委员会收到的关于情绪的情报是：人们感觉到有点特别；大家都期待着第二天。

第二天，工潮继续扩大，大家只是假意地继续工作。大多数工作台、车床……车厢和机车都停在厂里。谁也不愿意

老老实实地动手工作。不久，貼出了一份通告：6月25日不發全日工資，只發半日工資。这样一来，就完全失去了繼續工作的任何可能性，起初是一部分工人，后来全体工人都丢下工作跑回家了。委员会又發出大量傳单；警察和宪兵沒有办法，終于使用了祖巴托夫的方法。虽然复了工，但整整一个星期工潮都沒有平息下来，好像还会繼續到下一个星期。这时，警察和宪兵繼續監視不大安心工作的工人，把他們的姓名記下来。最后，工潮开始平息，一切都預示着平靜無事，但是这种平靜的空气又被宪兵破坏了。有一天下晚班后，各个車間的工人朝着出厂的大門匆忙地走去。一部分工人剛剛走到大門口，迎面跑来一个手持出鞘軍刀的軍官大声喊道：“站住！”工人们惊慌起来，一些带槍的兵把工人包圍住；當場鑽出几个警察署长来划分工人；警察署长的記事本上有名有姓的工人被划分在一边，由士兵包圍住；另一部分工人放出了大門。他們在大門那里还看見一个带槍的兵得意洋洋地在喊口令“向左轉！”“向右轉！”等等。宪警們不讓走出工厂的工人停留在大門附近，把他們远远地赶开。铁路附近到处聚集着一群一群的工人，他們等待着押解被捕的工人到監獄或另外的地方去。当时也許会發生流血的冲突，因为他們想劫夺被捕的工人。宪兵为了避免劫夺，繼續裝模作样，擋住站在工厂大門附近的工人，同时催促被士兵包圍的工人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仍用包圍的办法把他們押解着通过城市到監獄去。过了大約一个鐘头，工人们才知道自己同志的命运。大家感到完全絕望了，每个工人都無比地憤恨，但又怎么办呢？工人们集合起来，走到電車街拐角的小廣場上。有人用石头向一所房屋的窗框擲去，玻璃被打碎了。人群本来准备破坏这所住着自己工

人和一部分犹太人的房屋，幸好人群中的一个委员会的委员，立刻制止他们这样做，大声地告诉大家：这所房屋住的是“你们的工人弟兄”。人群同意了这位叫嚷着的同志的话，离开这所房屋回身走去。迎面来了一位犹太小伙子。看样子，他好像完全相信人群中不会有人打他。但是，看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危险威胁着他，这时又跑出一位同志嚷道：不要碰他；同时这位同志向大家解释：这人并無恶意，警察压迫他，比这时压迫群众还要厉害。

犹太小伙子说：“你们做什么？你们赶快去从敌人，从宪警那里救出你们的弟兄，你们的同志已被押解到监狱里去了，你们应该到那里去救他们。”

人群又叫喊着向监狱走去，沿途都有知道人群行进方向的警察跟随着。当人群到达监狱时，军队已在监狱门口排队准备回去，被捕的工人已被关进监狱了。这时，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被捕了，因为另外一群人派他去做一件工作。这次没有同军队发生特别的冲突，四面八方集合来的警察努力驱散聚集在一起的工人。

此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工人们还是很愤怒，但不久就开始释放被捕的工人了；两个星期后，几乎全部被捕的工人都毫无结果地被释放了。在铁路修理厂工作的同志又散发传单，但是没有被发觉；因此我们也没有遭到迫害。只有一个委员退出了委员会，这是由于他自己糊涂，在困难的时刻不能坚持不渝地承担自己的任务。当时参加在人群中的其他委员仍顺利地继续工作。此后，似乎又安静下来。

夏天来了，我们便在各地的户外举行委员会的会议。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天，我们在市中心德聶伯河岸边的木材库附近举行会议。大家聚合后，就觉得坐在来往行人经过

的大庭广众之間，同时还常常使用鉛筆和本子，是很不方便的。在堆木板和圓木之間又找不到一个幽靜的地方，于是我們就爬上一只空的平底船。在船上發現一間便于利用的房間，我們就在这个房間內討論工作，最后順利地結束了會議。第二次我們又到近郊的一只小船上去开会；第三次又到另一个地方去。我們就是这样每个星期天都順利地不断举行會議和商討問題。常常单独地提出鉛印傳單的問題來討論，因为在印發五月傳單以后又不得不利用膠印器了。这是由于城市方面拒絕用另外的方式印傳單，同时也由于缺乏做这一件工作的房屋。我同一个同志積極地去找寻过。在远离城区的河边的灌木林中找到了一个可以做印刷工作的地方。可是，城市方面又不能同意給我們鉛字，而鉛字城內是有的。不仅我們修理厂的工人，就是最普通的工人也不滿意用膠印器印刷的傳單。关于这一点，下列事实可以証明：在一个工厂里（鋼管厂），工人們看了傳單以后，談話中都对印刷表示不滿。他們募集了十个卢布和一些戈比，請求轉交去改进印刷工作，而且只限于改进印刷工作。

铁路上發生的工潮还没有平息，馬里烏波利爆發的騷动又引起了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的工人的注意。大家都在談論这件事。那里傳来的情报激动了每个工人，但可惜有很长一个时期不能得到一点可靠的情报。自己的人虽然被捕，然而对于叶加特林諾斯拉夫还是需要散發傳單，对馬里烏波利更加需要。最后，終于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散發的傳單滿足了工人的要求。特別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如果只在某个地方常常出現傳單，就能使这些傳單及时地發生效果，能使它們更詳尽地談論所發生的現象，既不夸大，也不縮小。如果能使工人信任傳單，那么在罢工或發生工潮时，他們就

願意同意傳單上所談的一切，這也就是把運動引向預定目標的杠桿。

起初，當直接參加宣傳鼓動的人數還不多的時候，個人很容易保密；但是在參加運動的工人的人數擴大以後，個人的失密立刻就會被發現。可是，在個人失密的情況下，憲兵是不大容易知道關於某人的詳細情況的，關於全盤工作知道得還更少。我常常碰到這樣的情況：有些缺乏遠見的老同志對他們的青年朋友常常談論我或另外的某人。因此，當你同這些青年朋友會見的時候就會發覺，雖然不認識他們，而他們卻認識你，——這真是令人不愉快的怪事。同時，有的人也沒有保密的習慣，如果是一個熱誠的、醉心於革命工作的人，他就敢表現出很勇敢的行为。例如，有一位青年同志在工作時間內對聚在一起的工人公開讀秘密小冊子。工長走到他跟前，從他手中奪去小冊子，他一点也不驚慌，只是為失去小冊子表示惋惜。當然，這件事會引起群眾的不愉快。工長是我們很熟悉的人，縱然是個壞蛋，由於大家都熟識，他也不敢作出危害我們的事。另外的一位同志在工廠里安置了一個對工人講話的講壇。這個廠的每個人几乎都是運動的同情者或參加者，僅僅因為這一點，他們當然就不會談起某些不謹慎的人的這類不檢點的行動。有人向我報道了這一切，我也不能出面反對這樣做，因為認識的人太多了，很少有時間去同這些急性子的人作長時間的談話。而他們對別的老同志，不是不聽從，就是干脆不理。因此，曾引起這些同志的某種不滿，後來還要在他們之間進行調解。

這時，在下德涅伯羅夫斯克，由一位工人發起成立了一個新的團體。這個團體一成立，就同委員會鬧對立。無論如何不願（主要是這位工人不願）作任何讓步。因此只好進

行斗争。当时曾同它谈判过，但毫无结果。这个团体也想自命为委员会，专对下德涅伯罗夫斯克的法俄工厂发传单。当时只好派人加入这个团体，在它的内部做工作，尽量使它不在工人中发生危害委员会的影响。同时，我们很担心这个团体的人会泄密，会因轻率的行动而遭到失败。这当然会拖累我们，所以这时的工作是很难做的。他们筹集到现款以后，就把这个团体命名为“黎明”。他们是工人，当然有足够的金钱来印发传单。他们一定要每天印发一次传单，或者是每星期印发一次，可是他们不重视印刷的方便问题，总不肯安装稍好一点的机器。当时，他们已经把钱浪费了一部分。

这时，我邀请他们团体的人来开会，而且一定要请他们的领导人出席，这位领导人每次碰到我时总是不愿理我。同时，如果我在工作上有一点成就，他总是背着我竭力加以破坏。他的这套把戏，几乎每次都能耍成功，因为我很少到下德涅伯罗夫斯克去。他仇视知识分子，根本不愿意见他们，这就大大影响了他同我们的合作。不知为什么，他也把我看成知识分子。他也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我只好不管他出不出席，仍然同“黎明”的其他成员进行会谈。我向他们指出：没有委员会是不能进行工作的；他们的工作做得粗心大意；他们浪费了花了很大的劲才筹集来的金钱。同时告诉他们，我们一定把我们的各种文献送给他们，仅仅发一种传单是不大好的。一部分成员直到散会，都无条件地站在我这一方面……我建议把他们的团体合并到委员会来，并答应当时就送给他们各种文献，派知识分子去领导工作，但他们决不能不得到委员会的同意就出版任何东西。会议达成了协议，圆满地解决了我提出的各个问题。此后，到那里

工作的知識分子在這方面不斷地起了作用，任何單獨行動都沒有了。這恰恰是在這個工廠縮減工作以前的事（上面已經談過），當時，在幾乎每天都同工廠管理處發生沖突的情況下，是需要有正確的領導的。

我曾回到合作小店待了一個時候。

三個月來，這個小店的主要發起人，其中也包括我在內，都很不注意這個小店了。正如我前面說過的，成立小店時資本就太少。以後，除了小老头增加了一點點資本，根本就沒有增加過資本。小老头不但不准在店裡取錢用，反而常常把自己多餘的工資投到這個事業上。他常常抱怨參加這個事業的人。他總是自己一個人去執行定購商品的一切義務。一有閑空，他不是到城裡去，就是待在店裡。顯然，他為這個小店很受累了，而且他的家庭情況好像也使他不安。我很明白，一個人只有在看到個人的工作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別人的時候，才能在我們的小店裡很好地工作。小老头的妻子常常待在店裡，因為她對恭順地執行丈夫的願望已經習慣了，而且僅僅是因為這一點。顯然，只要她知道這個小店的秘密，她就不會再努力工作了。我們也漸漸相信這個事業已經無法進行，只好把它看作是快完蛋的事業。

三個月後，我們又召集所有的人（五個人）來討論對我們如此重要的問題。當時提出了一個問題：歇業呢，還是繼續營業？無論是歇業或繼續營業都需要錢。當時的情況是這樣：需要付房租，如果歇業，就要付五十盧布的違約金，——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小店賒出了八十盧布的貨物，而這八十盧布是很難收回的（當時根本就不可能收回這筆欠款，因為工人們在別的小店也欠着債）；同時我們查明：有些商人賣的貨，價錢好像比我們的賤，有時甚至是賠本或

蝕本賣。這可真把我們的主事者，即我們的老板弄糊塗了，後來調查一下，才弄明原因。原來，他們表面上比我們賣得賤，可是份量不足，有時一普特甚至短少七磅。我們雖然發現了這是競爭的原因，但還是沒有什麼辦法，大多數買主既然看見旁邊小店的貨物比我們的賤，當然就不願意到我們店里來買了。他們毫不懷疑賤價的貨物實際上比貴的還要貴。這就使我們受到很大的損失，縱然拿到關市上去賣，也不能把我們從困難中挽救出來。因此，只好常常賒賣貨物，這就造成了這樣的情況：在領工資以前，我們的小店總是空空如也，沒有什麼貨物，要到領得工資時才有進款，去購買一點點貨物。總之，我們的小店時刻絆着我們的腳，常常有倒閉的危險。現在真是弄得進退兩難，但願能擺脫困難而又不丟面子。這時，小老头和他的朋友是小店最大的債主。因此，如果歇業，他們就要受很大的損失。簡單地介紹了情況以後，做出這樣一個結論：已不可能再在合作制條件下繼續營業，如果歇業，就得付出違約金，而且有收不回八十盧布欠款的危險。當時小店的貨物只值一百多盧布。怎麼辦呢？

隨便討論了以後，就建議小老头來頂這個小店，作為他的私有財產，條件是可以用公有本金來付頂費，這就等於用小店的期票來付頂費，但每月至少要付十個盧布。小老头好像不大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但他又沒有更好的出路，只好接受我們的條件。他預先聲明，讓他不要在頭兩、三個月付款。我們也同意了。因此，我們的合作小店就轉到私人手裡去。

以後，這件事對於熟悉小店主腦人物的我，還造成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小店建立在合作制基礎上，這當然是很多

人所說过的，但他們就不大知道小店的基础究竟怎样，而且事后很久才知道小店已經轉到私人手中，对它的業務已經不能再作任何監督了。小老头受到人們當面的指責，說他用公款开小店，这些公款是他用最卑鄙的手段攬为己有的。同时，因为他現在是工长（那时他当了工长），所以这种看法好像也能証明是对的。一个人当然会因人家对自己的这种态度而感到很难受，会因为受这种委屈而常常感到痛苦。我虽然尽量地向我認識的人說明他們的这种指責是不对的，但总是不能完全改变他們的这种看法。我同小老头的关系还是搞得不錯。有一天，我要求他把我認識的一个工人安插到工厂去。他滿足了我的要求，后来好像又后悔自己不該这样做。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新加入委员会的同志，自尊心很强，只听从我的意見，对其他人就不理睬，举止行动总是不能得到人們的好感。有人向我談过他的这一切。我遇見他时，对他的举止加以指責过。他終于还是同这个工厂的工长小老头發生了冲突。他謾罵工长，使小老头受到很大的凌辱，小老头也毫無办法，只好命人把他轟出去，后来又下令要在两个星期后开除他。为此，我只好去找小老头，說了一些好話，劝他收回成命。我坚持我的意見，要他不要开除这位同志，而他也坚持他的决定。我还清楚地記得，当时这位成了家的老人曾在比他年輕得多的我的面前哭过。他竭力向我說明不能再留下这位同志繼續工作的理由。同时，他自己也覺得用这种办法对待工人是不大好的。这件事明显地証明，要想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了，他很快也相信了这一点。他常常向我报告工长們同厂长开秘密會議的情况，以及他們在会上討論了些什么問題，等等。总之，小老头还是像我初見他时那样。但这也是我和他最

后一次的見面了。那时，他已經把合作小店應該付給我的余款付清。我在离开他时，看出他对我的态度，对共同事業的态度，他在两年內始終是一位完全正直的人。我也看見他落泪，看見他憂慮不安以及其他一些不坚强的表現。多花費点時間同他去談談，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好处，以便将来能成为一个善于应付环境的小心的人。可是，那时天气太热，任何一点空闲時間都是寶貴的，而且我需要的是比小老头更坚强的人，能够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人。因此，我还是保持着友好关系和他告別了；有时还挂念他。不久以后發生的減低工資的事件，使他很伤脑筋，甚至他的朋友都不滿意他，加之，我認識的一个人又沒有被开除，当然，不滿的情緒就更加增长了。有一次，我需要同我早就很了解的这个工厂的一个人會見。虽然他是工长的朋友，但在會見(在大街上)时他还是談了大家不满意工长的情况，并且問我如何对待工长的意見。我認为：如果工长是一位暗中支持抗議的自己人，那倒是不錯；如果工长虽然是自己人，却力圖压制抗議，稍不得已时就向厂方讓步，同时作为自己人还引起自己人的不滿（倒不是引起仇恨），这样的工长对于运动就比直接的敌人更为有害。因此，我建議召集五、六个人来开一次私人會議，邀請工长参加这次秘密會議，在會議上善意地請他不要再做工长。后来我知道，他果然不当工长了，而且还坐过三个月的监牢。关于小老头的情况，我就談到这里……

这年冬天，我們的委員会有了一些改革，老同志中只有一个人留下来，其余的人都是新加入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委員會的。

从1899年秋天起，需要加快出版新报纸。关于这一

切，我个人是知道的，但是不知道要在哪里印刷，虽然我認為可以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本城印刷；我也不知道所要出版的报纸的名称。因为这一切是严格保密的。我记得，当时曾开了一次城市委员会的会议，在会议上念了几篇诗文，一篇是关于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工人运动的文章，后来念的是一篇诗“暴君，你去發怒吧！”。这两篇东西都采用了。会上还討論了派代表参加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問題，这只是預先介紹一下情况，至于如何选举，还要看以后的情况怎样再作决定。因为这是1899年年底的事。

如果根据这一年多的情况来看，很可以看出1898年和1899年的运动已經普遍地發展了。工人群众已經相当爱看傳单，开始要求看更重要的文献，而且也要求在技术方面作更好的安排。大家已經不乐意看用胶印器印得不好的傳单了。对工作也开始提出批評。当然，如果工作不是这么秘密地进行，那就会好做一些。当时只好抛弃旧的印刷方法，考虑新的方法。大家大体上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当时的傳单已經陈旧，必須再出版自己需要的印刷品。必需出版一个内容比以前所有的傳单更为丰富的报纸，——每个人都这样说。

1900年1月，盼望很久的“南方工人报”终于出版了。曾把新出的报纸拿到工人委员会的会议上念了一部分。为庆祝新出的报纸举行了一次小宴会；大家当场約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推銷报纸。自然，每个工人都特別感兴趣地拿到一份报纸。他們也像看傳单时所养成的习惯那样，决不願意把它交給警察或工长。

布良斯克工厂的軋鋼工人得到了一份报纸，上面的目次使他們很惊奇，目次是：

“看，这才是真正的报纸！上面有新闻，也有通讯！”

他们立刻把这份报纸拿到幽静的地方去看。第一次出版的这个报纸曾长久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提高了他们的情绪。因为他们能看到：尽管捕人，可是革命活动并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巧妙，更有力量。

应该说，工人们在这两年多内已经受到传单的培养，在这个时期内群众中没有人被捕过，这当然是很好的。群众已经看惯这种事件，所以一旦有人突然被捕，群众中也不会发生那种常常在各地可以看到的惊慌行动。可是，如果领导人中间有人被捕，情形当然就糟糕了，这会使活动暂时停止，这是无论如何，也就是通常说的“要竭尽全力”不能让它发生的事，而且还不能表示出你或你的事业因某种原因所遭到的困难。

早在初冬时，我就觉得我已受到特别的监视，因此我非常小心。这时，宪兵没有对我作任何袭击，他们还是让我自由行动，这是宪兵队长后来很后悔的事。我只好每天等待着新的袭击。我也预料到这种袭击是会招致恶果的，但还是无法动身，不过我已算定了我还要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待下来的日数。期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行前捆扎行装时连房东都不知道，捆好后，我出去雇了一辆马车。当时只有房东知道我出门。她准确地推测了我的去向，而且在我走后，立刻就到警察局去，报告我上哪儿去了。为此，我很感激她，因而把这些也写在书中。

列车沿着尼古拉铁路疾驶，快到彼得堡了。我很快又可以看到我所熟悉的街道，又可以看到我的熟人。我衣服的侧袋里，装着一张货真价实的公民证，我拿着它可以大胆地到任何地方去。

They were the good old days, when I had
myself a good time - much to enjoy, many good
times, a good night. One, when I was 19, at
Oxford - a time when I was to receive a
degree in law, and I was to receive a
degree in law.

And I was to receive a degree in law, and I was
to receive a degree in law, and I was to receive
a degree in law, and I was to receive a degree
in law, and I was to receive a degree in law.

And I was to receive a degree in law, and I was
to receive a degree in law, and I was to receive
a degree in law, and I was to receive a degree
in law, and I was to receive a degree in law.

巴布石金所写的“回忆录”的一段手稿
一九〇二年写于伦敦

我的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的回忆录就写到这里。你如果想在其中找到关于系統地談群众情緒和广泛地从心理学上来分析群众情緒的东西,那就会徒劳無益。我竭力想写的,不是这方面的东西,要写这方面的东西,就得完全用另外一种叙述方式。

我把这本关于彼得堡和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的回忆录交给“火星报”档案室去全权处理,只要該室同意就可以采用,但一部分要得到我的同意。

我可以答应写一本关于俄国中部的回忆录續集,但是不在这里写。



附 录

巴布石金1901年發表在“火星报”上的通訊

奧列霍沃-祖耶沃（尼科爾斯克鎮）。在敘述薩維·摩洛索夫的病院情況以前，我認為有必要先談幾句話來說明一下當地的情況。我們奧列霍沃-祖耶沃的工人，很願意通過工人的報紙“火星報”，把我們這裡有時發生的駭人聽聞的情況，介紹給我們本地的工人、其他城市的工人以及別種行業的工人們知道。用不着說，任何一個有覺悟的工人，都非常關心工人的問題，也有很多人雖然自己不是工人，但是對這些問題也十分關懷，同情工人階級的运动……儘管臭名昭彰的神甫同資本家以及俄國政府的官吏狼狽為奸，用他們的各種狡猾的詭辯使我們處在愚昧無知的境地，但是工人們還是看到自己的可憐的奴隸地位。

尼科爾斯克鎮上有兩個廠主，一個叫維庫爾，另一個叫薩維·摩洛索夫。在他們那裡工作的，大約有二萬五千人，而奧列霍沃的居民，總共才四萬人，他們散居在九平方俄里的面積上。人口數量雖然這麼密集，但是工人运动却非常靜寂和消沉。這種消沉現象主要是由於精神飢餓而引起的。同首都或其他大城市不一樣，我們這裡買不到書籍，而大城市的工人也絕足不上我們這裡來。因此我們根本就不了解各地的情況。我們又無法自己去了解，一方面既缺乏勇氣，

另一方面又缺少这方面的知識。我們的处境和我們的物質情況大抵就是这样。我們絲毫沒有加以夸大，这完全符合事实。

我們这里有两所医院，一所是維庫尔的，另一所是薩維·摩洛索夫的。我打算尽力談談薩維·摩洛索夫給工人办的医院。这所医院座落在一所鑄鉄厂（專門替上述两家工厂包工）和工人住宅（宿舍）的附近。对工人住宅說来，这是个凶恶的去处，而对病人說来，尤其險恶。摩洛索夫以相当的代价，把医院交給一位“名医”——巴席萊維契大夫。巴席萊維契大夫对待病人，活像个屠夫。他决不自白替人治病，他能巧妙地扒掉病得奄奄一息的工人的身上的皮。茶和糖，病人是享受不到的，只給他們白开水喝，就連白开水，也仅仅供应到傍晚六点鐘。給他們吃的东西，非常簡陋，份量很少。晚飯，給他們吃些酸湯，或者諸如此类的其他薄粥。病人都餓坏了。只有有朋友送吃食的人，才能不空着肚子。由于病人都吃不飽飯，巴席萊維契大夫从禁止別人把东西送到医院里来。因而病人家屬就带来了酸菜、青魚、面包、葛瓦斯^①，总之，样样都有。一鍋食物一次能够供几个（四、五个）病人吃。病人的內衣脏極了，經常可以在床单和枕套上發現令人十分怀疑的斑漬。有一个工人談起他訪問这所医院时說：有一次，我上医院去看病人。我走到我的朋友跟前，發現他旁边还躺着一个病人。这是一个青年人，他身上穿着一件肮脏的长衬衣，一条醜陋的短褲衩和两只顏色不同的袜子（一只是白色的，另一只是紅色的）。这个病人是腿上有病。我講話的时候，这个青年的眼睛老

① 一种飲料。——譯者

是貪婪而又狼狽地盯著我，最后他終於說道：行行好事，給我一塊面包吃吃吧，我快要餓死了，沒有人來看我。

醫院里的治療也是惹人氣憤的，他們光用清水和一些廉價的藥面。巴席萊維契本人很少替病人看病。他雇了兩個大夫，自己只是監督發藥。

這里還有一個產科。這個產科對待產婦的冷漠無情的態度，特別受人注目，它只在產前兩天才接受孕婦，理由是她們來早了，要多付飯食費。那年十月發生了一件十分氣人的事：助產士回絕了一個產婦，把她打發走了，產婦離開醫院沒多遠，就在半路上生產了。

同志們，像你們所看見的，我們在薩維·摩洛索夫醫院里的地位，是很不愉快的。我們的健康和我們的精力都變成了摩洛索夫之流的百萬富翁的錢財。摩洛索夫越過越有錢，而我們為了糊口，不得不苟延殘喘地生活下去。可是，我們要是落到殘廢院里，又將怎樣呢？在下一封信里，我們還會看到我們可以料想得到的事。

(1901年5月，第4期“火星報”)

* * *

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方面報導了許多關於一些小工廠鬧風潮的情況。這些風潮表明，危機所引起的嚴重的貧困，以及各地社會民主黨人所領導的鼓動工作並不是無影無蹤地就这么過去的。

過了復活節，舒勃柯夫紡織廠借口調皮搗蛋，開除了十二個工人。這十二個工人要求廠方按照例規發給兩個星期的工資，而且一定要達到目的。照例，駐廠檢查員不但不支持工人們的合法要求，還企圖利用叱責和謾罵來吓唬他們。工人們的堅持精神，迫使這個“法律的守衛者”履行自

己的义务，工人威胁地要控告他。

德米特里·布林工厂的工人们，粉碎了厂主剥夺他们休假过5月8日圣约翰节日的阴谋。这家工厂过去逢到这一天，一直是放假的。同时，那兒的女工也想提高工资，但是沒有成功。

6月4日那天，A·И·迦莱林工厂的全体工人都跑去找駐厂检查員，要求他撤換工人討厭的記工員。这个要求提得相当强硬，以致駐厂检查員只好劝告他的上級接受这个要求，而且終于实行了。

卡拉施尼柯夫鑄鉄厂(有二百个工人)实行减薪，把工人的工资减低了一半。5月15日那天，鑄工和厂方之間的紧张局面尖銳到了極点。七十个鑄工拿了月薪以后，申明他們不願意按厂方提出的条件續签雇佣合同，要求按照旧条件簽約。旧条件是半年一期(現在是一月一期)，而且工资按冬季的标准計算。厂方拒絕了工人的要求，揚言要雇佣別的城市工人来替換他們。鑄工們都齐心一致地不肯按原来的条件續签雇佣合同，跑去找駐厂检查員，要求他从中調解。检查員借口老板有权变更雇佣制度和工资制度，拒絕工人的請求，毫不干預这件事。

厂方开始在舒雅和莫斯科两地招募工人。莫斯科方面应募的工人有十个。雇佣他們的时候，瞞着他們，不讓他們知道：雇佣他們，是要叫他們去代替罢工的工人。厂方答应他們可以得到优厚的工资，每月可以拿到75—80个卢布，甚至还要多些。可是，莫斯科人一到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便看出招募他們来，是干什么的。他們向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人說明，他們是被騙来的，要是事先知道这兒鬧風潮，他們决不会来。“打这时候起，伊万諾沃人和莫斯科

人彼此徹底團結起來。而且，莫斯科人馬上就去找駐廠檢查員，責怪廠方不該把他們騙來。這時候，廠老板害怕事情弄糟，便把一個不好對付的鑄工先送回莫斯科去了。”

在舒雅雇好的鑄工，聽到這兒鬧工潮，便不肯來了。於是，卡拉施尼柯夫工廠便把一部分緊急訂單，交給舒雅的一家匿名的工廠去做。這家工廠的老板和卡拉施尼柯夫工廠的老板是親戚。卡拉施尼柯夫工廠的工人去找社會民主黨的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黨委會，要求他們去影響舒雅方面的工人。黨委會向這家匿名工廠的工人散發了傳單。傳單煽起了罷工，工人要求廠方不接受卡拉施尼柯夫工廠的訂單。廠方答應可以滿足這個要求，號召工人不要中斷工作，同時等待老板回來。老板回來以後，做工的工人得到伏特加酒的“犒賞”，而那些在老板回來以前沒有做工的工人遭到了罰款。

卡拉斯尼柯夫工廠的工潮，連續了一個多星期，最後還是廠方作了某些讓步才結束的——把工資提高到冬季的標準。莫斯科人都回去了，卡拉施尼柯夫工廠的鑄工們，替他們籌集了盤纏。通訊員這麼寫道：“老板的奔忙，結果是給自己的工人介紹了莫斯科人，因而替他們效了勞，並且告訴他們說，本地工人的經濟要求比別的城市工人低得多。”

當然，所有這些反抗的現象，不可能不引起沙皇的走卒的干預。有人寫信告訴我們說：“警察最近特別敏感，監視着工人，5月1日那天，到處都是警察。”5月17日到5月18日的夜里，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天空響起了憲兵的警笛聲。十九個工人在這次警笛聲中被捕了。我們好容易才弄清下列幾個被捕者的姓名：Г. 里雅賓、Н. 哥洛霍夫、別洛夫、柯洛廖夫、菲里勃夫、柴洛夫、巴林諾夫、鮑格拉派夫、摩

克羅耶夫、沃羅畢堯夫、索柯洛夫、迦拉紋。被捕者一部分關在當地的監獄里，有的關在各個工廠的看押所里。許多人都到監獄里去審問。他們釘住三個被捕者不放。地方警察局長和憲兵隊長親自過問案件。他們的工作，做得很不高明，常常逮捕一些目不識丁的人。使人感到興趣的是，我們後來弄明，在動手逮人以前，巴林諾夫曾被人叫去見警察局長。警察局長動員他給憲兵當狗腿子。巴林諾夫說，大伙都認識他，會很快把他活埋掉，因此他不肯干。警察局長答應給他兩三支手槍，叫他不必要怕。然而，這點還是不能打動巴林諾夫。過了兩天，憲兵隊長又把巴林諾夫請去了，答應比警察局長多給五個盧布（警察局長曾經答應給他十五個盧布），要求巴林諾夫供出首腦們。巴林諾夫又拒絕了。這才把他逮捕，而且毫不含糊地懷疑巴林諾夫就是首腦。

我們無從知道，巴林諾夫對他沒有拿十五個盧布是否感到惋惜，然而我們確信地方警察局長和憲兵隊長一定感到很遺憾，因為他們準備出十五個盧布，都沒有弄清一個首腦。

大家都要求謹防迦萊林工廠的事務員柯雷契甫（皮膚黝黑、駝背、話音低沉）。過去，有一次他被捕後，把他知道的事全都說了，以致很多人被捕了。

舒雅城來信，談到巴甫洛夫紡織廠（約有三千個工人）的令人氣憤的情況。這家工廠的老板和他的幾個兒子，都是色鬼。其中有一個兒子，淫亂得到了發瘋的地步。現在，他的精神已經不正常，染上了花柳病。鑒於這種情況，一個姑娘置身在這裡，要很安全地逃避掉這些恬不知恥的俄羅斯資本主義的代表和國家政府的官吏的凌辱，是非常困

难的。这里的老板雇佣着一些特别女工，专门替他们引誘年青的花姑娘。巴甫洛夫把他的厂变成了他的一座特殊的宫闈。那些职员也仿效老板和他的卑鄙无耻的儿子，胡搞一气……工厂里空着很多机床，上面都蒙着草席，原因是老板害怕鬧工潮，不敢把男子汉雇到自己的厂里来，而女人又由于体力太弱，不能在这些机床上工作。

任何一个男工和女工的心里，都对巴甫洛夫工厂里的情形感到憤恨。

* * *

从同一个城市来的消息說，我們城里不久前搜捕过人。逮捕是在深更半夜里进行的。现在，宪兵队长那里存着很多案件。不用說，別的城市里也在捕人，因为他们发现了秘密出版的書报。而我們这里逮人的原因是，他们发现已經檢閱过的書刊里有問題，哪怕一本、两本，都是这样。宪兵队长在审判中总是問道：

“你为什么要买这本书？”

“买了看的。”

“你干嗎偏要买这种書，而不买别的書啊？”要不就問：“你为什么只看書，而不自己写呢？”或者問：你为什么不像他——舒雅城的宪兵队长那样过荒淫无耻的生活呢？他、宪兵队长总是和厂老板巴甫洛夫醉得像脏猪似的，然后他们就这么当众接吻，同时把他们俩共有的感情流露在他们的两对使人感到奇怪的眼神上。逢到这种时候，巴甫洛夫总是囑咐某个鴛婆子（他在自己的厂里养了好几个这样的鴛婆子）去安排一个姑娘，而她把这件事做得就像烤个小鷄似的。俄国資本主义的代表和宪兵当局的代表，都干这种勾当。他们千方百计地要使群众处在愚昧無知的境地。因

而，工人决不挾着書本在城里走，为的是不讓警察看見撕掉它。他們一看見書就問：“这是什么書？”这种情况常常發生在閱覽室的附近。

有一次，資本家巴甫洛夫、政府官員、宪兵队长和俄国神甫——凶手叶甫拉庇出門，动身到离舒雅很远的地方去，目的是暴飲一頓。他們真是喝醉了（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人和他們伙在一起），开始胡鬧一通，險些打起架来。后来，他們全都強迫叶甫拉庇穿着肥大的僧衣跳舞。然而，喝醉的神甫叶甫拉庇很倔强，說什麼也不肯跳。于是，怒气冲冲的朋友們便把这个酩酊大醉的神甫擡了出来。神甫徒步走了九俄里，回舒雅城去（路上差点滾到河沟里），派出去的馬車花了很大的勁，才在第十俄里的里程上赶上这个倔强的神甫，把他送回家。

奧列霍沃-祖耶沃方面有人写信告訴我們說：3月19日，尼科尔斯克鎮又逮捕人了。洛达柯夫被捕了（几天后，又被放了出來）。織布工人伊凡諾夫、清扫工阿卡馮諾夫的家都遭到搜查，据說索尔則夫的家也被搜查了。这一次突襲的根源，据我們后来查明，是奸細尼特金（真名：德米特里耶夫）干的。这个德米特里耶夫大約是在八个月前被維庫尔-摩洛索夫工厂的新厂长斯柯畢萊夫帶进去的。他在斯柯畢萊夫的指示下进行活动，从他那里領取各种費用的款項。德米特里耶夫-尼特金住在工房里的工人中間。他的特征是，現年三十三岁，身量比中等身材略高，体格結实，額角寬大，眼睛灰黑，嗓音温和，說話时額部起皺，神色愀郁。

（1901年7月第6期“火星报”）

博戈罗德斯科（莫斯科省）的一个工人写信告訴我們說：

当然，俄国拥有若干工人城市，像：聖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基輔、哈尔科夫等。工人在那里过着有文化的生活；社会主义思想在那里也能找到通往工人住宅去的大路、街道和胡同。那里有很多有觉悟的工人，他們正在从事自己的日益增强的事業。那里有知識分子在推动着这个运动……然而，俄国还有一些工人城市，社会主义思想直接通到那里是非常困难的，那里的文化生活被活生生地使劲捏死了。那里，工人过着沒有絲毫文化娱乐的生活，他們只能用老板卖给他們的燒酒（現在由官家专卖）来消遣，或者請工人中間擅长彈琴和舞蹈的人来作乐一番。这种地方活像一个小小的死水塘，水面上滿布着水草，而且水草一直伸到塘底下，淤积着粘泥，而粘泥又接住抛到死水塘里来的一切东西。格罗霍夫紡織厂（在博戈罗德斯科附近），就可以算在这个范围之內。这里几乎沒有文化生活。文化生活只要一产生，就很难立足。这里缺乏知識分子（假定我要在这里用“知識分子”这个詞彙的話，也只能指一些官吏和另外一些沒有教养的知識分子，一批阿諛拍馬的小人，所謂“心腹”）。有教养的工人是很鮮見的。有教养的工人在这里受到一点压迫，就离开这里了。而被監視的人也不可能到这儿来，因此这里什么書籍都沒有，無論合法的書也好，違禁的書也罷。如果，大城市有个工人到这里来，打算进行宣傳的話，立刻就会受到厂方的注意。厂方处理事情，比軍事法庭还快；立刻查明，就把他远远地赶出工人宿舍。我們現在想在这里談談这些工人宿舍。

我們的厂主扎哈尔·莫洛叔甫拥有一个男子（独身的）

劳动組合——大約有八百人，还有一个女子劳动組合，都为它們建立了宿舍。另外，他还有专为有家屬的人盖的宿舍。男子劳动組合占着整整一座三層楼房。尽管房子里設有取暖和通風的裝置，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善工人的情况。工人住得非常挤，就是在兵营里、医院里、监牢里也决不会这么挤……床鋪有两俄尺^①寬，当中拦着一塊高高的木板，作为每个工人的界綫；每張床上放着两个垫褥，或者两条鼓鼓的被服。总而言之，每一部分都得住上一百多口子。床和床之間的距离是一俄尺，床头前放一張小桌子，上面有两个抽屜，桌主把自己的衣服、糖、茶叶放在里面。所有的人都沒有箱子。凳子、椅子或者长凳，簡直就沒有，只能坐在床上。要是工人全都聚齐了，那么每一个角落就会有四个人。那时候，講話要不让隔壁的人听见，根本就办不到。

住工人宿舍虽然算是不花钱，但是每一个卢布工資里却被扣去两个戈比，带家眷的人則被扣去三个戈比。

宿舍里的厕所的位置，放得很不是地方，都在主要的住房附近。楼下飯堂的紧旁边，就是厕所。厂方竭力不去打扫它。由此可以想像到，这个邻居对飯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899年工人們要求在工人宿舍里得到比較寬敞一些的住处。厂方同意了，并且挂出一塊牌子，說明每一个人应得多少立方公尺的空間（一俄丈^②）。厂方在执行这一决定时，迅速从工人中間开除了六十个所謂“不滿”分子，而且在这以后又破坏了牌子上規定的标准。

家屬宿舍是由若干小房子組成的。每幢小房子里住四

① 一俄尺合 0.71 公尺。——譯者

② 一俄丈合 2.13 公尺。——譯者

戶或五戶人家，約十三到十五個人。家屬宿舍里很不衛生，廠方強迫工人自己出錢買牆壁紙裱糊。在亞歷山大宿舍里，一座三層樓高的房子造成五層樓。這幢房子的第一層樓有一半以上的高度是在地平綫底下，而五層樓簡直是個擱樓。這一年7月，廠方着手修理這些宿舍。工作做得非常巧妙，巧得以致二層樓塌下來，壓在樓底下睡覺的人的身上，同時連帶把上面的人也給翻下來。我看見一個娘兒抱着吃奶的孩子好不容易才從這個戲棚底下爬出來；一個男人也抱着血淋淋的腦袋從另一個地方躡出來。無法再看下去了，得趕快到廠里去。

宿舍里的伙食壞透了，一個在大城市里住過的、要不就是在廠里安家的人，甚至憤慨地上厨房里去責問；往往，有人餓了，還是忍着，不肯去吃飯。可是，伙食費却相當貴……扎哈爾·莫洛叔甫在任何吃食上都要淨賺二成半或三成的利潤。在住房方面，莫洛叔甫從我們的每一個盧布的工資中扣二個戈比，因此每年光從男子勞動組合方面就能賺兩千三百盧布，他在伙食上的利潤，每人每月按一個盧布計算，一年是九千六百盧布。他一年光從男子勞動組合方面總共大約可以賺到一萬兩千盧布。1899年，當男子勞動組合的全體成員，對伙食表示不滿，要求改善，同時不在老板開設的商店里購買物品的时候，老板便對工人們嚷道：“我要毀掉這些房屋，讓你們自己找房去住。”

伙食是由兩個組長管理的；他們是過去被眾人選出來擔負這個職務的。他們現在還繼續做組長，雖然工人對他們很不滿意。不久前，有三個工人表示不滿，出來反對組長，但是他們立刻就被解雇了。

* * *

奧列霍沃-祖耶沃的工厂工人的住宅問題。人人都知道，各大城市里的工人的住宅問題，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問題。凡是工資高的地方，那里的住宅問題就会引起很多各种不幸的事件，引起無穷的苦难、疾病、愁悶和丑陋的生活。住宅越是宝贵，住房的每一平方俄尺的租金越高，住屋的設備也就越糟。这种情况对工人來說是非常殘酷的。房主除了在每一俄寸^①的地板面积上向工人榨取暴利以外，对工人的生活，既不給予任何方便，也不給予任何照顧。

我們鎮上的人口本来就增多了，而且現在还在迅速地繼續增加着。然而，鎮上过去就沒有过好房子，而目前也还没有。尽管每年都盖了很多新房子。但是，这些房子都盖得很匆忙，很馬虎，全都是用洋釘釘起来的。十四、五間屋子只装一个洋爐子取暖，或者装一个只值三个卢布的铁爐子，烟囱从这种爐子上延伸到所有的屋子里去。这样的火爐和烟囱决不能把屋子烤暖。屋子只有在夏天才是干燥的。冬天，衣服都因为屋子潮湿而霉坏，如果湿掉的話，好几个星期都不会干，住在里面的人也經常感到头痛……屋子都用最薄的薄板子做成的活隔扇拦截着。这种板子常常是用坏的大桶和坏的大抽屜做成的，手指头可以从板縫里塞到另一間屋子里去。好多地方的縫隙都很大。墙上糊壁紙的屋子很少，即便某个工人的屋子里糊着壁紙，也是他自己出錢买的和自己糊的。窗子的前面常常挂着窗帘。很多窗帘都能遮住屋子里的景况。当然，也会碰到一些比較体面的屋子。这畢竟是少見的。家家戶戶的主妇都沒有空余時間來料理家务，因为她們在工厂里做工的鐘点并不比她

① 每一俄寸合 4.445 公分。——譯者

們的丈夫少。屋子里的隔扇，哪兒都沒有做得和天花板一般齊，按照房主們的說法，這樣做，是為了衛生。據他們說，這樣，整幢房子的空氣都會一樣，每間屋子也能平均地分配到暖氣。根據上面所述的全部情況，可以肯定地說，在大約擁有好幾千居民的祖耶沃，決不可能找到一間可以容兩、三個人居住、講話又不會被別的房間里的人聽見的屋子。這種情況把某種組織活動和宣傳活動阻止得幾乎不可能進行。五、六個人決不能聚集在一間屋子里來進行有一定程序和一定規模的組織活動和宣傳活動。

房租逐年逐年地上漲，引起了工人的極度不滿。他們經常去找廠主，交涉房貼的問題。我們這裡的一個工廠的廠主發給男女工人每人一個半盧布的房貼，而另一個工廠卻發兩個盧布。這家廠主付兩個盧布的房貼，是由於工人堅持的結果，工人們在這上面達到了目的。當然，住在工人宿舍里的人，什麼房貼都拿不到。一個自己租房住的工人雖然可以得兩個盧布房貼，而妻子也可以得一個半盧布，但是他還要付出很多的租金。他們兩個人如果都在只付一個半盧布房貼的廠主那裡工作，那根本是不夠付房金的，原因是租金三個盧布的屋子是絕無僅有的，大多數都超過四個半盧布。因此，人人都想住工人宿舍，何況私人房子又離工廠太遠。

現在，我們再來談談住宅問題的另一方面。廠主們是怎麼對待這個問題的？他們是怎樣干預的？他們用什麼辦法來對付這個問題，而工人們又是怎樣看待工人宿舍的？大家都知道，很久以來，廠主們就把我們工人兄弟當作是某種半個人性的動物（直到現在，在承包基本建設的包工頭那裡還存在這種情況），像：粗木匠、泥瓦匠、砌橋匠、馬夫，以及

燒窑厂和鉄路上的掘土夫，等等。因此，厂主給工人們盖的房子都很簡陋、狹小，而且十分肮脏。奧列霍沃还有一些旧宿舍。这些旧宿舍和新宿舍比較起来，相形之下，显得很可怜。人住在里面很不舒服，但是厂主們还是不肯把它們拆掉，总是千方百計地把单身工人往里面塞。这些是最坏的宿舍，它們的結構，一半是磚瓦，一半是木头。現在有許多宿舍，是按照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上的最新成就建筑起来的。当然，厂主营造这些宿舍，是有他們的打算的。人人都知道，厂主要是不盖宿舍的話，房租就会一倍两倍地往上涨，而工人还要在上工的路上浪费很多時間（現在全部住在宿舍里的工人，至少有二万人光景）。房租一漲，而房貼也将随着增加。假定不住宿舍的工人的数目少去一万二千人到一万三千人，按每人發两个卢布計算，每星期为二万五千卢布，一年将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而这些錢，厂主是非付不可的。因此，厂主盖宿舍，可以长期地用不着付房貼。如果宿舍盖好后，能使用百把年的話，那就太好了，太合算了。

現在我們来看看模范宿舍里的情况。关于这些模范宿舍，可以这么說：它們对工人來說，已經相当好了（当然，我們也知道，它們对一个南方的或者彼得堡的工匠來說，不仅感到不舒服，而且还会起恶感）。模范宿舍里装着自来水管子，供应干淨的清水；屋子和走廊的牆上都粉刷得雪白；屋子里的窗戶很寬大，高达一俄丈以上；走廊和屋子里都装着暖气；任何时候都預备着充足的热水；床都是上好的木材做的，等等。这也就是說，在清潔衛生方面，仿佛一切都很好，似乎很关心滿足工人的某些要求。但是，蜜桶里要是掺进一勺柏油，就糟了，何况还不止一勺。第一，屋子的面积太

大(大約有三俄丈長,五俄尺寬,而且幾乎有兩俄丈高),它不是供一戶人家住,而是供三戶人家住。這三戶人家是這麼居住的:兩戶人家的床鋪放在屋子的兩邊,第三戶人家住在乡下人的高木床上。說真的,這種高木床是相當大的,人站在上面,頭不會碰到天花板。高木床成了懸空的屋子。下面的兩戶人家,各占半間屋子。這樣,宿舍就不止住千把人,而是住一萬多人。這種居住條件不斷地產生許多不便,引起許多不愉快的事。一間屋子裡的鄰居常常彼此吵鬧,甚至動手打架。常常發生這樣的事:某人家的一個人,手不乾淨(偷竊),以致弄得同住的人家很不高興。第二,廠主的狗腿子和警察的特務(有公開的和秘密的,憲兵的牒報員也住在这里)經常密切監視着宿舍裡的工人,而廠里的行政管理處也竭力事先給工人定好作息時間。因此,每一個人放工回來,只好蒙頭睡大覺,就連這點也有人監視。第三,他們還嚴禁工人三三兩兩地在走廊上、過道上、屋子里、廁所里聚會,並且禁止他們議論任何事情,居然連湊在一起小聲說幾句話都不許。他們不是借口公共安寧去挑剔工人,就是無端指責他們破壞公共秩序。第四,誰都不得高聲朗讀報紙和書籍,甚至不准在自己的屋里對不識字的鄰居讀書報。第五,禁止任何遊戲;甚至同住一個屋子里的人,譬如為了抽根香煙,也要向鄰居征求類似許可的什麼話。晚上禁止工人同宿舍內外的人來往和留宿。

儘管有這樣的迫害和警察的監視,人們還是願意待在這種房子里。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自租的房子的情況要比這裡壞得多,還要額外地多付錢。因此可以理解到,自租房子的人總是渴望着住宿舍,而且常常羨慕那些住宿舍的人……廠主們營造新的宿舍,破壞了祖耶沃地方的

房主們的一切主動精神（創舉）。他們中間誰都不敢蓋新房，害怕廠主們再蓋一、兩座新宿舍。那時候，成千成千的人都將搬到宿舍里去住，他們的房子便會空閑下來。這種恐懼心理強迫他們完全放棄蓋房的打算，要不，他們就得營建上面所說的那種房子。

奧列霍沃-祖耶沃人

(1901年9月10日第8期“火星報”)

奧列霍沃-祖耶沃。有人寫信告訴我們說：鑒于“火星報”最近在奧列霍沃-祖耶沃廣泛傳布，和我們無法從口頭上警告所有的同志，我們要求報紙載文叫同志們提防下列幾個人：M. 阿岡諾夫（助理工匠），矮個子、麻臉、厚嘴唇、臉上有幾顆痣、口齒伶俐、說話時唾沫四濺、三十五歲左右、頭髮淡黃，舊教的傳教士，替憲兵隊工作，同奧列霍沃的正教傳教士尼古拉耶夫過往甚密；И. С. 沙波夫，在工廠的食品店的肉食部當門房，膚色黝黑、目光凶惡、說話又低又快、中等身材；B. П. 馬佐林經常在工廠的廁所里夸夸其談地妄論社會主義和各種迫害，他打聽到什麼，便立刻把它說出來。這人比中等身材略矮，說話帶鼻音，身體孱弱。我們現在警告符拉其米爾和克略茲姆的人，德米特里·尼特金（見第6期“火星報”），現在已經在符拉其米爾當了警犬。我們這裡爭先恐後地閱讀“火星報”，不論來多少份，全都被別人閱讀着。“火星報”使工人們都感到運動的強力高漲。大家都紛紛議論第3期“火星報”上關於農民問題的文章，大家都想弄到這份報紙。在個別會議上，工人們希望“火星報”就這個問題再刊登幾篇文章。

關於聖彼得堡的工人和軍警的衝突，議論得很熱烈。

这些冲突只是整个运动的开端。如果说，这种冲突将来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奥列霍沃的工人现在就没有做错。但是，这种冲突将是极其残酷的，不应当赤手空拳地去对抗武装部队，“木棍和刺刀是同样的东西”。

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现在我们这里开始迫害所有衣着讲究、外貌聪明的工人。每一个厂主都暗中命令他们的管理人，要他们对待工人，只要从头到脚地仔细打量他们。如果有个工人衣着比较好，那就必须把他赶出工厂。因而，工人们便被迫穿起“瘪三”的衣服。他们很不愿意雇佣男工，但却乐意把工厂大门对女工敞开。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女工们还在忍着，没有吭声。博戈罗德斯克方面的扎哈尔·莫洛叔甫特别喜欢雇佣比较愚昧的梁赞人。

对工人的监视，日益加紧。有一家工厂的司閤不久前在厂门口搜查了一个上工人宿舍里来打算搜集某些情况的工人。这个司閤凭什么权利搜查这个工人呢？伊万诺沃的市长捷尔别辽夫在他自己开设的工厂里，利用加班的活计把工人折磨得疲惫不堪。这种加班活计有时候拖长到全夜。布雷林工厂在发工资的时候，千方百计地克扣工人的工资。

博戈罗德斯克。开设在博戈罗德斯克的格罗霍夫工厂，拥有一万三千名工人，是俄罗斯的最大工厂之一，被公认是一座“设备完善”的纺织厂，而在关怀工人方面也是受人赞誉的榜样。第8期“火星报”上的一篇通讯，向读者报导过博戈罗德斯克工人现实生活中的一面——住宅情况。我们现在根据该地的几个同志寄给我们的通讯，来谈谈格罗霍夫纺织厂的劳动条件。

那里的衛生情况很糟，而染布車間的衛生情况尤其糟。这个車間由于厂房盖得馬虎和修繕不当，干活很不安全：天花板快要崩塌，地板沒有釘牢，而且也不去整修它；地板的隙縫有寸把寬（这是故意做了当染水沟道用的）。这种沟道使窒息人的蒸气不断地从地板底下冒上来。通風設備很不够。牆上和天花板都长霉了。“到处都堆着妨碍人走路的垃圾。”——通訊員这样写道。

这一切情况并不是發生在什么偏僻的角落，而是發生在离开莫斯科几十俄里的莫斯科省。政府十分关怀莫斯科省的情况，竭力把它放在“加强保护”的地位上。正像大家所見到的那样，政府在保护而且是加强保护莫斯科省的时候，却忘掉了保护工人的生活和健康。

格罗霍夫紡織厂实行三班制，因此一个工人头天工作十二小时，第二天就工作六小时。紡紗工人在种种严厉的罰款、腐朽的陋規和捏造的情况下，每月平均挣十四到十八个卢布（由于我們的通訊員的报导，一个月以后，工人們开始罵街了）。其他工人（織布工）的工資也不超过二十八到三十个卢布。染布工一天挣四十五到五十五个戈比。

冬天（从10月1日起），紡紗工人的月薪落到了十二到十四个卢布，原因是棉花太坏（这时候，工人們常常被罰款到两个卢布）。雇佣期限将滿，各种罰款也激剧增多，任何事情都逼得很紧。“迟到五分鐘就得罰款二十戈比，而他們自己却把机車早开半小时，并且迟停二十分鐘。”

如果說，百万富翁扎哈尔·莫洛叔甫对他用强盜手段从工人身上榨取利潤这种勾当，毫不感到害臊的話，那他对待工人，就好像对待农奴一样。“我們的老板最喜欢用鞭子打人，到現在他还没有改掉这种强盜習性。”我們害怕在这

种“最喜欢”的感情下，扎哈尔·莫洛叔甫在工人毆打他以前不肯改掉他的这种“習性”。老实說，我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到如今工人还不动手打，从前农奴就曾經用打的办法强迫他們的折磨者——地主改掉这种“最喜欢”的感情。7月18日，莫洛叔甫碰到了四个从城里回来的工人；一个工人的口袋里突出一瓶“官卖酒”。工人正要到浴室去。可是，貴族軍人莫洛叔甫像头老鹰似的猛扑过去，用鞭子把其中一个工人打倒在地上，同时破口嚷道：“难道你們要老板跟着不成？你們把錢都花在城里，而不肯在我这里花”，然后他把这四个工人交給門警。总之，扎哈尔·莫洛叔甫先生的工人，都有义务把全部工資“花”在他的商店里，如果違背这个义务，就有被捕的危險。駐厂的檢查机构会知道这些嗎？难道它已經預料到格罗霍夫的工人有一天会搗掉莫洛叔甫的商店嗎？如果这种“家长式”的秩序終究会产生家长式的后果，像許多地方發生过的那样，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不过，我們还想繼續談談莫洛叔甫先生的粗暴的打人行为。“莫洛叔甫常常在机車中間走动，靴筒子里插着鞭子，要是發現哪个紡紗工人在紗錠上落下一个綫头，就凶暴地用鞭子抽打他，罰他的錢，还不准他干活。”1899年，莫洛叔甫用鞭子抽打了一个紡紗工人。这个紡紗工人很聪明，上法院去把他告了一状。案子一連轉了三个法院，最后，莫洛叔甫深深地嘆了一口气說：“我如果能使一个好工人和自己打成一片，这要比我打这些官司强得多。”莫洛叔甫所豢养的几十个“巡查員”也常常打人。显然，这类“巡查員”的暴行过去在叶卡特林諾斯拉夫和伯爵里包彼耶尔的庄园里所激起的混乱，还没有迫使莫斯科的懦夫們考虑到，这种“維持

秩序”的办法会形成一种既伤人又害己的武器。

該厂的医院“簡直是在演丑劇，而不是替人治病”。可不是嗎！他們用酸菜湯喂病人，居然还用發酸的东西給病人吃！

通訊員談到工人的情況時說道：“他們並不是胆小鬼，特別是青年人，但是糟糕的是，任何人都是单独地出來提抗議，要求得到厂方有时根本不肯發給他的工資。”

“我們那里也有圖書館。当然，也想去閱讀一些比較有趣的东西。有人跑去借書，看看書架，然后从一个什么地方抽出一本童話，但是决不能明白說出，他喜欢這本書。这里甚至連杜斯妥耶夫斯基^①的書都沒有，至于什么謝尔貢諾夫^②和彼薩萊夫^③等人的書，那就更不必提了。有一次，有个工人問起达尔文^④的書，但是給他的答复，只是惊奇得張口結舌地望着他。这个圖書館出借的主要是一些竭力想把本來就已經愚昧的工人变成傻瓜的書籍。而宗教道德內容的書籍，青年們是不屑讀的。他們确切地意識到这些書籍的愚人和害人的意圖……在沒有办成秘密圖書館以前，還不可能滿足这些人的求知欲望。”

(1901年10月第9期“火星报”)

① Ф. М. 杜斯妥耶夫斯基，1821—1861年，杰出的俄国作家，“罪与罰”等小說的作者。——譯者

② Н. В. 謝尔貢諾夫，1824—1891年，俄国著名的政論家，社会活动家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譯者

③ Д. И. 彼薩萊夫，1840—1868年，杰出的俄国批評家，唯物主义的哲學家、革命民主主义者。——譯者

④ Ч. Р. 达尔文，1809—1882年，偉大的英国學者，进化論——达尔文主义的創始人。——譯者

“为捍衛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工人而斗争”^①

哪兒有这种道理？——
你們欺侮我們，
你們的这种行徑，
将要受到老天爷的严厉懲罰……

(一首工厂里的詩)

我們的工人兄弟在工厂里的处境，是异常艰巨的。他們必須忍受許多五花八門的压榨、勒索和威胁。到处都是

① 列宁第一个指出了巴布石金的文学天才，而且备加贊揚。巴布石金的这篇文章由 H. K. 克魯普斯卡娅 写在她的宣傳小册子“列宁是党刊的編輯者和組織者”中：

“……符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只想从工人方面得到通訊，他还打算叫工人替‘火星报’写文章。按照符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囑咐，我写信給巴布石金（我們和巴布石金很熟；巴布石金过去在星期日夜校我的那一組内念过書，同时参加符拉基米尔主持的那个政治学习小組）：‘我們对您有一个要求。您到圖書館里去借“俄国财富”杂志，从去年12月份借起。那上面有个叫达东諾夫的人，写了一篇粗暴的文章，評論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他竭力把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工人描繪成不懂得团结、沒有要求、沒有志向的人。席斯契林在那上面反駁了达东諾夫。达东諾夫又写了一篇更粗暴的文章，接着“俄国财富”便宣布中止进一步討論这个問題。您要仔細閱讀这些文章（如果必要，您可以买几份必需的“俄国财富”，由我們出錢），并就这个問題撰写論文或短文（我本来在信上建議您写“短文”，符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改为“論文或短文”——H.K.），您要尽可能收集很多事实材料。很需要刊登在“火星报”（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議或者登在“曙光报”上，他希望厚厚的科学杂志上能出現工人的論文）或者“曙光报”上，从一个熟悉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生活的工人立場上来反駁这些荒謬言論（伊里奇把“工人”这个词強調了三遍。——H.K.）’”这篇反駁文章，巴布石金写好了，集成一本小册子，作为1901年10月第9期“火星报”的副刊登了出来，标题是：“为捍衛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工人而斗争”，署名：“一个维护工人的工人”。——俄文版編者

形形色色的迫害，到处都是压榨和罰金，但是收入却是菲薄的，难道对我们的压迫还少嗎？尽管从工厂开门那天起，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甘心情愿地去忍受。我们奋身起来，反对上面所述的这些暴行，而且要在这一斗争中做胜利者。资本家一厂主恶毒地压榨我们，然而政府当局的迫害，还要厉害。形形色色的、披头散髮的神甫，千方百计地向我们灌输奴隶的服从思想，假仁假义地責备我们的酗酒和諸如此类的放蕩行为。当然，我们对这一切早就习惯了，而且很懂得它们的意义。至少可以用俄罗斯的一句諺語“狗叫”去形容它們。但是，当俄罗斯的一些报刊也出来反对我们工人的时候，我们还是很难过的。“公理到底在哪儿哩？”这好像等于說，不仅资本家和政府，就是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的机关杂志，像“俄国财富”，还有，至少达东諾夫先生，都不是我们的同情者。我们虽然不能一口咬定地这么說，但是我们有根据提出疑問。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記，而且牢牢地記住：“解放工人，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共产党宣言”）。

总之，“俄国财富”曾經登載过达东諾夫先生的一篇文章“俄国的曼徹斯特”（1900年12月）。达东諾夫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譴責我们酗酒，并且責怪我们对这类可以說十分重要的譴責置若罔聞，因此我们决不能再不加答理。当然，这种情况要是發生在几年前的話，我们是不可能去答理的，因为“俄国财富”那时也决不会接受工人的抗議，何况是像現在的这种說法。不过，那个时候也許已經过去了，而我們也在努力改好，少讓別人指責我們。

我們現在还記得星期日学校的一个女教师，对学生們的答复。有一次，談話涉及到“自由主义者”一詞。女教师

在解釋这个名詞的时候，竭力把自由主义者的个性提到相当的高度，而且从好的方面来闡述它。这里既有教育，也有人道，还有法制，更有充分的自由，以及“自由主义者”的个性所拥有的其他許多优良品質。我在別的一些学生那里听到这种数述的时候，立刻想起一張報紙說：自由主义者在國外常常（也可能是經常？）进行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在这以后，我很久都不能接受这种說法：所有优良的品質，都和我們这些想望幸福的人格格不入。这是順便說說的。

現在我們来努力回答达东諾夫先生提出的上述責难，尽可能辯明我們的行為。

达东諾夫先生說，“我們主要的花費，是衣着和伏特加酒。每年这两項，每項都得花三十到七十个卢布”，而“工人的这种花費是从一年的工資一百到两百个卢布中間支出的”。也就是說，一个一年收入一百卢布的工人，在衣着和伏特加酒上要花去六十个卢布。这等于說：这个工人一年內平均每月只要三卢布三十三个戈比，就能吃到肉、面包、茶叶，还能租賃房子，吸烟，洗澡，剃头，并且往乡下寄錢。啊呀，啊呀，达东諾夫先生，你說話太荒唐啦！

要是有一个工人每年真能花三十个卢布沽酒的話，那他就能用这些錢买五瓶伏特加酒。結果，达东諾夫先生却說，啃面包、嚼馬鈴薯、喝蕎麥粥的工人，一天喝一桶酒。因此，你們就譏笑我們，叫我們“酒鬼！”这是否过份呢？！一个工人即使每个星期天花掉一个卢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年得花掉五十二个卢布，而他还得吃飯，除了星期天以外，还有例假。的确，过年过节，倒是买很多酒，在伏特加上花去一大筆錢。逢到复活节和聖誕节，工人总是多喝两杯，但是由此就得出結論說，工人是酒鬼，那就眼光未免太短淺

了。应当記着，靠茶叶、面包、馬鈴薯活着的工人，要喝上一杯是并不那么容易的，尤其是当他們得不到机会去充份干卖力气的活計的时候……

达东諾夫先生硬說，酗酒成了一种風气。他是根据禁酒会的种种指責而作出这个結論的。当然，我們工人清楚得很，禁酒会里的許多人是些什么人，而且也知道在制造新風气的情况下，即当沙皇和神甫想当酒店老板、而部长維契当酒保的时候，他們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会是些什么人；只要提醒一下伯爵托尔斯泰从莫斯科禁酒会的荣誉會員中被除名，就足够說明問題了。讓那些有教养的先生們去寬恕我吧，——但是我不需要做一个断言这些有教养的先生决不会当上这些社团的头脑的先知。“火星报”打算尽速讓讀者了解一个正在加紧根除酗酒的禁酒会……完全正确，达东諾夫先生，不仅在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而且在彼得堡、莫斯科、南方，乃至全俄罗斯，都有“請客”的事。这是每一个有教养的工人必須与之斗争的坏事，然而我們不能同意：它是“工厂生活中的一件最可怕的坏事”，尽管別人只是因为一个新进厂的織布工人邀請十到十五个人吃飯，給他們沾上四分之一桶的酒，而可笑地認為他在用这种办法强迫他們酗酒。其实，他們不光在工作以后喝杯酒，还庆賀他的进厂。要曉得，这样的“請客”，工厂里不是每个星期都有的，一年至多碰上一回到三回。說老实话，“鬼并不像禁酒会和达东諾夫先生所画的那么可怕”。我們要提出几个疑問：为什么我們上面的“請客”就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風气的酗酒”，或者“是工厂生活中的一件最可怕的坏事”？而像文学家这类有教养的人在各种紀念会、宴会、庆祝会上喝的酒怎么也不会少于任何“請客”会上的人，試問，达东諾夫先生，

为什么这就不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風气的酗酒呢？”当大人先生們“举杯祝好”、接着“碰杯”、“回敬一杯”、然后再“为公爵干杯”，这样無休止地在各种“干杯、碰杯、敬酒”的情况下飲个不停的时候，达东諾夫先生，为什么，这就不算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風气的酗酒呢？”这就不算是有教养的上流階級的“生活中的一件最可怕的坏事嗎？”姑且拿部长西彼金来做例子，他为了消磨这个夏天，到处参加宴会，醉得比皮鞋匠（請允許我在同志們面前用这个字眼）还厉害，这完全是真事。工人們亲眼看見他“狼狽”地从摩洛哥索夫家里参加过酒宴走出来，說一句工人的粗魯的比喻，他簡直是“光着屁股”走的。达东諾夫先生，难道上面說的这些丑事，就不助长“普遍的群众性的酗酒嗎？”再說一遍，为什么我們的“請客”就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風气的酗酒”，而上面說的其他宴会就不是呢？我們知道这种原因，因此我們不能对这件事默不吭声。达东諾夫先生，分歧之点，完全在于：你們是有學問的人，尤其是形形色色的大人先生們和諸如此类的禁酒会會員們是在闊气的大飯店、俱樂部、公館和宮殿里喝酒的，而我們这些穷措大的喝酒地点，都是在后院子里和客棧里，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逢到夏天，在干癟的小草坪上喝酒，嚼着粗淡的下酒菜。談到酒量，我們是不能特別恭維自己的，因為我們那时面色蒼白而又体弱無力。你們沒有看見酒鬼西彼金先生嗎？他清醒的时候，看上去就活像个大銅鍋子，如果喝醉了的話，那他就更美啦（順便提一下，我們劝他还是少喝酒的好，免得像叶迦契琳娜时代的省长凱萊尔將軍那样被酒精燒死）。話要說回来，我們要是在后院子里喝酒的話，我們就不准你們說我們是酒鬼，而把別人称作禁酒会會員。你們看报的时候，也会看到，每一期上都登

載着干杯、碰杯、敬酒等字樣。文學家先生們一輩子手里都握着高腳杯，竭力心平氣和的，描寫高尚的酒宴。啊，文學家先生們，世上還有比這更可恥的事嗎？！這不由得使人要問：究竟禁酒會在哪兒呢？達東諾夫先生在哪兒呢？而他的眼力又表現在哪兒呢？他為什麼不肯說：“教育絲毫沒有提高”呢？他們究竟為什麼要閉口不說話呢？很簡單，他們害怕別人威脅他們，因此他對上面的酗酒只好諱莫如深。而對待工人就是另一碼事了。對待他們，什麼都可以說，因為工人是被人縛着的，因此干嗎不跑到他們跟前去唾他們兩口呢？於是五花八門的禁酒會就磨刀擦劍起來，而達東諾夫之流的人也跟着他們吶喊。

關於酗酒的事，可以不談了，但是同達東諾夫先生的公案，還沒有完。這就是看到幾個工人穿件把毛織的短褲的事。一個工人住在城里本來是乡下人打扮而現在買了件把城里衣服穿，就真值得大驚小怪嗎？難道達東諾夫先生就認為農民不需要城市服裝、老百姓只配永遠庄稼人打扮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這就等於承認希望在农村中保留簡陋的土舍。我在這種情況下不打算把嘲弄服裝的罪名放在達東諾夫先生的身上，而是要着重指出兩個假設中的一個好的假設。我們早就尊敬的普列哈諾夫談到工人（革命運動中的俄國工人）時說過，他們常常在服裝方面和知識分子不同，但是有好处（可惜，我現在手頭沒有這本書，不能引用這位可敬的作者的話）。總之，比起不愛惜衣服，還不如讓衣服穿得漂亮些。

老實說，我們這裡的住宅問題提得很不妥當，不僅我們居住的城市，而且全俄羅斯都有人起來頌揚它，甚至捍衛它。在很擠的屋子里住慣的工人，使得某些有教養的工人

很气憤。这些住慣挤屋子的人，竟然認為他們住的屋子比两、三个人住一間屋子还好。在这种情况下，他們習慣地說：住在工人宿舍里很快活，而待在两、三个人住的屋子里，就好像待在監牢里一样。这种环境的生活經過几十年也就習慣了，根深蒂固了，而剛从乡下出来的人除了指望往乡下寄两、三个卢布以外，起初什么都不想，因此他們还准备降低这些条件。群众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就忍受不住孤独，不可能立刻把它当作刑罰看待。米尔新^①先生在他的著名的作品“世界上被唾弃了的人”中，也描写了这种心理状态。在这个作品中，一个有教养的人忍受不住大牢房里的生活，而認為这是一种刑罰。这个人認為最好待在单人牢房里。但是，要是有一个愚昧無知的人（沒有文化的人）待在那里的話，单人牢房反而成了对他的懲罰，而大牢房才能使他高兴。在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任何一个有些文化的工人，都竭力想法单独一个人住。如果許多人都住工人宿舍里，大家就分居在单独的房間里，或者兩戶人家合住在一間屋子里，因而观察家达东諾夫先生就能够在那里的屋子里看到床鋪。

达东諾夫先生的眼力，的确令人惊奇。他决不是克雷洛夫^②寓言中看不見大象的主人公，絕不！达东諾夫先生一到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去拜訪工厂，就立刻注意到一塊凹地，什么样的凹地呢！——所有的工厂都在那里，你們瞧，达东諾夫先生就有这样的眼力……他把身子轉了一圈，發現了很多东西，因而隔了沒有一会工夫，他就回头往像風車翼子般的凹地走去，上上下下地走动。这里有厂

① 米尔新——俄罗斯詩人 П. Ф. 雅柯鮑維契 (1860—1911 年) 的笔名。——譯者

② И. А. 克雷洛夫 1769—1844 年，俄罗斯偉大的寓言家。——譯者

主、行政当局、全市的市面，等等。但是，我們不想談这些發現，只是來談我們工人的事。就这样，他回身沒多久，就立刻發現了“达到某种程度的風气的酗酒”，又一回身，就看到工人的睡覺情况，挤得好像阿斯特拉罕的罐頭魚似的，一个人的头竭力往另一个人的脚底下鑽。过了一会，他又回身看見工人（全体）都沒有絲毫讀書的願望和任何求知的希求。再一回身，他又看到：几个工人“合飲一瓶白酒”。再回身又發現：“警察局的督察破获了某一件案子”，留下了一件撕破的长襟衫。一回身，他又發現一座蕭条的剧院、輪圈舞和游蕩的观众，以及哪兒都沒有一本書。接着，他又回头看到离“俄国財富”很远的鐵路。虽然，达东諾夫先生的眼力很尖銳，然而单憑他一个人是發現不完的，而且也不可能把“俄国財富”的篇幅都登完。我們認為，他反映的情况不完全，要知道全部情况中还缺少我們有理由等待观察家达东諾夫先生說的几句话。真的，他会說：“毫無疑問，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工人，都是懶虫”。同时，在我們回过头去指控以前，說不定，达东諾夫先生还会补充一句說，我們“对于知識，根本就漠不关心”。

达东諾夫先生得到了席斯契林先生对他的文章的答复。席斯契林先生向观察家达东諾夫先生指出，他举的数字是錯誤的，这也就是說，他本来想“捉个猪崽子，但却牵了条大犍牛”。然而，我們却要說，他是常常犯錯誤的，即便在相反的情况下。譬如，他在談到讀者的人数時說：“讀者，年齡在20—30岁的，占23%。”我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打哪兒弄来的，不过这点对我們不怎么重要。显然这是从禁酒会的总结报告中摘来的，而禁酒会的总结报告恰好反映了达东諾夫先生所描写的那个时期。下面是按年齡分类的

讀者表：

年齡 15 岁以下的.....	159 人	
年齡 15—20 岁的.....	818 人	
年齡 20—25 岁的.....	240 人	16.41%
年齡 25—30 岁的.....	160 人	10.91%
年齡 30—40 岁的.....	54 人	——
年齡 40—50 岁的.....	27 人	——
年齡 50 岁以上的.....	8 人	——

原来，年齡 20—30 岁的讀者，不是 23%，而是 27%。

而且有很多讀者都不是工人，我們可以从下表中看到：

工厂工人.....	1155	
手工業者.....	108	
商人.....	27	
各种行業者.....	95	} 8%
無業者.....	81	

共計.....1466 个讀者

这个表也清楚地說明了誰是讀者。但是，我們如果把讀者的人数和書籍的卷数比較一下，就会明白許多人不是經常的讀者的原因了。

讀者人数.....	1466 人
書籍卷数.....	1496 卷
14 个月內借出書籍卷次.....	14211 卷次 (果戈里的著作 占第一位)

老实說，結果，工人只好閱讀黄色書籍，这并不是工人有这种口味，而是因为缺乏好書。如果达东諾夫先生打算責备农民吃鷄鴨而不吃面包的話，那么这种責备就和他責怪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工人的行为完全一样了。达东諾夫先生，您責罵工人对知識漠不关心，但是为了糾正工人这种对知識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您又做了些什么呢？什么

也沒有做！达东諾夫先生，您指責工人譏嘲地方自治机构和下級警官，但您又写过文章去說明它的优点嗎？什么也沒有写！要是有一个工人在乡下的教堂—教区办的学校里念書，他会知道地方自治机构的优点嗎？什么也不会知道！如果有人写了一本有关地方自治机构和論它的活动的通俗小册子，禁酒会和工厂的圖書館会出借这类小册子嗎？不！工人能从这类圖書館那里借到这本小册子嗎？不！工人們能从你所說的圖書館里借到很孚众望的作家所写的、知識分子能从中汲取知識的名著嗎？不！工人們从圖書館里借到的書籍，能使工人們得到真正的知識嗎？不！上述五个圖書館的書籍，能使多少有些教养的工人感到兴趣嗎？不！你們所写的較好的丛書(公开发行的)，工人們能弄到手嗎？不！这样的例子是举不完的；不，不，不，什么也沒有做，什么也沒有写，什么也不会知道，归根到底，反正是不，以及什么也不知道。就是再說十遍，还是毫無結果。但是，达东諾夫先生却肯定了这些。他的这种胡言乱語站得住脚嗎？难道你們就沒有千方百計地不讓工人到領班、管理員等看書的圖書館里去嗎？难道我們这里的文化和独立精神，尤其是高尚的人格，还没有危害到工人嗎？难道我們的工厂圖書館不是經常被人当作暗中观察工人可否予以信任的場所嗎？至于公共圖書館，我們也有理由肯定，它在这方面也决不是一头無辜的羔羊。难道，公共圖書館就沒有竭力、尽可能地在向老百姓歪曲人的本性不是善良的而是卑鄙齷齪的嗎？难道，柯馬罗甫先生过去和現在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少嗎？毫無疑問，公共圖書館里陈列了这类書。可是，公共圖書館里是否出借“俄国財富”呢？我們对这点感到怀疑。工人不大到圖書館去的主要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書不多，另外是因为

缺乏他們要看的書，因而也就更不容易从本來就不多的書中挑到它們。要是這些讀者常常退出圖書館，那麼責任往往也應該由圖書館來負。我們已經指出了上述總結報告的數字：讀者一共是1466人，書是1496本或1074種。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要是所有的讀者每人都借一本書，圖書館就只能剩下至多2%的書了。要不，圖書館就得關門。因此，希望看書的人也就迫不得已地甘心滿足于各種誨淫誨盜的讀物了。我們再來翻閱一下上面的總結報告：宗教—道德的書籍占20%，只有10%的讀者借閱它們，文學書籍占60%，但是有66%的讀者借閱它們。這種情況好像不能再進一步地去強調它的缺點在哪兒了。大家都看到，達東諾夫不肯承認那些有時上圖書館因為借不到書而等在那裡的人，是讀者。其次，達東諾夫先生硬說在我們這擁有兩萬人口的整個區域里沒有一份人家屋裡有一本書。這顯然是漫天大謊，簡直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工人們經常都有自己的秘密圖書館，書籍雖然少，但是所有的書都是精選的，經常都有人閱讀。因此，一個真正的讀者很少跑到上面所述的圖書館去，其原因，第一，怕受人注目，第二，到那裡去也沒有希望找到甚么好書。在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有教養的工人都不得不裝傻子。達東諾夫先生決不會知道，其實也沒有興致去打聽，符拉基米爾省全省都是和知識隔絕的，尤其是和社會主義隔絕的，听了這話，達東諾夫先生，請你不要害怕！有些人打算在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經營書本生意，但是他們老是得不到許可。難道他們就不怕沒有買主嗎？奧列霍沃-祖耶沃倒有書店，但是那裡嚴禁出賣一些著名的受人歡迎的書，而想買這些書的人碰到的回答總是“沒有”和“賣光了”。那裡的工人對於圖書館的缺書，經常

怨声载道。这种怨声载道是普遍的。在舒雅城(参看第6期“火星报”的通讯),有一个工人从图书馆里出来,没有走多远,就被一个警察喊住了,问道:“拿的是什么书?”后来,当警察弄清书的性质和出借处以后,才放那个工人回去。如果书上没有图书馆的印戳,这个工人能这么快拿书回家吗?职权就是监视工人的警察,能够受人信赖吗?宪兵队长在他执行的审问中,责问一个工人:你为什么偏要看这样的书,而不看宗教的书。这是什么原故呢?要是书是一本什么特殊的书的话,那就更要受疑惑了,其实它是政府机关同意的书籍目录中的书!这一切,工人们以后都知道了,因此一些胆小的人后来走到图书馆门口都打哆嗦:既想借书,又害怕。当黑暗势力反对工人的时候,达东诺夫先生,你可知道工人们所处的是什么样的地位吗?我们再来拿奥列霍沃作例子。那里的地方当局搜查到莱肖特尼柯夫^①的全集,把它当作禁书销毁了。正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工人决不能在那里的图书馆里借到大部头的书,他们总是说:给人借走了,而管理员们几个月几个月地把两卷集、三卷集的书放在自己的家里;并且大家常说:工人要是向工厂图书馆借大部头的书,差不多经常遭到拒绝,他们总是说:书被人借走了,其实它们还好好地放在书架上。贴出惩戒工人在宿舍里高声读书报的告示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对工人的教育的关怀程度了。哪怕为不识字工人朗读书报,也要受到惩罚。达东诺夫先生,请您不要因为我离开符拉基米尔省到鲍戈洛德斯克去而动肝火。扎·莫洛叔甫工厂的工人可以看到黄色书籍,因此工人们用不着到图书馆去。图书馆里连杜

^① Ф.М.莱肖特尼柯夫,1841—1871年,俄国的民主主义者,作家。

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都沒有，難道除了一些沒有價值的出版物和神甫們的愚昧的遺產及欺騙人的書本以外，工人還能借到滿足精神需要的巨著嗎？

滿足工人精神需要的方式方法的一般特征，就是這樣。從上述情況中可以看出，工人好像有閱讀書本的機會，而人們也在努力滿足他們的精神需要。政府、廠主和各界人士都公開承認這種滿足的必要性。但是，事情又好像不是這樣，實際上他們在咆哮，在質問，在指責：你胆敢念書給不識字的人聽？你怎麼異想天開地在工人宿舍里朗讀起來？把他趕到鬧哄哄的屋子裏去！……你干嗎不看宗教的書，而看這類書？——這類書沒有，被人借走了。你是誰，在哪裏工作？在這種情況下，要是聽到別人責備我們“對知識漠不關心”，難道我們就不憤恨說這話的人嗎？達東諾夫先生說，“在所有的圖書館（五個）裏，一共有八千冊書，借閱這些書本的，大約三千人。”我們有根據不信任達東諾夫先生的這句話，因為據我們知道，禁酒會的一個圖書館有 1466 個讀者，在每個圖書館具有同樣數量書籍的情況下（當然不是絕對的），為什麼事先就沒有把其餘的圖書館的讀者人數定得差不多相等呢？如果達東諾夫說這些都不對，那也就只好由他的良心了。我們心中都清清楚楚地知道，這五個圖書館里哪一個里面都沒有好書。如果說它們里面放着五花八門的荒謬書籍供人“挑選”的話，我們也就沒有根據說，它們就沒有人閱讀。只有那些願意愚昧自己的人，才閱讀宗教一道德之類的書。而我們是打心眼里不想看它們的。最後，我來稍為談談一所公共圖書館。達東諾夫先生在那裏發現，工人們“不肯每月從自己的 15 到 20 個盧布的工資中拿出 20 個戈比來付給圖書館……”請讀者原諒，我不認為達東諾

夫先生是克雷洛夫寓言中的看不見大象的主人公，而是個目光尖銳、很會觀察事物的人。但是，我這麼說，心裡是非常難過的。因為，我這麼說，算是干嗎呢？要曉得，讀者們，說實在話，他是沒有看見大象呀！好啦，就算達東諾夫先生憑空想出了個玩笑！那又為什麼呢？看來，看看書，也要花兩個盧布，而且還要付四個盧布，作為借書的押金。他們看到工人掙到很多工資感到十分惊奇。可是，冬天，工人每月祇能掙到八、九個盧布，而在看書——這是個機會——的押金上就要付四個盧布。……啊呀，達東諾夫先生，這樣做，對我們合適嗎？真的，我敢担保向你說，這是不合適的！把一半的工資去付借書的押金，我們買麵包和白菜湯的錢就會不夠，這樣行嗎？不，你們要是解雇我們的話，我們還是能好歹對付過去的！……老實對你們說，我們弟兄到哪儿都不要緊。有一個人，他很不滿意你向我們說過的那些個圖書館。有一次，他想起上述五個圖書館中的一些大部頭書，便走進其中一所公共圖書館：

“請您無論如何把這部書借給我。”

“沒有。”

“那末，這部呢？”“沒有。”“可是，這一部呢？”“也沒有。”

“好吧，那就請您把達爾文的書借給我。”“你是干什么的？”“工人。”“在哪兒干活？”“你問這干嗎？”“那末，你住在哪兒呢？”等等。最後，這個工人全都說了，他住在哪兒，在哪兒工作，然而書還是沒有借到，空手走出這個公共圖書館。大概，後來有人到工廠里去找過他了，不過，他說的不是真名實姓，而是信口編造的。達東諾夫先生，結果竟然會這樣！是不是因為有人告訴您說，本地工人不關心其他地方的工人生活呢？達東諾夫先生，原因准是如此！其實，原

因簡單得很，您就是花多少時間在附近繞圈子，都是白搭，都是徒勞的！我們心里明白，准是有人對您說，我們本地工人對別地方的工人的生活習慣和其他問題，都不感興趣。“那兒大概有羊？啊呀，真的，倒把它們給忘了！”達東諾夫先生也把某件相類似的事，提到了惡狼的公堂上。你們硬說工人對知識漠不關心和不願意看書，就應當在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設立一所至少擁有 25,000 冊藏書的圖書館，而且書籍不是按照國家機關制定的圖書目錄和禁酒會的更糟的圖書目錄來挑選，而是按照讀者定的圖書目錄來挑選，同時使那里的人不把工人當低等人看待，也不把工人手里的萊肖特尼柯夫的作品當作禁書加以沒收，——那時候就能明顯看出工人們追求知識的願望了。替西彼金等人賣力氣的達東諾夫之流的先生們，請你們別忘了，前者手里握着一根上面刻着“根據第 144 條”等字樣的棍子，隨時準備迎頭痛打“俄國財富”和其他刊物，而這些刊物也決不能跪在西彼金的條文面前央求赦免它們的達東諾夫之流先生們的罪名。

達東諾夫先生，請您允許我們問您一下，新聞界方面究竟為我們做了一些什麼呢？有沒有一份大報為我們工作呢？如果有，那末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工人是否買得起呢？定報的工人能否從這份報紙上汲取到大量的知識呢？不！現在我們還沒有希望獲得一份向工人說公正話、毫不客氣地當眾說出真理的報紙。像“日光報”之類的報紙，只是踐踏工人，愚弄工人。“商報”也千方百計地說工人愚蠢，而收入却很豐富（這是涅撒維希姆先生從一個鉗工身上得出的概略結論）。“商報”的論調是：只要皇帝陛下說一句話，地球就會立刻像西瓜似的分為兩半，而瓜子也就會像各

种贬低高尚道德的告示似的从中撒出来，而主編先生們将会好心地把他們拣起来。皇帝陛下揚弃掉不重要的东西，繼續搜刮俄罗斯老百姓身上的脂膏。其結果，俄罗斯老百姓在高尚的道德方面就没有可能得到發展，因而他們甘願通过不高尚的途徑去得到它；另一个結果是，到处都出現秘密出版的讀物，其数量無論有多少，都感到奇缺，工人們閱讀它們，关心它們，而且把它們藏起来，虽然做这一切都很不方便，而且对自己說来，还常常不無危險。讓达东諾夫先生給我們送些什么大部头的讀物吧，我們會找到願意閱讀書籍的人，毫無疑問，這些人都对科学和知識感到兴趣。总之，要是达东諾夫之流的先生們不来注意我們閱讀什么，相反的，而是給我們带来什么讀物，那就很好了。如果他們不願意把書籍帶給工人，那就讓他們把書籍帶給在精神食粮上比工厂工人餓十倍的农民。但是，达东諾夫之流的先生們也不願意管这些精神上飢餓的人。我們这里过去和現在經常都有很多對我們吹毛求疵的人，而正派人，我們是很少遇到的，因而我們竭誠欢迎任何一个願意在學問上致力的人。請原諒我，我想試問一下：在某个省城里受过相当教育而且具有文憑的知識分子，像县警察局长、檢察員、紳甫、地主、衙吏、地方上的官长、軍官，就念过很多書嗎？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們打牌、喝酒比起念書要用功得多。可是，表面上，他們好像比工人有教育，而且有的是時間去坑害工人，同时他們住得很寬敞，吃的比工人不知好到哪里。达东諾夫先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至于談到看戏，只要戏好，演得好，票价便宜，賤价的座位也能听到和看到舞台上的唱做，戏院到处都会客滿，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用不着去証实它。事实上，这种情况不是經

常的。要是达东諾夫先生还没有發現工人的話，那他还有可能在戏院里遇到卷着袖口的工人，像他們在工厂里和出厂时的姿态一样。达东諾夫先生的眼力，我們是知道的。

我們再往下談。达东諾夫先生說：“还没有看到合作运动的任何征象”。达东諾夫先生沒有看到任何征象，但是我們倒發現了一个消費合作社、它的商店、还有它的章程。席斯契林先生对这点作了回答，然而我們还想就这个问题談些席斯契林先生沒有講到的話。正是这个时候，在俄国，任何一种正确的合作活动都会使人感到驚訝，要是願意的話，还会使你感到恐怖。工人們要是在某个地方也异想天开地搞这类名堂，而且沒有立刻叫人看出这是純資產階級的机构，那他們首先就得表現他們很安份。其实，最高权力机关总是不相信他們的安份。結果，社的章程还没有定出来，而某些个社員倒尝到了当局的厉害。当章程还在衙門里傳遞的时候，就有人用暴力把余下的社員送到不明的地方去了。在俄国，呈請批核的各种各样的章程，数量很多，但是得到批准的，是微乎其微的。只有省长、厂主、駐厂檢查員等等是名誉會員和当然會員的合作社的章程，才能得到批准。而且要人相信，这些合作社具有考虑改善工人生活的基础，同时还强詞夺理地說，仿佛地方长官就是老百姓的亲生父母……。

各大城市的工人們經常寻思着要建立工人俱乐部，但是老是得不到許可。因此，工人們不得不徒步到小客棧里去听手風琴或口琴。有教养的老爷先生們在这上面耍的聪明，很不高明。准許建立的合作社經常都处在被查封的恐惧气氛中，人們在集会上發言，必須四面瞅瞅，会不会有什么癩虾蟆或者蝮蛇跳到自己的脖子上。他們还經常为社的

基金担心思，害怕政府把它充公和沒收。只要一想到罢工和这种社将会帮助它的会员——罢工者，它就自然永远受省长的管轄。显然，达东諾夫先生不知道下面的屢見不鮮的情况：工人们制定了章程，剛签好名送出去，而所有签名的人都被逮捕了，政府当局把他們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果达斯克、符雅斯克等省。这是不是因为他們身上有着“某些看不出来的合作运动的征象呢？”我們可以向达东諾夫先生担保說，我們談这件事，是根据事实，而决不是从自己的利益出發来反对合作社。只要冷靜地观察一下实际生活，就不能不承認，在目前政治专橫的情况下，合作社对工人的好处，不如对政府那样的好处。任何一个迷恋合作社的热情工人，都应该用这点来譴責自己的白費力气和徘徊不进。合作社决不能把它在政治自由的情况中一年所做的事，在目前政治专橫情况下的十年中做出来，因此我們十分希望，群众們都热衷地下教育(宣傳鼓动)，而不迷恋合作社。任何人都明白，現有的合作社和消費商店，是些什么东西，不論它們是以什么方式在俄国产生的。有些地方，它們的性質，純粹是资产阶级的机构；有些地方，它們是从工人手里收回工資的十分巧妙的手段；有些地方，它們純粹是官厅机关(衙門)；而在有些地方，很难把它們叫做什么，它們的目的是：把錢拿来，我們来給你們支配！各地合作社的目的，从理論上來說，都是千篇一律的，第一条都是：“本社宗旨，尽可能供应社員以廉价的生活必需品”，等等。正像我們所說的，这是理論上的說法，而实际上是另外一碼事。

合股商店可以列入第一类情况(譬如普契洛夫厂的联合股份公司就是这样的商店)。最初，先确定多少股券。当

然，股東常常都不是工人。只要生意一興隆，股東們就竭力設法縮減股券，如果辦不到這點，就把股券收到少數幾個人的手里。那時候，股券的價值就被計算得一個普通工人不可能當股東。老實說，工人也沒有當股東的念頭。股東們可以得到優厚的紅利，而賒買的顧客如果能得到些什麼的話，也只有比較好的商店里，而且要逢到好年頭。商店的業務歸幾個人管，賒買的顧客絲毫不能過問。另外一種情況是，各個工廠里都有很多由老板出資開辦的商店，由管理處經營，全部收入歸他們所有。那裡的工人要是自己想辦個合作社的話，立刻就會被開除出廠，甚至讓他們去認識認識西彼金之流的老爺們，後者對待他們決不會忘記採取工廠管理處的威逼手段。工人走進商店，不得不付出他們用血汗換來的金錢，而且態度還要像在廠里一樣。因為商店里也有廠里的領導，他們同樣能把工人開除出廠，因此工人只好默不吭聲，別人給什麼，就得拿什麼。第三種情況，鐵路辦的商店，都是官辦性質。這些商店的主要收入雖然都是從工人身上得來的，但是它們還不能控制大多數工人，而那些生意不景氣的商店則乞求官僚們幫忙。第四種情況，有些商店的管理處和工廠的管理處很難區別，儘管它們是頭挑的工廠（像布良斯克地方的工廠）。你們可以設想一下，工廠管理處不喜歡的一個人如果落到商店管理處，將會怎樣？工廠管理處如果平靜地把他開除出廠，這等於是剝奪了成為商店管理處成員的權利，甚至被剝奪了商店的普通賒買者的權利。這種情況不僅可能發生在上述工廠里（布良斯克地方的工廠里），甚至會發生在幾乎每一座工廠里。第五種情況，奧列霍沃的商店的基金，是依靠工人出資的。任何人想在這家商店里賒買東西，必須確定自己的賒買金額，

我們假定它是十个卢布，但要先付，付了錢以后，他才能算是賒买顧客，然而还不能超过金額拿东西。看来，这好像是俄国最新穎的合作社。这个商店的管理人是遴选的。选举时，参加大会的領班、管理員和老資格的管理人，事实上都是决定商店命运的主宰。工人們站在后面，只能随声附和着提出候选人的事务員們的意見……这短短的几句话說明了我們的这些合作社以及工人們在这些合作社中被人强加在身上的义务，丑恶的义务！此外，各地工人在这些合作社中，总是成为被人尽量天天剪毛的羊群。我們来看看，工人到合作社或公共商店賒購东西时被人盘剝的情况。無論你走进俄国哪家这样的商店里，最好、最嫩的肉，都是留給老板、領班、管理員、監工和狗腿子的。肉骨头、老肉，总之，瘦肉，都卖給工人，臭肉和坏肉，也卖給工人。不久前，听說，奥列霍沃有人把生蛆的腌牛肉傾銷給工人。正是“傾銷”，別人定購两磅，却給秤三磅，等等。工人們吃亏后，馬上就停止买肉，这才算救了自己。已經定了肉的人，就不能不拿。要是买戶中有人指摘东西不好，就要被他們痛斥。逢到好的情况，他們只从他手中把东西拿走，一边嚷道：你不要，就不該定。最好是，工人默不吭声地一走了事，但是也常常發生很坏的情况：他們記上工人的工号，把工人叫到办公室，对他大叫大嚷：造反、暴动、罢工、吃官司、西伯利亚等字眼，雨点似的落在倔强的工人头上。商店經理硬要把某个工人开除出厂的事，也是屢見不鮮的。原因不外乎工人不肯拿坏肉，或者偶尔指責他們剝削人太狠了。还須值得注意的是，想买的东西，常常要等很久。弄錯賬的事，也常常發生，賒买的人拿了八到九个卢布的东西，但却从他的工資中扣掉十二到十五卢布。工人終日忙碌不堪，最后还被

人算錯賬，錢給压着，一直等到下个月。要是不是錯五、六个卢布，只錯个把卢布，或者五十个戈比，工人总是会揮揮手算了。难道追查錯賬對他們來說是愉快的嗎？現在的合作商店的最大的罪過就在于：它們恰恰違背自己的宗旨，出賣的貨物，常常都不是質量好的，而價錢經常比私商還昂貴得多。譬如，上面提到的（布良斯克）商店的某些貨物價錢，比私商貴20%到25%，而貴5%到10%——這是我們這兒的最平常的現象。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商店賣的貨物毫不比私人商店便宜，相反的，私人商店的貨物還打2%到5%的折扣，合作社是不打折扣的。奧列霍沃的消費商店賣肉也比私人鋪子貴，而且不登記三等的，這也就是說，大家公認它是二等。對待除買顧客，到處都很粗暴。凡是衣着講究、有些地位的人，都能經常享受到優先權……這一切都是崇高的合作思想在我們這裡產生的結果。合作社在國外某些地方對工人有便利有幫助，但是我們這裡只要抽打工人的皮鞭子存在一天，各地合作社商店就得不到工人的同情，就沒有工人想從合作社得到的甜果子，這是不足為奇的。因此，達東諾夫之流的先生們便大談起缺乏同情和意圖……

還沒有完！談到合作社，我們的西彼金之輩們會說，我們這裡是許可建立合作社的，沒有反對它們的任何障礙。他們（西彼金之輩）什麼勾當都干，甚至阻擋高尚的思想，而且無所不用其極。譬如，不久前，一個憲兵隊長說，省長閣下先生樂意批准萊維茨基的勞動組合，甚至很表同情，因此工人們不必害怕追究。他說，決不追究這件事。斯符雅托波爾克·米爾斯基也說，“干嗎不在那裡（叶加特林諾斯拉夫）辦個什麼工人聯盟呢？”我們不知道，他現在是否就輕易

地批准工人的聯盟？況且，他為人是十分謹慎的……如果說，政府過去小心而又及時地歪曲過合作社的意義，阻撓過高尚的思想，現在則因為感到工人聯盟必將到來，而順着合作社的錯誤和失敗的道路去引導它，從而麻痺合作社的優點，那麼我們就險些犯了錯誤。這些就是他們的虛偽的同情的意義。因此，我們必須加倍小心，而且密切注意，及時看透一切情況。這點能否完全辦到，很難說。

達東諾夫先生結束他的文章時說：“渴求光明和文化的意願，也的確是從外部進入工廠的。”達東諾夫先生，您有沒有考慮到，光明是從軍隊中進入工廠的嗎？是士兵把文化帶進工廠的嗎？如果說是对的，那麼顯然達東諾夫先生把飛廉（一種植物，學名Carduus。——譯者）當作桑葉了。我來舉個例，一個工人，曾經看見過工廠里的“造反”，或者他不是直接目睹者。現在，他要到軍隊里去服兵役。他離開自己的同志，去當兵了。有一次，這個士兵寫信來說：“我沒有荒掉我的本行，我們這裡像我這樣的人，大約有十個”……哎喲，其實簡單得很，原來，知識是這麼走進士兵的腦袋里去的。應當說明，現在工廠里也有不少人去服兵役。這些人要求寄些書給他們，最好抓住機會給他們寄些違禁書籍。讓他們瞧瞧我們工人知道些什麼。我還要說一件事：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派出的工人，並不比伊凡·福羅洛夫（達東諾夫先生提到的城市）派出的知識分子差。縱然，也許他們不能做詩，或者是一些您所不知道的人。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還有許多有學問的工人，儘管這裡還不包括任何不可靠的人。像一所大學把部分“光明和文化”輸送到俄國各地去的情況一樣，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同它的工人也把“文化的光芒”射到俄羅斯的各個角落去，結

果，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和大学有些相似（是等量齐观的）。

一个维护工人的工人
(1901年10月第9期“火星报”副刊)

